



公民知识手册



公民 主编

===== 公民手册系列 =====

公民 印发

目

目录

上篇 民主的基本理念和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

- 一，关于自由的基本理念.....
- 二，关于民主的基本理念.....
- 三，关于法治的基本理念.....
- 四，关于宪政的基本理念.....
- 五，关于公民社会的基本理念.....
- 六，关于公民的基本理念.....
- 七，关于私有制的基本理念.....
- 八，关于主权在民的基本理念.....
- 九，关于有限政府的基本理念.....
- 十，关于三权分立的基本理念.....
- 十一，关于普选的基本理念.....
- 十二，关于政党竞争的基本理念.....
- 十三，关于言论自由的基本理念.....

十四，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基本理念.....

十五，关于联邦制的基本理念.....

十六，关于军队国家化的基本概念.....

下篇 关于民主和民主化的种种中国式疑问

一，中国大陆的广大人民需要民主制度吗？

二，为什么垄断利益集团要反对民主制度？

三，中国人民有享受民主制度的前景吗？

四，中国大陆有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吗？

五，为什么政治反对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

六，为什么说实现民主转型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

七，为什么说公民运动是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主要力量？

八，为什么一定要反对现行的户籍制度？

九，为什么一定要关注农民工权益？

十，为什么一定要维护上访者的权益？

十一，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劳动教养制度？

引言

民主制度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漫长的演变过程，在人类历史中，不同的社会形态对民主制度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地缘的环境不同，民主制度在不同国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政体。比如英国，虽然君主只是虚君，但至今保留君主制；比如美国，是总统制，比如法国是法国式的半总统制，还有意大利式的，还有日本式的，还有北欧式。从荷兰的尼德兰革命后，经过了四百多年的历史演进，世界主流国家普遍确立了民主制度。近代以来，世界主流国家继承了过去数千年的历史积累，通过革命的或者改良的方式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逐步演化成现行的大同小异的民主制度。

现代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政治成果。大量统计显示，经济成功和长治久安的国家，大多是民主国家；经济贫困和动乱不止的国家，大多是专制国家。政治民主与经济成功以及社会稳定是相互促进的和相辅相成的。另一项统计显示：区域性冲突和世界大战，往往由专制国家挑起。可见，民主政治不仅有利于本国稳定，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世界主流国家把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看做是民主国家同专制国家之间的斗争，虽然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也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与民主国家并肩作战，但这并不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性质，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社会的主要敌人是德意日轴心国，它们都属于法西斯极权的性质，而且结成同盟进行反人类的战争。经过较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国家取得了胜利，是民主对专制的胜利。这说明专制制度不得人心。

中华民族具有数千年的文明史，既曾经历过秦皇汉武的鼎盛时代，也曾经历唐宗宋祖的繁荣时代，

“大治”、“中兴”、“盛世”这类词汇，频频出现在历史记录中，耳熟能详，甚至“路不拾遗”和“夜不闭户”的和谐景象也数百年一现，成为国人的荣耀。然而，王朝更迭，周而复始。国家每经历周期性动乱，国民便经受周期性惊扰。鼎盛为不能保存，繁荣不能持久，这里面的原因只有一个：历代王朝都实行政治专制，权力集中，权力垄断，缺少约束的权力带来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必然带来绝对的腐败。假以时日，王朝必然为之腐朽，连带之下，国家必然为之没落，国民必然为之遭殃。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列强的坚船利炮架进了大清朝的国境，国门洞开。在两次鸦片战争失利后，中华大地上终于揭开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但是，大清朝的洋务运动仅仅是追求器物的改进而鲜有制度的革新，终于导致了甲午战争后的割地赔款，戊戌变法和预备立宪虽然触及了制度的问题但终因顽固派的镇压与抵制而归于失败，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在

表面上埋葬了延续 2000 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并接踵而至。陈独秀领军的新文化运动推动国人对文化和制度的病根进行反思，但是，频繁的国内战争和外敌入侵，再加上国际法西斯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侵扰，“科学与民主”的启蒙进程和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一次又一次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虽然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又被国共内战葬送。1949 年建立的“新中国”实质上是“党天下”。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名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镇反、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路线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

权利得到部分恢复，但是，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十年的邓式改革，毛泽东时代一些核心的东西还在核心之中。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方式在本质上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本质上也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时代和时代的器物符号。体制依然是党国体制，社会依然是权力社会，以党权为中心的四项基本原则依然在中国社会的中心地带发挥着自己的本能作用，可谓阴魂不散。也就是说，邓小平的改革并没有使政治制度的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中国依然是专制制度，没有走出无产阶级专政（也叫人民民主专政）的藩篱，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共产党专政。这就使中国社会又一次进入了似曾相识的治乱循环之中。现在人们可以看到，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虽然发展了中国的经济，积累了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是它催生了中国的既得利益阶层和不得利益阶层，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官民矛盾时常处于激化状态，而法律得不到贯彻，制定法律的人在普遍违反法律，统治者的统治能力在持续下降，而道德沦丧也无以复加，似乎只能继续沦丧下去。

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一个企图解决市场问题的垄断体制，这个体制注定是一个不能解决问题而又在不断制造问题的体制。当权贵集团的分赃过程完成之后，这个社会必然会发生变化。一个冲突重重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但其问题并不是永久不可解决，而是在等待解决的时机，关键是人们用什么方式去解决它。不断发生的历史事件，总有一件要促成历史性转折。中国人民为什么走不出治乱循环的陷阱？就是因为缺少民主制度。要解决专制制度的积弊，必须求助于民主制度的良方。说到底，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救中国。这不仅是人类历史的启示，也是中国历史的总结。

声音，一个来自普罗大众的声音，正在世界的范围内响起。从斯大林的故乡第比利斯到蒙古高原的乌兰巴托，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到群山之国的喀布尔，从高度发达的西欧罗巴到正在起步的中亚细亚，从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利比亚，这个声音高呼：民主，民主！这一声音昭示着：民主

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也是共同追求的目标！中国民主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的，民主就是世界潮流。是的，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有权管理国家和社会，有权决定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并迫使他们对人民负责。是的，这就是民主。

在当今社会，民主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也是人们所渴望的事情，但是“肉食者”却害怕民主，他们习惯于寄生的生活方式，从而乐于搅乱大众的思想，使之成为一池混水。贬低民主的价值，歪曲民主的内容，这已经成了可鄙者惯用的伎俩。为此，本人借鉴各种资料，编辑《公民知识手册》，希望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一些关于民主的常识和道理。不期成为照亮大众迷梦的语言火炬，只希望读者从中开始进行思考。

阅读提示：

《公民知识手册》上篇主要讲述一些关于民主和民主制度的内容，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区别标准。如：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公民社会，等等。

《公民知识手册》下篇主要是驳斥形形色色的反民主谬论。如：民主会不会导致国家分裂？中国人素质太低能不能实行民主？等等

上篇 民主的基本理念和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

一，关于自由的基本理念

一个谈论民主和民主制度的小册子，为什么要先谈自由呢？因为自由是先于民主的价值。在当今的政治文化中，自由与民主都是核心价值与核心概念，但是民主是为着自由或更多自由而运转的，民主制度中的各种要素都是为着自由或更多自由而产生的。自由好比是太阳，民主制度的各种要素好比是众多行星。离开了自由，所谓的民主将

变得毫无意义，偏离了自由，所谓的民主将变得不太民主。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首先是一部争取自由或更多自由的历史。

人的本性正是自由的深刻根基，没有任何人在本性上是在寻求一种被奴役的状态，没有人天生愿意做别人的奴隶。无论对人的本性怎么解释，自由都是符合人性的。不自由的状态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符合人性需要的，当然，我的不自由可能会符合你对自由的需要，而这，显然也是对自由的违背。人从自己的本性出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寻求更多的自由，并以此得到福祉。绝不会有人在失去了更多自由以后能获得更多福祉，自由和福祉完全是成正比例的。在人类历史上不乏专制主义者向人们兜售放弃自由的伟大理由和成功案例，但极左的或者极右的专制主义者公然宣称放弃自由可以获得福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破产之后，反对自由的声音只是角落尘埃，甚至，连卡扎菲这样的独裁者都要谎称自己是为利比亚人民寻求自由。甚至，

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理想都是这样的，他们在《共产党宣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文艺复兴，是 14 世纪至 16 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场有关艺术、文学、自然科学和建筑等各方面的思想文化运动。它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并结束了欧洲黑暗时代，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现代的分界。文艺复兴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就是从神到人的回归。文艺复兴之后的近现代社会之所以接连不断地发生巨大变革，就是因为人类行为的根本惯例将会战胜那些试图限制和管制他们的事物，人类行为的根本惯例就是自由，它出自人性。鸟的自由，就是顺应鸟的本性去做一只鸟；人的自由，就是顺应自己的本性去做一个“人”。鸟如果被关进笼里，那它就不是一只真正的鸟了。它成了玩物，成了欣赏品。人如果被关进社会的牢笼，那人也

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也会成为玩物和奴隶。自由就是人可以象一个真正的人一样生活，而不是过「非人」的生活。如果你感觉到自己的生活的不象人的生活，那就是不自由的，如果别人也看到你的生活不象人的生活，那你同样是不自由的。奴隶没有把自己当做人，所以奴隶是不自由的。奴隶没有把奴隶主当做人，所以奴隶主也是不自由的。

民主是一种能够对各种价值观兼容并蓄的制度体系，但民主显然不是自由主义者的一统天下，世界上也不应该存在对其他价值观进行权力干预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如果不是自由主义者，也将为自己和社会带来诸多困境。回顾国际共运史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领袖们在初衷上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列宁为了实现他那种样式的民主，走上了“红色罗波斯比尔”人生道路，甚至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样的共产魔王也是怀抱改造社会的美好理想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是共产主义者取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的手段注定不能

解决平等公民权利的问题，这也就决定了他们一定会走一条从侠客到魔王的道路，这是一条走向奴役的道路。当共产党领袖们为了他们所谓的民主以大多数人的名义去剥夺少数人权利的时候，大多数人的权利也就荡然无存了。中共的一位高级将领说，民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弃恶扬善的历史，但是他也应该能看到，专制社会的历史都是弃善扬恶的历史。

对于人来说，自由即本性，本性即自由。如果不自由，人类的生命也将变得不完整，如果不自由，人们的幸福也将变得不可靠。就拿生命权利来说，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属于自己，他有权决定自己生命的延续方式，也就是生活方式。如果别人强迫你按照他规定的方式去生活，那他就等于是部分地主宰了你的生命，或者叫剥夺了你的部分生命。毛泽东式的极权统治要求数亿人民按照他规定的方式去生活，给每个人指定一个工作岗位，甚至连出门都要开介绍信，这实质上就是剥夺了数亿人民的部分生命。就拿财产权利来说，人类的所

有财富都是每个具体的人创造的，本来就就应该归属于这些具体的人，如果一部分人非法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的财富，这就等于剥夺了别人的劳动和劳动成果，本质上属于奴役。任何奴役，都绝非自由。有些奴役方式，因为没有镣铐加身，所以人们经常认识不到它就是奴役，但它真的就是奴役。举两个例子：其一，假如你不信仰共产主义了，想退出共产党，但是退出之后显然会遭遇一些政治迫害或者其他迫害，那么这些压力就使你不方便退出，你还得假装在共产党内，这时候你的生命无形中被组织剥夺了一部分。别人占有了你的生命，当然是奴役；其二，假如你的亲人在集贸市场卖蔬菜，城管队员看见后二话不说就把蔬菜夺走，这种现象从表面看是执法不规范，或者是非法抢夺，但根本上也是奴役。因为城管队员把别人的合法劳动非法地占有了，也等于把别人的生命过程非法占有了。

自由必须是每一个人的自由，民主必须建立在平等公民权利的基础上，这是专制主义者所难以理

解的，即便他们理解了也只得假装不理解了。尊重自由和权利的社会就必然是多元社会，多元社会的社会单元通过对自由和权利的深刻尊重而形成相互平衡，达到多元共和。从多元到共和，多元是表现分歧关系的，共和是表现伴生关系的，多元是外在的，共和是内在的，而权利始终是它们的轴。权利是什么？权利就是自由的根本性内容，是自由的根本性表现。

是自由？还是被奴役？这在真实的社会中并不是空洞的概念，公民权利平等，就是自由，否则就值得怀疑；思想方式、表达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可以选择，就是自由，否则就值得怀疑。

贝多菲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生命、自由和幸福是三位一体的，让我们为自由和更多自由而努力吧。

二，关于民主的基本概念

如果要宣传民主的价值观，我们首先要告诉别人什么是民主。如果你说两党制是民主，也许人们不信服，如果你说多党制是民主，也许人们一样不信服；如果你说直接选举是民主，也许人们不信服，如果你说间接选举是民主，也许人们更不信服。如果你说权力制衡是民主，也许人们不信服，如果你说最高权力归属于人民代表机构，也许人们更不信服。

虽然大多数人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但也有很多人说北欧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当代的民主制度不是整齐划一的，民主制度中有各种要素，这些要素怎么组合，孰轻孰重，在各个国家也表现不一。有总统制的，有总理制的，有议会制的，有一院制的，有两院制的，加拿大还有总督，英国还有女皇，日本还有天皇，确实很难说哪一种民主制度就更好，或者最好。民主是什么？民主这个耳熟能详的词到底指什么呢？它所包含的内容对每个人的利益到底何在呢？正如“一千个读

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样，不同的人总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抽象的概念。

对于每一国具体的民主制度，虽然众说纷纭，对于民主制度的要素组合与政治设计，虽然各执其词，但是，民主就是民主，因为民主制度斑驳陆离的制度设计背后有它们共同的东西存在。这就是生命、自由和幸福。尊重每个生命的存在，这是民主制度进行设计的前提，关乎每个人的自由，这是民主制度进行设计的关键，促进每个人的幸福，这是民主制度进行设计的目标。

近代以来关于民主的理论大多是从自然权利谈起，生命、自由和财产属于自然权利，不容剥夺，能保证这些自然权利的制度设计，就是民主。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谈这些问题，就是说，自然权利必须用自治的方式来实现。每个人都有主宰自己生命的权利，每个人都必须具有相同的自由，每个人都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寻求幸福，这就是自治。保证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

命运和前途，这就是自治。从根本上说，自治，就是民主。自治，必然意味着多元，所以从表面上看，人们可以在多元的生活方式进行选择，就是民主。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愿意用行乞的方式进行自己的生活，那么民主的制度设计应该保证这个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它不能禁绝或者非法干涉这种乞讨的生活方式，只能要求这种生活方式不去非法妨碍别人的生活方式。假如你发现美国有一万人弹着吉他在行乞，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只能证明美国是个民主的国家，它允许人们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恰恰相反，毛泽东曾经一度剥夺了人们行乞的权利，这只能证明毛泽东是个搞极权统治的暴君，而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种极权统治曾导致中国大陆饿死了几千万人。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中国大陆都不能善意地保护乞讨者的权利，每每遇到奥运会和世博会一类的盛事，乞讨者总是被驱赶出大城市，有些被管理人员直接丢弃在城市远郊的路边，甚至出现过多起乞讨者因此被冻死和饿死的恶性事例。当然，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巡的时刻，各地官员总是把

赶走乞丐当做一项重要内容，以美化城市，这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如果你明白了自治就是民主的道理，现在你还能说中国是民主的吗？

在人类生活中，自治不是一个人的自治，而是每一个人的自治，社会成员在一起进行自治生活，就必然要发生权利交换，这就是公共生活。公共生活不是独立于个人的生活，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它是所有社会成员具体生活的一部分，对公共生活的管理就是公共政治。在民主制度下，公共生活不能脱离个人自治而存在，而是相反，公共生活必须建立在个人自治之上，并为个人自治提供保障和规则。民主，就是承认“公民对国家政治的决定权并建立制度来保障这种民主权利的实现”。这句话首先谈的是“公民对国家政治的决定权”，然后才是“并建立制度来保障这种民主权利的实现”，前者是民主的实质，而后者在实际生活中也许比前者更重要，因为它保证了前者的实现。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就是民主制度的简称。

美国的先驱们总结得很好，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是：民有、民治、民享。但是，以此来理解民主制度有些抽象，是对于那些深受专制主义熏陶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现在我们知道，民主还可以有更简单的理解方式，就是在个人生活层面和公共生活层面去理解。在个人生活层面就是保证每个人的生活自治，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在公共生活层面就是保证公共政治服务于个人的生活自治。简单地说，认可人做自己的主人，认可公民自由生活，认可公民对国家政治的的决定权和管理权并建立制度来保障这种权利，这就是民主。对于民主一词，让我们把它的汉语意思扩张一下，就是：人们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或者：公民自己做主。自己做主是需要前提的，对于一个顾客而言，自主的前提意味他对商品的知情权和商场的选择权。而对于公民来说，自主的前提意味他要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知情权和对政府的选择权。既然承认公民是国家和社会最初的主人，他们拥有最终的权力，

同时国家有义务建立民主制度来保障主人行使权利。那么，公民就有选择政治家和政党的权利，也有选择政府的权利。如果政府不能让人民日子过得好，那么人民就有权要求更换执政者。所以，民主制度中，最重要的往往就是一人一票的自由选举制度。在一些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国度里，统治者经常象人们灌输的是另一种关系，他们把自己称为管理者，把老百姓称为被管理者，把自己成为救星，要求老百姓对他们感恩戴德，在他们眼里，只有被他们养活起来的老百姓，从来没有公民。

当今世界，民主已经成为全球人民追求的普世价值观，哪怕再专制的统治者也不得不扯起“民主”这个旗帜来遮羞。于是，他们就利用民主这个概念的抽象性来迷惑大众，甚至无耻的宣称自己的独裁制度就是民主，为此他们会创造出一些好听的词汇来形容，如人民民主专政等。我们来看看当今世界最不民主的这个国家吧，北朝鲜自称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它是人民的吗？显然

不是，它是民主的吗？显然也不是。民主，简单而直接的说：承认全体公民对国家政治的决定权并建立制度来保障这种民主权利的实现。后者甚至比前者更显示的重要，因为只在口头上承认但不采取制度来保障甚至是戕害这种权利的制度，则是虚无的，反动的。历史已经证明，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也会把民主的口号喊得振天响，它称自己的政府“人民政府”，认同民有；标榜“人民当家做主”，认同民治；自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认同民享，自称“为人民服务”。而在实际的生活里，政府通常是党国体制中的权贵集团实现统治人民，谋取利益的工具，他们不给人民选举权，却声称是人民的代表，从而架空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在没有监督和只对上级负责的前提下，政府只会为权贵集团服务。

有没有选举权？怎么选举的？选举是否自由？选举是否公正，这些对于没有参加过民主选举的人来说，理解民主也是困难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另一种方式来检验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

毛泽东历来承认中国是专制社会，他甚至直接说就是独裁，而邓小平继承毛泽东的思想提出了中国社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这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专制的原则，而非民主的原则，也可以当做民主与专制的试金石。第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用一种思想去指导全社会的思想，连思想都受到限制，这当然是专制而非民主；第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政党独霸社会的管理权和决定权，这违背了公民权利平等，当然是专制而非民主；第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一部分人以“人民”的名义对政治进行垄断，必然导致经济垄断和文化垄断，当然是专制而非民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就是其他三项，核心是共产党的领导，其他三项是专制而非民主，那么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虽然要素组合与政治设计各不相同，国家机构的名称也有很大区别，但真正的民主制度不仅基本原则相同，而且在要素组合与政治设计也具有诸多共性，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内容：一人一票和自由公正的选举，军队国家化，言论自由，新闻开放，法治宪政，三权分立，政党竞争，独立工会，私有制度等这些内容是民主制度的骨架，保障了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程度，这些内容建设的越完善，人民享有的自由度就越高。

三，关于法治的基本概念

现代民主制度不止是一个技术手段那么简单，它是在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一系列价值观的催生下产生出来的。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一定是民主制度？那么也可以简单地反问：如果不是民主制度的话，那么谁又甘受别人的奴役和凌驾呢？谁又有资格来统治别人，并且可以将这种统治权力授予自己的后代呢？

嗯，既然人人都应该是自由的，那么人人也应该是平等的，如果人和人之间不平等，权利上有巨大差异，那就没有自由。嗯，既然人人应该是平等的，那么人人也应该是博爱（互相关爱）的，如果人和人之间不互相关爱，而是相互欺压，那就没有平等。可见，自由、平等和博爱必然导向民主。然而，民主显然也不是简单的价值观念，民主是制度，是一系列制度的组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正如技术手段那么简单。嗯，民主的技术手段就是法治。

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人治与法治之争，柏拉图主张人治，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近代法治理论创建过程中，康德提出了提出了一些法治思想：立法权属于人民，人民制定法律以限制一个人对另一些人的专横。但卢梭应该算是近代法治理论的奠基者，他多次强调，法律是公意的行为，君主不能高于法律。卢梭的法治理论主要包括：人民拥有立法权；法治与共和政体相结合；法治意味着平等。而法治理论成为宪法规定的原则是英国人

在 16、17 世纪的首创，18 世纪美国人接过法治口号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1776 年美国独立宣言中用很多具体事例控诉英国破坏法治的罪行，1787 年美国宪法确认法治原则为宪法的基本原则，法国 1791 年宪法以 1789 年法国人权宣言作为序言，而人权宣言为近代法治原则奠定了基础，也为近现代国家宪法确认法治原则提供了样板。所以，继美法两国宪法之后，各民主国家的宪法都以不同的方式确认了法治原则。

法治思想经过不断的完善和充实，日趋完美。就当今来看，法治思想包括两个主要原则。第一原则：平等权利，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普通人、总统、政府、企业和法人等，概莫例外。第二原则：公正原则，法律必须帮助那些弱势的人，不仅要求在权利的起点上实现平等，而且在权利的终点上也努力减少差距，从而实现基本的公正。法治是做什么的？英国当代最为著名的法官-丹宁勋爵-在其法官生涯中，一再阐明这样的立场：“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仔细想来，

丹宁勋爵确实感悟了法治的真正精神。公正就是公平与正义，其中包含“兼顾”的含义。只有每一个人的本性、自由和权利受到应有而相应的尊重，并且有自我发展的机会，那才称得上是和谐公正的法治社会。

法治原则是作为人治原则的对立物产生出来的，它和人治原则一样，都属于国政治理的手段，但两者泾渭分明，不可含混，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制度。有中国大陆学者认为：法律要由人制定，要有人执行；任何统治者不能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进行统治，因此他们认定法治和人治不能截然分开，只能相互结合。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其错误就在于简单地从是否有人作用和是否运用法律来作为区分人治法治的标准。应该说，在治理国家中有人的作用不等于人治，有法的存在不等于法治。希特勒上台实行法西斯统治，那时候，魏玛宪法照样存在。划分法治与人治的最根本的标志是这样的：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

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权威屈服于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人治。两者不能混淆。正如潘恩所说：“在专制国家国王便是法律，同样的，在民主国家中法律便成为国王”。英美法系的判例法是不成文法，法官的判决书对后面的案例之判决有约束力，这是不是人治？不是。因为在英美法系，判例就是法，一旦成立，就具有普通的指导意义，不仅对被裁决者有约束力，对法官本人也有约束，因为判决后，该判例就独立于法官本人，获得了独立性，以后法官本人也要以判例为依据，如果不依从，乱判就是人治，所以，判例法也是法治。

在民主社会中，法治精神当然要依托诸多法律条文来实现，而法律也是经过正当程序进行表决的结果，它以公共意志的形式体现了多数人的意志，但是法律一经实施，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全体社会成员都要无条件服从。不能因为谁是领袖或执政党，就可以在法律规范外自行其是。假如“法律是统治阶级意

志的体现”这一理论是成立的，那么民主社会中，这一理论谈的是立法层面，而绝非执法层面。在现代专制社会中，有些国家也有非常完备的法制体系，也有方方面面的法律条文，但这仅仅是“人治”之下的法制，而绝非“法治”。人治这一概念描绘的是个人、少数人或某政党因缘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手段，对社会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人治所指的，就是专制社会中的国政治理手段。

在专制社会中，立法过程通常就存在人治的问题，法律往往不是经过正当程序进行表决的结果，比如中国大陆现在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没有立法权限的情况下，有些部门和有些地区为了自身利益进行立法活动，重庆和上海等地立法征收房产税就是一例。再一个问题，专制社会的立法往往用法律形式确定某些人、某些政党或某些团体垄断地位，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垄断地位。通过立法，确定永久的执政党；通过立法，制定准

入门槛，确立官僚经济的行业垄断地位，等等。第三个问题，如果法律成了攫取利益的障碍，统治者往往置法律于不顾，比如以前，毛泽东非法囚禁国家主席刘少奇，比如现在，警察绑架合法公民。这都是人治的一脉相承。“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一理论不仅在立法层面是成立的，在执法层面也是成立的。把个人、少数人或某政党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随意性很大，就是人治。

据知情人记载，1954年宪法讨论会上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世上本无事，洋人自扰之。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准备玩宪法，结果亡的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可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

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以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当然啦，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公安机关不是汇报说国民党很难抓吗？我看，到了一定时候，他们会自己跳出来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如果没有我们党的领导，谁会执行现在

这部宪法呢？有人不是说，敌对势力最尊重宪法吗？敌对势力如果把党赶下台，头一件事肯定就是废除这部宪法，这你们能否认吗？如果党不领导宪法，党就得下台；党下了台，宪法也就完蛋了。同志们，你们说，党不领导宪法能行吗？如果哪个人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那我们也只好说：这个人比工农群众还无知，需要到广阔天地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再改造！我们的党，好比诸葛亮，对于‘宪法’这个阿斗，是怀有极其复杂的感情啊！不公开承认阿斗的领导地位是不好的，是无法向人民群众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当摆设，也是不好的，是无法让党随意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的，也是迟早要被司马懿抓去砍头的。所以，我考虑再三，决定在全国所有学校取消宪法课，开设政治课，让全国人民明白，第一，阿斗还是有的，诸葛亮也受他的领导，不会胡作非为的，放心好啦；第二，诸葛亮是最厉害的，是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不听他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的，严重到比地球爆炸还可怕！”

毛泽东是否真的说过以上的荒唐话还需要更多的解密资料来验证，但说没说过似乎也不太重要，因为毛泽东确实是无法无天，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已经证实了他破坏法律实施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比上面那些话，只有过，而无不及。

四，关于宪政的基本概念

有法律而无法治，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就是政治对法律的干涉，政治对法律的干涉当然是通过政治家进行的。帝王将相、政治领袖、军事强人和政党等，政治家最容易通过政治行为破坏法律的创制和实施。这就要求专门立法，规范人类的政治行为。法治，对应的是人类生活之各种强制性规则，包括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环保的和婚姻的等等，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宪政也是法治的一部分，它所覆盖的领域相对要狭窄一些，对应的只是人类的政治行为，本质上就是要求人类的政治行为符合法治精神。法治精神要求人们的

政治行为也必须符合法治的两个原则，就是平等原则和公正原则。平等原则要求政治权利平等，比如美国，以各州人口为基准选举众议院议员，组成众议院，实现了平等原则；但美国又规定，不论各州人口众寡，以每州两名代表的名额组成参议院，这就照顾了人口较少的州，实现了公正原则。

如果人类的政治行为在平等与公正的原则下受到法律的强制性规范，通常就叫做宪政。宪政之所以叫做宪政，是因为解决政治规范这一问题的法律，主要就是宪法。但是，没有宪法未必就没有宪政，因为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也可以用其他方法解决政治权利平等和公正的问题，英国的成文宪法并不存在，但从政治实践来看，又是宪政比较发达的国家，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所以，当今学者认为英国有宪法但不成文，一是由具有宪法意义的法律文件来体现，有些虽然是普通法律，但内容则涉及国家政治制度，二是由一些历史文件，判例，惯例，制定法构成，这些文件反映了

英国宪政发展的历史道路。在英国宪权发展中比较重要的文件有：1215年的大宪章，是国王和封建领主战争的结果，国王被打败，签订大宪章，对国王权力进行限制约束，如国王没有经贵族会议同意不能征税，这一规定一直沿袭下来成为现在议会的重要权力，尽管宪章的目的是保护封建领主的权利，但包含很重要的原则，即国王权力是有限的，这是宪政的一个重要原则。同样的道理，有宪法未必就有宪政，因为很多宪法并没有解决政治权利平等的问题，更谈不上公正。比如中国大陆的当前宪法就是这样，它首先确定中国是一个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把其他的党派和政治人士对公共事务管理的决定权和参与权彻底否定了；其次，它还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把一部分听话的国人划分到“人民”的行列中，把另一部分不听话或者不太听话的国人划分到“敌人”的行列中，而且这种划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只能给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混乱。

宪政是政治哲学、法哲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尽管对于什么是宪政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历史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却使人们对宪政的概念基本上达成了一些共识，比如，保障权力的健康行使，保障权利的正常行使等等。因此，人们常常从权力和权利两个维度来理解宪政及其运行。宪政是什么？宪政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即民主与法治的结合。或者说，宪政以宪法为形式，以民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标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学界对宪政的概念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是很显然，宪政也可以简单地归纳：宪政就是用宪法来规范政治，而不是用政治来规范宪法。

宪政的要素在细节上是非常复杂的。阿兰·S·罗森鲍姆将这些要素归结为：（1）明确限定政府的权力；（2）设置一套司法结构，使其具有裁决纠纷的最终权力；（3）体现多数人统治的原则；（4）划分政治权力，俾使立法权与执行权得以分立；

（5）创设实现机会平等的措施；（6）保证人们可以获得使社会活动得以有序进行的知识；（7）确认一套‘自然权利’来保护公民的正当个人目的，使之免受干预；（8）保护国家，以杜绝其公民表现出来的双重效忠；（9）保护宗教自由，同时确认人们对上帝及其所创造的宇宙的最高义务；（10）尽管有第（9）条要求，还是应让公民自由选择自己的终极目的。仔细分析以上要素，综合宪政发展的历史与观念，人们基本可以发现，宪政是主张以宪法体系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政治理念与实践。作为宪政两个最基本的方面，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两个维度是西方宪政现代化的产物。1789年法国公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第16条规定：“凡是各项权利未得到可靠保障，权力没有分立的社会，都不存在宪政体制”。这是第一次完整准确地以现代政治语言表述的宪法性文件，它从权利保障与权力限制两个方面申明了现代政治的双重主题。在现代以前，人们努力从权力与权利两个维度认识宪政，并以各种各样的语言表达出来；在这之后，人们基本

上找到了两条交织的线索，构成了理解西方宪政的两把钥匙。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权力与权利两个主题构成了现代西方政治主流话语体系的两个基本主题。时至今日，权力的分配与限度，权利的行使与保障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发展的两条线索。围绕着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现代宪政亦得以不断发展。

中国大陆是一个政治高于法律的国度，毛泽东时代叫做“政治挂帅”，胡锦涛时代叫做“党的事业至上”。2007年12月26日，胡锦涛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提出“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切实承担起带领广大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保障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而不懈努力。”胡锦涛这一说法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引起了部分法律界人士的非议，但是这显然不是法律界人士在抠字眼，因为中共建政以来的政治传统就是这样的，胡锦

涛只是用新的词汇包装了毛泽东的思想。当下的中国法律不能仅仅用法治眼光去观察，甚至不能用法制眼光去观察，必须从政法的角度去理解。在这里，法律只是政治的附庸。政法不仅是一个系统，主要地是一条战线，即所谓政法战线。战线就是战线，它不是花言巧语，而是战斗的前沿。政法战线就是把法律当做政治斗争的前沿，如此而已。

有御用学者反复论证，认为中国走上了宪政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我可以很明白地说，这是胡扯。民主就是民主，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分，宪政就是宪政，也没有社会主义宪政和资本主义宪政的区分。所有这些区分是别有用心的或者是收了政治红包的。列宁所开创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不可能有民主和法治，也不可能有宪政。

人的本性不变，人与利益的相关性不变，但利益本身在变，具体的利益在变，具体的自由在变，

具体的权利和义务都在变，也就是说，社会公正的标准也在变。我们说，法治的两个原则是平等和公正，但是法治需要不断通过政治进行调整才能完成这样的使命。法治的精神不变，但法治的细节必须反映时代的潮流，需要与时俱进，适应不断变化的生活。权利与权利的冲突，权力和权力的冲突，还有权利与权力的冲突，这些冲突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经过调和而达到社会公正，就是道德与法律的成果，这个成果主要就是法治进步。法治的发展与进步是这么启动并进行的呢？这当然是依靠人们的政治参与来解决。不可否认，法治的每一发展与进步都是人们的政治成就。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权利与权利的冲突，权力和权力的冲突，还有权利与权力的冲突。如果说法治的原则是平等和公正，那么一个法治社会的政治就不能使无序的，它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宪政。

当政治用宪政来进行规范的时候，政治才是合理的政治，只有合理的政治才能促进法治的发展与

进步，从而使社会达到平等和公正的目标，从而使保证人类拥有更多的自由、人性和尊严。另一方面来说，政治没有规范，就是危险的政治。自从列宁开创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种政治模式以来，因为政治而死于非命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斯大林杀完了党外的敌人就开始杀党内的敌人，毛泽东斗完了党外的敌人就开始斗党内的敌人，北朝鲜的金日成和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也是如出一辙。对当今的中国而言，实行宪政以规范政治，并重建政治伦理，已经成了当务之急。

五，关于公民社会的基本概念

在中国流行的公民社会概念大致有三种：一是三分法，它将社会分成政治、企业和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三驾马车中的一驾；二是二分法，它将社会分成政府和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权力之外的权利社会，三是不分法，它将社会看做一个整体，民主达到一定标准的社会就是公民社会。在公众视野中，人们没有学者那么神妙，他们简单

地把公民社会理解成一个整体，是民主社会一个新形态和新阶段的新型表述。在一般人看来，公民社会首先要有合格的公民，这些公民享有公民权利，然后去承担了公民义务，然后才有公民社会。也就是说，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的总和，就是公民社会。正如共产极权社会是专制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一样，公民社会是民主社会发展的崭新阶段，可能也是最高阶段。

公民社会是以平等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凸显公民价值为目的的民主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启蒙运动留下的丰厚遗产的体现，它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崭新阶段。公民社会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不是一种模式，它是一系列社会元素组合后形成的一个民主社会阶段性新标准。就当前来说，世界上也不存在一个公民社会的样板，每个国家公民社会元素的分配各具特色，瑞典、挪威和丹麦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样板，更侧重于实现人民的福利指标；美国是自由主义和多元

主义的样板，更侧重于个人自由和文化多元的指标。

公民社会是以公民权利平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多元社会。由于公民权利的平等，公民社会将呈现多元平衡和多元共和。权利的共和、信仰的共和、文化的共和、经济的共和和政治的共和，等等，更重要的是生活的共和。从多元到共和，多元是表现分歧关系的，共和是表现伴生关系的，多元是外在的，共和是内在的，而权利始终是它们的轴。在以往的历史中，共和是一种权力关系，周召共和就是极端的共和样板，中外概莫能外；在公民社会中，共和不仅是权力的共和，也将是权利的共和，而且是权力和权利相互之间的共和，是在平等的前提下形成的一种权力和权利安排。以往的共和在根本上讲是权力的政治分赃，中国在清帝退位以后，政治野心家们大多都是在寻找一条权力共和的道路，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都是这样一种思路，当这些思路不能求得权力共和的时候就进行国内战争。当然，国内战争的口

号是人民共和，但其结果却连权力共和都没有达到，而是可悲地形成了共产专制。

现代民主国家在某些发展时期也存在很多权利不平等导致的各种社会现象。其中，马克思所抨击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是确实存在的，并成为人类历史的一大罪恶，关于马克思，我想人们没有必要因为共产主义的全面失败而彻底否定。做为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在很多方面都是对的，但是怎样处理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方面，马克思显然是错了。马克思只看到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在当时的社会中尖锐对立，却没有看到民主制度自我调节的功能，没有感悟到民主化过程是一个弃恶扬善的过程，他为未来错误地开出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药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民主社会的资本主义时期，它洞察了资本和劳动的尖锐对立，为今后的历史发展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是促进了民主制度的自我完善，一个是促成了共产极权制度的建立。

回顾国际共运史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领袖们在初衷上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甚至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样的共产魔王也是怀抱改造社会的美好理想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是共产主义者采取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的手段注定不能解决平等公民权利的问题，这也就决定了他们一定会走一条从侠客到魔王的道路，这是一条走向奴役的道路。当共产党领袖们以大多数人的名义去剥夺少数人权利的时候，大多数人的权利也就荡然无存了。这一点，中共早期的领袖陈独秀被驱赶后有很好的醒悟，后来中共的一党专政实际完全印证了陈独秀生前的相关预言。中共的一位高级将领说，民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弃恶扬善的历史，但是他也应该能看到，专制社会的历史都是弃善扬恶的历史。从世界格局来看，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几经较量，甚至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双方都在血与火中走了过来，但走法却大不一样。民主社会经过坎坷把民主完善起来了，为此不惜吸收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些有益营养，而专制社会却往往是在坎坷中变得更加专制。从另一个角

度来说，民主发展的后果是社会更加多元，而专制发展的结果是社会更加一元。

民主必然包含自治，自治下的开放才是真正的开放，真正的开放就必然造就多元社会。多元是自治和开放的结果，而当今民主社会的发展也验证了这一点，越民主的社会越自治，越开放，也就越多元。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只是要打开国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对内开放的问题，就是公民自治的问题。邓小平和慈禧太后一样局限于对政权的把持，他不明白开放的核心首先是通过公民自治实现对内开放，以此消除各种社会壁垒，这才是真正的开放和真正的解放。相比于共产党人的呆板，社会民主党人早就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肃性。早在 1928 年汉森就阐述了他的人民之家理想：“在一个好的家庭里没有特权者或者被冷落的人，没有宠儿，也没有后娘养的。这里没有人看不起人，也不会为了获得个人好处而损害他人利益。在这里强者不会压迫、掠夺弱者。在好的家庭里有的是平等、关

照、合作与互助。实行大型的人民或公民之家将意味着拆除所有把公民分成有特权的与被冷落的、统治者与依赖他人的、富人与穷人、占有者与被占有者、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社会和经济壁垒。”

中共的部分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的部分多元，而公民社会是一个公民自治的社会，因而也是全面开放而多元的社会。公民社会的政治将最大限度地根基于公民自治型政治，不仅对各政党开放，而且对全体公民开放，制度设计将使公民将有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和平台。各种政治力量按政治规则和政治伦理运行政治，既杜绝一党政治独裁，又杜绝政党政治对公民政治的反叛与异化。公民社会的经济将最大限度地根基于公民自治经济，以公民自治经济为基础依照市场规律发展协作经济、规模经济和全球化经济，以此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实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大平衡。公民社会的文化将对大限度地根基于公民自治型文化，公民文化服务公民

生活，传统的和现代的，本国的和别国的，属灵的和属世的，等等，都将根据公民自身的需要而扬弃，并不根据统治的需要而确立。以平等公民权利为基点，以自治和开放为要点建设多元的公民社会，这样的社会必然能打破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无序竞争现象和垄断现象，必然能解决信仰的不平衡、意识形态的不平衡、文化的不平衡、经济的不平衡和政治的不平衡等一系列人类问题。

马克思所设计的目标也是“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是马克思所谓的科学共产主义因为夹杂了阶级镇压所以更加空想和更加不实际，带来的危害也更多。放眼未来，共产极权很快就要被完全淘汰出局，而历史也已经昭示，人类的出路就是平等公民权利，建设多元的公民社会。在以往的历史中，没有一种自由像公民一样更加自由，没有一种平等像公民一样更加平等，也没有一种东西更像公民一样不断创造自己全面发展的条件。人们曾经把所谓

的资本主义社会批臭了，好，我们可以不喜欢它，人们又曾经把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批臭了，好，我们也可以不喜欢它。现在，让我们远离专制，努力走向公民社会吧。

六，关于公民的基本概念

公民社会是以公民权利平等为基础，以自治和开放为特征的多元社会。自治、开放和多元，这些也许是很麻烦的概念，但是公民这以概念绝对不是很麻烦的。首先是公民，然后是社会，才有公民社会，这样理解大概没有错。

一般来说人们是这样定义公民的：公民，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但是这样一个定义似乎不够，因为在专制国家里生活的人，他们也有一个国籍，也有该国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任何一个国民，不可能一点权利都没有，中国大陆国民也是有那么一点点法律权利的，卡扎菲统治下的

利比亚国民也是有那么一点点法律权利的，甚至北朝鲜国民也是有那么一点点法律权利的，但他们都不是现代公民。在现代文明中，公民权利必须是平等的权利，只有背负这样的公民权利，才能称得上公民。如果人的法律权利不平等，就意味着一部分人在法律上已经居人之下，他们必须被人统治，被人压迫，当然，现在都美其名曰“被人领导”或者“被人代表”，而另一部分人则具有法律规定的“领导地位”和“代表地位”。人如果在法律上就处于被统治和被压迫的状态，那显然就是被奴役状态，揭开漂亮的词语包装，就这么简单。人如果被奴役，就与现代公民无缘了。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你在法律上就是一个“被领导”的低级地位，而且上位的机会被法律永远排除，那么你就成了“领导者”英明背后的花絮，你就成了“领导者”的工具，而人一旦成为永久的工具，就是被奴役。对不关心政治的人，这个比方可能有些难懂，那么再打个比方：如果你是个四处漂泊的农民工，那么你的工资待遇、社保医保和其他待遇就会比城市工人差一些，虽然你

们干的都是一样的活，但因为体制给你们们的身份不同，你的待遇就是差一些，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你的一部分劳动被别人制度化抢劫了，那么很显然，在进行这一部分劳动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不带枷锁的奴隶。

在历史上，最早的具有制度性的民主政治，出现在古希腊的雅典和古罗马的城邦时期，这期间，虽然奴隶被排除在公民之外，但是只要具有公民身份，大家的权利大致都是平等的，也就有了公民一说。欧洲中世纪时期，奴隶制的民主共和形式消失了，公民的概念也就不再使用。西方的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公民的概念被重新提出，各国宪法普遍地使用了公民的概念，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公民这一概念内涵外延也有所变化。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公民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根据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公民以一个国家的成员的身份成为国家事务的决定着和管理者，此为现代公民。从其产生来看，公民作为一个法律概

念，从来都是和民主政治紧密相连的。专制制度下也有公民一说，但这通常属于盗用，目的就是为了欺骗。比如金日成宪法中的朝鲜公民，有什么公民的意义呢？也许在金家父子的眼里他们连一件武器的重要性都不如。

根据以上所述，在民主制度下的法治精神中，我们才能找到现代公民。没有权利平等这一起点，就没有现代公民。也就是说，在专制国家中，没有公民，只有老百姓。但是，专制国家的统治者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专制国家，他们往往说自己的国家是更民主的国家，或者是特色民主的国家，他们总是一口咬定自己的国家里也有“公民”，因为他们那里也有宪法，对公民权利也有相关的规定，甚至花样繁多，比美国宪法规定的权利还要多。但是，仔细观察一些专制国家的宪法权利，看看人们行使这些权利的实际情况，也能拨开云雾，初见端倪。

下面，我们根据宪法权利的落实情况来看看，你

是否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公民，你是否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第一例：如果宪法的制定和你无关，或者不是你委托的议员制定的，或者是一个党派厚颜无耻地代表你制定的，那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民；第二例：马克思写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它还是鼓吹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但它能出版于黑暗的资本主义初期，而你写了一本《自由党宣言》，却不能在你所在的国度里出版，那你所看见的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就是假的，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民；第三例：如果宪法规定你有集会自由，但是你只能在一个主义、一个党和一个领袖的前提下开会，而你要集会，却不予批准，甚至会劳教你，这种情况下，宪法给你的集会自由也是假的，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民；第四例：如果宪法规定你有结社自由，但你只能搞旅游社一类，想搞真正独立的组织尤其是政治性的，那就会进监狱，在这样虚伪的宪法权利面前，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民；第五例：宪法规定你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你连进京上访都会被关进黑监狱，那么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中国政府在最近的一次修宪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也就是人们常称的“人权入宪”。宪法第二章是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其中确定了一系列不可侵犯的公民基本人权。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其中第三十三条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保障中国公民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重要原则之一。除了平等权之外，宪法对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进行了详尽的规定。但是，从宪法权利的具体落实情况来看，中国人距离公民这一神圣身份还很遥远。别的不说，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再看看自己，什么都能明白。

中国距离公民社会太遥远，中国人距离公民身份太遥远，简直和幻想家的共产主义幻想一样遥远。问题在那？首要的就是利益，在专制下受益的那些人、那些组织、那些政党、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即得利益，就和全体想做一个真公民的人对抗。

如果社会上分成主子和奴隶，傻瓜都知道做主子比做奴隶好，谁不想做主子，那真的是傻瓜。我们中国就是想做主子的人太多，做不了主子，也想做主子的狗，做不了狗，就做狗腿子。但是，都是想做其他那些奴隶的主子，而不是做自己的主子。这就是大问题，因为有这个大问题，所以，中国根本就还没解放。人要解放自己，就要做自己的主子，而不是在相互的奴役中给自己戴上枷锁。其次的还是利益，主子坚决要做主子，主子的狗也坚决要做狗，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主子的长期淫威下，奴才也太多，而且都甘心做奴才。中国何以有主子，这和奴才太多也有重大干系。奴才为什么就愿意做奴才呢？这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就有点关系，因为这些传统，中国人里的好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做自己的主子是什么滋味。明明宪法规定的有选举权，一辈子没见过一个选票，也懒得去问，这样的人多了。人家说代表他利益，并且是根本利益，他还欢呼雀跃，高兴啊，终于有了好的主子了。

所以，中国要走向公民社会，首先要让那些主子放下身份，做一个公民，其次是让那些奴才提高一下觉悟，也去做一个公民。再其次，也是很关键的，就是喜欢做主子的狗和狗腿子的那些人，也要做一个公民，不要做狗和狗腿子了。不管你是什么官，也不管你是什么幕僚，也不管你有多少文化，如果你能说：“从前是百姓，如今做公民”，那这个社会就真的会改变不少了。如果每一个人渴望做一个真正的公民，那么通往公民社会的道路就会越走越近，而不是渐行渐远。

七，关于私有制的基本概念

重视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特色，也是最具实质性的原则。从 18—19 世纪以来，各民主国家都在宪法中明示：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最早是 1789 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 17 条之即“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法国 1793 年重新颁布的《人权宣言》中“神圣”二字

删除了，因为财产权在法律上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但在财产的实际占有上，不可能人人平等。这一部分人的财产权可能和另一部分人生存权、平等权发生冲突，可能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在这种冲突中，财产权并不具有绝对的至上性，需要权利之间的妥协，需要各种作出限制。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被视为后自由主义宪法的蓝本，其 153 条规定：“所有权，受宪法之保障”。美国宪法表述比较具体，第四条修正案：“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第五条修正案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

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几次大的革命都与捍卫私有财产权有关。英国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大宪章》就是贵族为了限制王权特别是征税权而同国王斗争的结果。法国的波旁王朝可以任意没收工商业界的财产归国王所有或者赏赐给他们的宠臣、情妇，所以，1789 年的法国革命首次提出“私

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号。18 世纪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是因为英国殖民者颁布《印花税法案》等法令，侵犯了民众的财产权和既得利益而导致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民主革命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用法治的精神确定了私有财产地位，以致各民主国家的宪法中都有了关于私有财产的条款。各民主国家的宪法对私有财产的规定综合起来有三层意思：一是政府承诺并且保护私有财产。二是不绝对排斥征收私有财产，按照宪法的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服私有财产，如迁受灾害、战争。三是可以征收私人财产，但不是随意的，必须依法进行，即必须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并且是有偿的。

保护私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就是规定了政府公权力的范围，为私人保留了自治领域。私有财产权是抵制政府权力扩张的坚固盾牌，因为它是政府权力不可逾越的领域。按照启蒙思想家的理论，政府存在的正当理由就是保护公民的包括财产权在内的各种权利。人如果没有权利占有和支

配自己劳动的成果，也就失去了维护生命的正当手段。人的生存就失去了动力和条件。所以，财产权是永恒的。哲学家吴德曾经说过，没有财产权与经济自然，国家便成了唯一的老板。不论你名义上有多少政治自由，如果没有财产权就没有条件去行使这些自由，有了财产权，公民就有了改进生存条件，追求幸福，追求自由的权利。从另一角度说，如果以政府的名义剥夺人们的私人财富，最终也必然会把人们的自由和生命强制性“充公”，因为离开了人以后，“公家”并不能再做什么，财富的再生产需要由具体的人来进行，这样一来人就不得不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也就不可能成为自己的主人。现在可以回头去看看共产极权时代的经济理论，在那些文字里，人早已被描述为生产力的一部分。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说人是生产力中最能动的一部分，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把人当做经济发展的工具，这本身就已经不人道了。当前的中国不多谈这些传统的理论了，但是问题依然如故，执政者满口都

是发展经济，而对人权状况淡然视之，实际上是传统理论的延续。

公民存在的前提，必须以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存在为前提，对生命的自主权，对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人如果没有这两样就与牲畜相似了，谈不上公民。奴隶制度下的奴隶，说白了，也就是这样。北朝鲜人说：“生命属于金日成将军”，这话一出口，他就已经成了奴隶。好，现在再来谈财产。生命不是静止的，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就是支配财产的过程，只有对财产具有自由支配权，才能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生命、自由和财产在人类活动中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概念。如果劳动成果不归你所有，你没有任何自有财产，不能支配任何财产，那么自由对你而言也就根本谈不上。中国的“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农具、牲口和家用锅碗瓢盆都被公社化了，他们连吃饭喝热水都不得不在公社食堂，他们还能有什么自由呢？

我创造的财产属于我所有，由我来做主，由我以各种合法的方式使用和享用，这样一种说法显然是合理的，但这本质上就是私有制。共产主义者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和不平等的根源，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从历史来看，人类几乎所有的罪恶都是为财富而来。但是，人类为了自身能够更好地生活下去，也不得不追求更多的利益和财富，而利益与财富就这样成了人类进步的动力。连恩格斯也说：“文明时代从它的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也可以这样说，如果剥夺了微不足道的个人财富，就等于去掉了文明时代的推动力，也就等于进入了一个野蛮时代。果然，从列宁开始创立无产阶级专政以来，共产极权制度以各种方式开始剥夺人们微不足道的个人财富，使部分国家的人类文明在一瞬间掉入到中世纪以来最黑暗的野蛮时刻。因为剥夺了个人财富，连人们对食物的使用

权都被剥夺，苏联、中国和朝鲜等各主要的极权国家都发生过大饥荒，中国为此死亡数千万人。

从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来讲，财产权既是推动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推进器，同时，它也是构成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私有财产权是指个人拥有的全部的财产所有权，不仅包括物权（动产和不动产的所有权），还包括债权、营业权以及无形财产权（特许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甚至还包括思想权和知识产权。在共产极权制度下，政府可以没收物权（动产和不动产的所有权），还包括债权、营业权以及无形财产权（特许权、专利权、著作权等），但是它们难以没收思想权和知识产权，因为思想和知识这类财富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思想和知识如果不能被用来歌颂政府就成了极权政府的敌人，于是对知识份子的大规模钱杀就成为必然。中国的“反右运动”就把几十万有独立想法的知识分子揪出来批斗，或者送去劳改。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干脆把大批有“不良思想”的知识份子从肉体上加以消

灭。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人们对“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一说法进行了一些反省，但是极权制度本身不会从根本进行反省的，它只会换一种方式对抗各种思想的威胁。所以直到现在，众多的异议人士仅仅因为思想和观点，还是会被关进监狱。

民主制度大概是这样的，在私人领域实行自治管理，算是私有制，而在公共领域实行公共管理，算是公有制。你看民主国家就是这样，你自己的事情就自己做主，一票制；如果是大家的事情，大家一起做主，一人一票制。专制制度恰恰与此相反的，个人的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被统治者以“公有制”的名义剥夺了，你的言论自由被言论审查限制了，你的迁徙自由被户籍制度限制了，你家的房子也随时会被人家拆掉。但是，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却在公共领域却实行了私有制，也即公共权力私有化，他们不允许你参与竞选，他们不允许你组织政党，他们甚至不允许你游行示威和罢工。对个人的财富剥夺以后，必须用专政的手段保护这种剥夺，这就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专

制，这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再换一个角度说，因为没有政治上那一票的权利，专制制度下的所谓“公有制”根本也不是什么公有制，只能是政府所有制，或者官有制。你连一票的权利都没有，对你来说哪里有“公有”？政府所有制在经历了反复的分配之后，一定会演变成权贵所有制。也就是说，谁有更多的权力，这些被剥夺来的财富最终就是谁的。中国共产党在建政之后对社会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改造，资本家、地主和农民的财富都被聚集在政府手中，然后呢，大家都明白，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最容易富裕起来的人就是大权在握的那些人和他们的孩子，终于，中国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又合法地装进几百个家庭的私人腰包里了。所以说，共产极权之下没有任何公有制。

世界上有没有公有制这种东西呢？有。在民主国家，山脉和海洋有可能是公有的，公路可能是公有的，机场也可能是公有的，火箭和卫星可能是公有的，军队是公有的，甚至很多企业也可能是

公有的。但是，民主国家的这种公有制建立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这种公有制是建立在政府公有的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民主国家的公有财产最终在所有的公民那里都有平等的决定权和管理权，是私有制的一种升华，而不是对私有制的背叛。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个人对很多事情是无能为力的，个人对财富的掌握和使用从来就不是无限的。财产权往往伴随着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它的使用也往往应服务于公共福利。在个人无能为力、难以进入的领域和不乐意进入的领域，为了公共福利的需要，公共事业就是必要的，公共财富的积累就是必要的，比如在航天领域，比如在环保领域，都是必要的。在今后的文明进程中，个人无能为力、难以进入的领域和不乐意进入的领域也许会越来越多，公共财富的积累也许会越来越多，按照社会主义理论来讲，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程度也会越来越高，但公共福利最终也是为个人生活服务的，它没有任何理由对个人生活

进行非法侵犯。真正的公有制必然伴随着政治上的平等，必然是一人一票，就这么简单。

八，关于主权在民的基本概念

最初提出主权在民这样一种观点的是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但他并不主张民主。霍布斯认为：人民把权力交给主权者，人民则成为臣民；主权者享有无限的权力，权力神圣不可侵犯，臣民在政治上思想上都要绝对服从，对“元首”的命令，要象医生开了药片一样，整片地吞下去，不能品尝，也不能分析检查，否则就可能发生谬误，也可能发现真理，发现谬误会引起的怀疑，发展真理会激动感情，两者都可能破坏和平安全，他甚至主张，为了和平，必须牺牲真理；主权是不能分割的，必须由君主独裁，“权分则国分，国分则不成其为国”。霍布斯用他独特的主权在民理论维护君主专制的，但他的著作在君主专政复辟的时代被政府下令烧毁，这是专制制度对他的嘲笑。

主权，通常是指国家固有的对内对外保护独立自由的权力，是对最终统治权力的高度抽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权更重要的是指一种观念、一种理论、一种原则。主权在民，又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它集中表达了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的政治理念，确立了人民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

明确提出主权在民并进行系统阐说的是法国思想家卢梭（1712～1778）。卢梭认为，主权意味着执行公意，主权者是由组成国家的个人组成的。当国家根据社会契约建立之后，所有公民的一致同意便是公意的表示。由于国家是契约的产物，那么国家权力只能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和认同，这才是政府及其权力存在的唯一合法依据，政府行为一旦违背人民的授权和公意，就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

1776年6月12日通过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说：“所有的权力都属于人民，因而也来自人民”。1776年7月4日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布：“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指天赋人权）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这就是“主权在民”原则的具体运用。1863年林肯在葛底斯堡阵亡将士墓前用六个字概括了主权在民，这两个字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我们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的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林肯用“民有、新治、民享”这三句话来说明“主权在民”的全部含义，这种解释，成为西方国家普遍流行的定义。这一定义，在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主权在民论宣告了君主、贵族对于国家所有权的破产。此后，主权在民就成了民主政治的第一原则。它始终站在政治伦理的最高点，对一切政治

行为进行道德审视。自 1789 年法国《人权宣言》宣示“国民是一切主权之源；任何个人或任何集团都不具有任何不是明确地从国民方面取得的权力”以来，主权在民在各民主国家的宪法中以得到普遍认同，成为各国宪政制度构建的根本价值取向。美国宪法在其序言中开宗明义写道：“我们美国人民为美国制订并确立了这种宪法”。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第三条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和通过公民复决来行使国家主权”，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日本国宪法第一条也规定：“天皇的地位”基于主权所存在之日本全日本国民。1947 年 12 月 22 日通过的意大利宪法第一条规定：“意大利是一个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民主共和国。主权属于人民，人民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和形式内行使主权”。2002 年意大利宪法法院宣布：根据宪法第 1 条，唯一的主权主体是人民，而非国家。1975 年 6 月 7 日通过的希腊共和国宪法规定：主权在民为政府的基础。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和民族，并依照宪法的规定行使。1976 年 4 月 2 日颁布的葡萄牙共和国宪法规

定：统一而不可分的主权属于人民，人民依照宪法规定行使主权。1978年12月6日西班牙公民投票批准的西班牙宪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西班牙人民，国家权力盖源于此。1982年11月7日公民投票通过的土耳其宪法第六条规定：主权无条件地属于全体国民。1986年菲律宾宪法规定：菲律宾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其主权属于人民，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1987年10月29日公民投票通过的大韩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大韩民国是民主共和国；大韩民国主权属于国民，一切权力来自国民。

上面所讲的，即是说明主权在民首先是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提出后，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最终，主权在民原则变成了制度化的社会实践，成了一种看得见和摸得着的事情。

从法律的含义来看，主权在民意味着每个公民都平等地拥有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对于国家事务有同等的发言权。但是，从管理的角度看，主权不

可能由所有公民共同行使，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大国，还是梵蒂冈这样的小国，都只能由公民中的一部分专门人才和专门机构来代行主权在民，即通过“授权”的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公民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依照正当程序把自己的权力授予代表，由这些代表行使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权力，人民享有国家主权的“所有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罢免不称职的代表或其它政府官员，这就是主权在民原则制度化的过程。在不同的民主国家，这个过程不完全一样，但从大的方面来讲，则是一样的。既：经过人民授权，政府才有最终的合法性。

在当今世界，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并存，便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通常情况下，民主国家的公民们并不讨论人权更高还是主权更高的问题，因为主权在民已经制度化地融入了自己的生活过程，他们有权决定私人领域的一切事情，也有权依照正当程序决定并参与公共管理，在他们那里主权和人权通常不发生冲突。但是在专制国家，人们

总能碰到人权更高还是主权更高的问题，人权和主权在这里经常发生冲突，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呢？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国家的主权并不完全属于人民，同时人们也缺少人权，这就使得主权和人权都不在实际的生活过程中，而人们面对虚无缥缈的东西时最容易发生辩论。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民主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流，各种侵犯人权的现象经常引起民主国家的批评，但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往往拒绝国际社会的批评，并美其名曰“事关主权，决不让步。”以主权为幌子，在国际上行骗，已经难以为继，但在国内，该骗术还有一定市场。

人权本来就是先于主权和政权的，没有人权，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和政权。如果主权在民得以制度化实现，并浸透在人们的生活点滴中，那么人权和主权并无高下之分，只有先后之别。结论就是如此。

九，关于有限政府的基本概念

政府，俗称“官府”、“衙门”、“公家”等，是一个政治体系，于某个区域订立、执行法律和管理的一套机构。广义的政府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狭义的政府仅指行政机关。一个国家的政府通常还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法治的最重要的政治职能就是铲除无限政府，确立和维持一个在权力、作用和规模上都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的“有限的政府”。与有限的政府相对立的是无限的政府。

有限政府的第一层意思就是，政府的权力必须来源于人民，必须经过人民的授权。公民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依照正当程序把自己的权力授予代表，由这些代表行使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权力，人民享有国家主权的“所有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罢免不称职的代表或其它政府官员，这就是主权在民原则制度化的过程。在不同的民主国家，这个过程不完全一样，但从大的方面来讲，则是一样的。既：经过人民授权，政府才有最终的合法性。当今世界，依照国际法具有主体地位的政府有二百多个，有民主政府，也有专制政府，这些政府只要得到国际社会的任何，在国际法领域就是合法政府，可以在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但是在国际法上合法的政府，并不是这里所说的合法政府。在国际上，一个政府是否合法，不看它是否得到了本国人民的授权，而是看它是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尤其是看它是否得到了主流大国的承认。这里所说的合法政府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指那些得到本国人民授权的政府。前者讲

的是“承认”，后者讲的是“授权”，就这么一点点区别。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政权在其初建阶段有独特的过程，也许是革命的过程，也许是改良的过程，也许是革命与改良混杂的过程，甚至可能是军事政变的过程，从历史上看，这些过程都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任何政权的更迭都不是空穴来风的，而是有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原因的。也就是说，任何政权更迭的背后都有强大社会力量的支撑。但是，不论革命、改良，还是政变，政治家和政党在政治变动之后应该把权力还给人民，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保障公民权利，通过自由公正的普选获得人民的授权，才是合法的。在政治上来说，一个政府如果要自称合法，其权力的来源是有条件限制的，这个条件就是得到人民的授权。列宁和俄共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先是参与立宪会议，后因立宪会议的多数人不同意他们的主张就破坏立宪会议，拒绝宪政民主，实行一党专政，侵犯俄人权利，所以列宁和俄共的政府在

政治上是非法的，它没有得到俄国人民的授权。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革命胜利后，也是违背了建政前的民主承诺，拒绝宪政民主，实行一党专政，通过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政策在全社会制造恐怖气氛，从来没有搞过自由公正的普选，所以中共政权在政治上也是非法的。非法的政权是枪杆子里出来的，合法的政权是选票中出来的，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要想合法化，必须通过自由公正的普选这一关。可惜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的政治思维依然相对落后，甚至有御用文人司马南跳出来：要想轮流执政，请拿 3000 万人头来换。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有限政府的第二层意思在时间上体现，政府必须定期更换，定期获得人民重新授权。其他的政治人士被制度化地排除，而一部分政治领袖和他们的后人持续把持公共权力，这就不是有限政府；其他的政党被制度化地排除，而只允许一个政党组建政府，这就不是有限政府。在专制制度下，一个政治领袖或者一个政党数十年把持政权，生

杀予夺，这在当今国际政治现实中也是司空见惯的。北朝鲜共产党领导人金日成把国家元首的位置传给儿子，儿子又要传给孙子，在这样的景象下，北朝鲜政府就不是有限政府。相比之下，毛泽东身后的中国共产党就要比北朝鲜共产党好很多，但中共依然不是有限政府，因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搞自由公正的普选，而是换了一种叫做“集体接班”的传宗接代方式。毛泽东等前一辈革命家已经相继故去，但现政权中当家人的主要还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儿孙，或者是和他们有裙带关系的人。中国大陆不实行普选，但每过五年就要“选举”一次，实际上是任命和推选。在“两会”召开的时候，你观察参会名单就容易发现，投票“选举”的是那一拨人，“候选人”也是那一拨人，而平时主理政务的也是那一拨人，换来换去就那一拨人。内部循环而已。

有限政府的第三层意思在空间上体现，政府必须有所不为，甚至有些领域永远不能进入。在文明政治中有这样一种精神，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

即违法；对公民而言，法无限制即自由。政府的规模有多大，机构设置有多少，职能范围有多广，立法要合乎什么程序，执法要合乎什么规范，违法了要受到什么惩罚，这些都有明确而严格的法律条文做出有效限制，这就是有限政府。在当今天中国大陆，“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即违法；对公民而言，法无限制即自由”这样一种理念近年来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尤其是在《行政许可法》颁布以后。但是一纸《行政许可法》并不能在中国大陆建立有限政府，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有些根本没有进行，尤其是行政管理的理念、方法、制度等都存在诸多问题。在政府的实际工作中往往还是这样，既：“对政府而言，法无限制即自由；对公民而言，法无授权即违法”，与普世价值正好相反。特别是基层政府，它们做什么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是否授权的问题，而是政治是否正确的问题，这就必然造成对普通国民的人权伤害。在一党专制之下，虽然也会有诸多法律条文限制政府的行政权力，但是因为政治高于法律，所以法律的有效性就打了折扣。

当然，有限政府，不是仅仅是说法律能够有效约束它，没有这么简单。有限政府最前置的含义是说，有一些东西它不能侵犯。就是：生命、自由和财产。美国《独立宣言》对“自然权利”作了这样解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有从他们“造物主”那边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必须注意，这些权利是不可转让的，公民不能把这些权利转让出去，政府也不能侵犯这些权利。美国宪法通过修正案的方式确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不得立法禁止宗教活动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要求申冤的权利”。这就是著名的“不得立法”条款，它用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语言规定，国会不得起草通过可能侵犯民众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国会万一“一不留神”通过了有可能侵犯民众个人权利的法案，那就是违反了宪法，这样的立法行为和由此立出的法，就是非法的，就不能成立。这就是“非法

之法不是法”的意思。很显然，这一条款的矛头不是对准政府的，而是对准国会的。这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宪法正文中已经有过类似条款了。美国宪法第 1 条第 9 款规定，联邦议会“不得通过任何褫夺公权和追溯既往的法案”。紧接着，在第 10 款中，惜墨如金的美国宪法又重复了一遍，规定各州也不得通过这样的法案或法律。可见，这是美国宪法一以贯之的精神，但也正是我们中国大陆所缺少的精神，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经常通过一些侵犯民众基本权利的法律和文件，比如通过一个《决定》的方式立法禁止某种宗教活动。再比如，在 2011 年的大学生运动会前夕，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在官网公布文件规定，5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否则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有法律专家评论说：禁止上访讨薪，找不到任何法律依据，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没有任何权力禁止上访。但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中国。

有些人认为有限政府会妨碍决策的有效性，这是错误的看法。有限的政府与有效的政府并不对立，相反，有限的政府是有效的政府的前提。希特勒的独裁政府不是有限政府，看起来决策很快很有效，想对谁发动战争就随意发动，但最终给德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并导致了德国的战败，这不是真正的有效；斯大林的极权政府搞个“肃反”决策也很快，斯大林个人说了就算，但是导致千万人头落地，这也不是真正的有效；毛泽东的极权政府根据毛泽东的个人意图马上就能做出决策搞个“大跃进”，然后几千万人饿死，这也不是真正的有效。事实已经证明，无限政府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而且往往很快见效，人民也很快遭殃，大跃进、文革之类的“伟业”，就是这类政府的最典型的注脚。没有限制的权力，必然要导致对权力的滥用，从而败坏了政府的能力，甚至导致政府被革命力量颠覆，苏联东欧是例子，萨达姆和卡扎菲也是例子。前车之鉴，后车之辙。

真正有效的政府，必然是有限的政府。有限的政府，它的权力界限非常清晰，不该它做的，它就不必要去做，人民知道它没有相关权力，也就不会责怪它。如果一个政府的权力很大，边界也不清晰，该不该它做的事情，它都要去做，最终就是很多事情都做不好，而民众知道它的权力很大，就会责怪它。比如各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旦政权在握，总是要领导一切，人们的油盐酱醋、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它什么都想管，一旦管不好，人们就会骂它，甚至想把它轰下台去。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往往就有这样的现象，工作不顺心都会大骂共产党，当然是悄悄骂，人们大多不敢公开骂。反过来再看有限政府，有限的政府责任非常明确，不该它做的事，它可以不做，但该它做的事情大多也做得很快很好，很有效率。你看日本政府救灾快不快？你看法国政府轰炸卡扎菲快不快？你看美国政府斩首拉登快不快？都很快。所以应该有这样的结论：一个合理的政府，理所当然地只能是有限的政府，不仅因为它政治合法，而且因为它真正有效。

有些乐于为专制制度辩护的人可能会说：绝对的无限政府是不存在的。那么最后有必要说明一下：判断有限政府与无限政府的尺度在于，一个政府或者一个政权在权力、职能、规模上是否受到来自法律的明文限制；是否公开愿意接受社会的监督与制约；政府的权力和规模在越出其法定疆界时，是否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

十，关于三权分立的基本概念

古代的皇帝以至地方官员均集立法、执法（行政）、司法三大权于一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三权分立亦称三权分治，是民主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则。其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分权的目的在于避免独裁者的产生，三权分立具体到做法上，即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分属三个地位相等的不同政府机构，由三者互相制衡，是当前世界上各民主国家广泛认可的一种民

主政治思想。三权分立原则最初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有明确表述，在古希腊的政治生活中也有所实践。在近代历史上，孟德斯鸠在总结前人思想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三权分立作了系统的阐述。

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理论，在 18 世纪的西方引起重大的社会反响。为了保障公民自由和限制政府的权力，美国比较彻底地接纳了孟德斯鸠的想法，在美国宪法之内清楚地把行政、司法、立法分开，而且让它们互相制衡。根据美国 1787 年联邦宪法，联邦政府由国会、总统和联邦法院分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是最高立法机构，有权弹劾总统和联邦法官；总统是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行政高级官员、执行各项立法，拥有军事统帅权和外交权，总统的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总统及其所任命的各部部长不对国会负责，在紧急状态下总统可采取宪法以外的非常措施；联邦法院由若干终身任期的大法官组成，是

最高的司法部门，对宪法和各项法案有最终解释权，有权裁决涉及国家和各州之间的重要案例。在当时这种宪制是前所未有的崭新尝试。至今美国联邦政府的三权分立，仍然是众多民主政体中比较彻底的。而美国大部分的州政府亦有相同的宪制架构。

1863 年林肯在葛底斯堡阵亡将士墓前用六个字概括了主权在民，这两个字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我们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的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林肯用“民有、新治、民享”这三句话来说明“主权在民”的全部含义，这种解释，成为西方国家普遍流行的定义。这一定义，在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主权在民论宣告了君主、贵族对于国家所有权的破产。主权在民就成了民主政治的第一原则。它始终站在政治伦理的最高点，对一切政治行为进行道德审视。主权在民就要求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而有限政府就是说政府不能侵犯人们的生命、自由和

财产，它只能为着保护人们的权利而成立，并且人们能够通过法律有效约束它。怎么才能有效约束呢？就是从技术上把政治权力分开，使之相互制衡，也就是三权分立。在民主国家，人民有最终的主权，他们能决定、选择和参与公共事务，政府依照公民的需要而成立，但是政府掌握了权力以后就会变成一个强大的身外之物，一旦遇到各种机缘，它就有可能侵犯到公民的合法权利，那么在选票之外，也就需要对政府做出更有效的限制。经过千百年的政治实践，人们发现了这个窍门，要想对政府做出更有效的限制，就是把它们的权力分开，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然后再共同服务于全体公民。

三权分立的基本政治功能，就是在技术上实现主权在民的民主制度，并且能有效防止权力自我扩张导致专制回潮的问题。在现代政治文明中，所谓政治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三权分立”的制度。“三权分立”对于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于避免专权现象和减少腐败，对于促进地方政

权的建设，对于保证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对于政党和非政府组织推动社会进步等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三权分立制度在各民主国家的具体模式不尽相同，但体现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国家职能部门分别拥有其特定的权力，并在相互牵制中达到权力的平衡。现在，不少国家根据自己国情，积极吸取三权分立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努力建成高效、廉价的国家政治体制。权力制衡思想根源来自一种理念：即便掌权者是由人民选出来的，但他们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可以这么说，权力就象病毒一样，受到的制约越少，病毒就复制传播更快。三权分立就是在国家的权力体系内建立免疫机制，每一种权力都是另一种权力成为病毒后的抗体，这样才能保证权力体系的基本健康。

一个简单的问题，一张大饼需要由三个人来分，如何作到尽可能的公平呢？最好的选择当然是让公众选择三个人去做这件事，并让这三个人都站在公众的视线内，接受公众的监督。但是，这还

不够，必须让他们三个人分工，一个人负责提分饼的方案，一个人负责切饼，万一分饼的人和切饼的人相互勾结起来营私舞弊，就有第三个人根据公众的要求做出公正的评判。这样，他们三个人做的这件事才能在符合公众利益的前提下达成一致，从而保证了饼分配的公正性。这个问题说明了什么？它展示了从人民主权到有限政府，再到三权分立的逻辑，也形象地表现了权力制衡的重要性！

当一个人，一个机构或着一个组织权力无边的时候，它对人民利益的侵害也许就会随之而来。那怎么办呢？惟有走分权之路，并让不同的国家权力机构相互制衡，不让一方过于强大，在制度内容设计的时候，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让立法和行政机关相互制约。这样，当一个国家机关发生侵权时，另一个国家机关可能会制衡它，并纠正它，而公民可向另一国家机关寻求保护。血的事实告诉我们：在权力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公民才是安全的；权力自由了，人民就有祸了。分

权制的实质就是限制权力、防止权力过分集中，防止强人独裁专断以保障“有限政府”，并实现“人民主权”的目标。

古往今来的历史证明：在和平的环境下，对人民造成最大伤害的不是杀人的强盗，也非不可抵抗的天灾，而是人祸，人祸就是权力没有受到制约的统治集团，其可怕后果就是千万人死于非命，至于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自由受到侵害的例子就不胜枚举。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大救星，也没有一个政党是救世主，人们不能期盼一群“纯洁的公仆”来“为人民服务”，而必须让权力出自人们的选票，必须着眼于来自权力机构内部的免疫机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人民公仆”是不存在的，只有新式的帝王将相，如此而已。

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权力体系中，至少要体现出现任政府和国会之间的制衡，并且保证司法权的独立。但是，民主国家的权力分立显然不是三权分

立这么简单，它包括各种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不承认任何绝对的权力，这是民主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思路。所以，民主国家不仅有三权分立，还有地方自治与中央权力的制衡，还有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相互制衡，还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制衡，还有宗教社会与世俗社会的制衡，还有媒体与社会的制衡，还有上议院和下议院的制衡，还有律师和检察官的抗衡，还有陪审团与检察官的抗衡，甚至还有人民武装与国家武装之间的制衡。这些制衡构成了民主制度更加健全的免疫系统，使民主社会产生了强大的免疫力、活力和发展力。在民主社会在与专制社会的竞争中，民主社会依靠强大的免疫力、活力和发展力，已经把专制社会的价值观逐渐抛在了人类文明进程之外。

中国大陆当前的政治制度也借鉴了民主国家三权分立的一些经验，立法权由人大掌握，政府部门行使行政权，而司法权由法院来完成，那么这是民主制度下的三权分立吗？显然不是，因为在中国，不管是人大，政府或法院他们并不能独立存

在，都必须服从凌驾于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之上的中共党委。中国实行的是执政党任命官员制度，司法，立法和行政机构的首脑必先是中共党委班子成员。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不管是司法，立法或行政机关都无法单独行使其权力，而中共的最高机构是政治局，换句话说：一切权力归政治局！三权分立的精髓是不承认绝对的权力，但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存在一个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

中国的政治体系不是分权制衡，而是分工负责，所有的权力机构都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之精神，但是这就出现了权力的核心，出现了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打个比方，人大，政府和法院，在加上一个只能出主意的政协，其作用不过是一个公司的四个部门，他们上面都有个共同的法人代表——中国共产党。而民主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行使机构则是三个独立的法

人，它们依据民意产生，相互制衡，对人民负责，最终实现了人民主权这一政治原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但这个最高权力机构也要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也不应该存在一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可以合法存在。谁控制了这一不受约束的权力，谁就必然成为专制统治者。所以我们的宪法不仅是序言的问题，也有条文的问题。

十一，关于普选的基本概念

在人类历史上，民主是在民主运动的推动下逐步完善起来的，普选也是在普选运动的推动下逐步成熟起来的。19 世纪中期，英国有以男性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宪章运动，提倡无论男性的种族、阶级都有参政选举的权利。19 世纪的民主运动自

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尤其在北欧，使用了口号“均等共有选举权”。许多社会原先都对投票权有种族要求。比如，非白种人不能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投票，这种情况在 1994 年多党选举后才结束。在民权运动之前，美国南方黑人只是在理论上有投票权，但有很多手段使他们无法实现普选权。3K 党在美国内战之后成立，很大程度是要求胁迫阻止黑人投票。从全民普选的历史看来，虽然不同地方的制度或多或少有制度上的问题，人为的黑幕和贪污，但全民普选仍然是最尊重最多数人的，比较公平的方法，文明的象征，也是全球各国的发展趋势。根据瑞典一个国际组织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IDEA) 纪录和研究，至 2007 年，全球已有 185 个国家的人民可投票选举国会，包括埃及、印度、南非、以色列等，更有 108 个国家的人民可投票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包括总统、总理、首相等。

在民主国家，每到普选的日子无异人民盛大的节日，人民不仅要选举包括总统在内的国家行政机构的官员；他们不仅决定新一任的中央官员，也同时决定各级的地方官员。普选的日子往往也是人民最扬眉吐气的日子，他们用一张张的选票，决定新一届的政府或立法单位的成员，充分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如果你不为民服务，我们就用选票罢免你；如果你工作不尽心，我们就用选票撤换你”。各国人民这种对参与国家管理和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的热情，在选举的时候通过一张张选票充分的体现出来。普选依据的是一个朴素的民主原则：无选举不成代表！如果承认政府不过是实现公共事务管理的服务机构的话，那么民众选举政府官员就是顺利成章的事情。

在现代社会里，专制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也借鉴一些民主制度的经验，但基本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专制国家通常也有所谓的人民代表，但专制国家的人民代表通常是官僚系统的一部分，他们的产生过程基本上和官员一样，是由“上级”

决定的，都是任命制的产物。所以，这样的人民代表是虚伪的人民代表，所以他们最大的作用不是代表民意，而是强奸民意，他们在党国需要的时候，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手或左手举起来做机械运动。不妨想想中国大陆的人大代表，当你认真去想的时候，你也许想不起来谁是你选的代表，你也许想不起来你是否投过票，你也许想不起来有哪位人大代表主动找你听取过意见，你也许不知道怎么联系所在社区的人大代表，你也许不知道他们能为你解决什么问题，当然，你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能成为人民代表候选人，或者市长候选人。

专制国家的官员实行的任命制，一个官员的产生是由他的上级决定，他要做的不是对人民负责，而是对上级负责。专制制度下的官员，无法真正做到尽全力为人民服务。上级任命制决定他首先要负责的是其上级主管，上级的喜怒哀乐决定了下级的前途，所有的下级官员们都是唯上是从。上级需要亩产一万斤的政绩，那么他们就拿出亩

产十万斤的“政绩”，至于这种政绩使多少人家破人亡，他们往往不管。

我们做学生的时候，班上有个叫班长的学生官。一般说来，当班长是由老师直接指定的，班长往往不能服众，甚至和同学们有对立情绪，还有些喜欢去给老师打小报告，小小年纪就学会谄上欺下。这种班长一般对同学的指责不是很在意，往老师那儿跑的很勤快。但当出现几个班长候选人，班长要由全体同学选举产生的时候，气象又不同了。几位班长候选人大概都会不约而同的把同学们放在主体地位，他们“竞选”的口头语往往是：如果我当了班长，我一定为同学们……怎么着，怎么着，这种“民选”班长对“舆情”和“规则”都十分看重，如果有人对他的工作提出质疑，他便会耐心辩解，并按照“规则”改进工作。选举和任命的区别有多少呢？这个小例子就能多少说明点问题。从班长选举的这个例子，见微知著，人们可以推论出下面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第一，只有普选产生的官员才能得到认可，才能解决合

法性的问题；第二，只有人民选举的官员才能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

普选也许不能选出光荣、正确、伟大的政治家，它甚至会选出平庸的政治家，但是普选将彻底消除专制制度下那种官员由上级任命所造成的各种灾祸。普选会让当选的官员真正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自己是得到人民信任才被人民委托去行使这种权力的，一旦人民不再信任你的时候，人民将随时收回这种权力，寻找新的代表去履行这种职责。因此，当选官员将不得不随时考虑到这点，其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普选作为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发展迄今的历史有力的证明这样一个真理：选举是人民保障自身最有效的制度武器，没有自由公正的普选，权力系统就不可能对人民毕恭毕敬。因为不需要对人民负责，而只需对上级负责，所以当官员面对人民质问时，这一类的话自然会脱口而出：“你们算个屁”，“我爸是李刚”

好，上面的话似乎是说中国大陆也没有实行普选制度，是这样吗？是的。我们必须搞清楚这样的道理，并不是有投票就是选举，并不是有选举就是普选。所谓普选，就是指所有公民不受歧视性限制，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自由而公正地选举官员，普选包括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周期性活动。按照这个定义人们可以发现，一党专政的国家并不存在普选。苏联不曾存在过，中国大陆也不曾存在过，北朝鲜更不曾存在过。一党专政的国家，貌似有投票但没有选举，貌似有选举但没有普选。苏联、中国和北朝鲜大概都有一定的特征：第一，部分人被统治者列入“敌人”的行列，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受到限制；第二，一个农民往往只有十分之一票，或四分之一票，政治权利低于城市市民；第三，选举活动不是自由的而是被迫的，人们投了反对票往往会受到迫害；第四，人们只有被迫进行“选举”的权利，而没有参与竞选的权利。

按照当今世界许多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只要投票结果一公布，这场选举便圆满结束了，得票多少就是最权威的说明。然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选举制度却不一样，首先选举结果需要是上级审批，批准了，选举方能生效，不批准，一切就白搭，得票再多也无济于事。这种情况在地方和基层极为普遍。更为可恶的是，投入众多人力，花费巨额资财，耗费诸多数日，进行了“选举”，最后往往被一纸调令化为乌有。这个领导比较如心？调令一来他就走了；那个领导落选了？调令一来他就异地做官了。“党管干部”这一组织原则其实就是对中国“选举制度”最大的否定。党管干部的原则就是党任命干部，人大履行政序，没有其他解释。所以腐败分子张国光能当选为湖北省省长，黑社会老大也能当选人大代表——比如刘涌。

在现代民主制度下，选举活动的点点滴滴都要体现平等与公正的法治精神，任何选举活动都会依照细致而明确的法律进行，最终，普选就是自由

而公正的选举方式。普选既然是自由和公正的，那么合法公民的选举权利就不会受到限制，也不会选票比别人的效用低，也不会被强迫参加选举，也不会因为投反对票受到迫害，也不会限制公民参与竞选。当然，更不会出现这样的荒诞现象，纽约人民被选出的市长被调到华盛顿上任，而华盛顿人民选出的市长却调到加利福尼亚上任。

更为重要的是，普选是一种周期性的活动，只有普选制度才能真正杜绝“领导干部终身制”。有了这样的制度，一个人垄断国家政权数十年，到死方休，这样一种现象才能杜绝，不会再出现斯大林和毛泽东式的老朽政治家；有了这样的制度，一个家族或者一些家族垄断国家政权上百年的现象才能终止，不会现金家王朝和太子党；有了这样的制度，一个政党实行专政的局面才能扭转……1776年7月4日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布：“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指天赋人权）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

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这就是“主权在民”原则的具体运用。

有些人也许会说，美国等民主国家也没有真正的普选，因为那里也有些人没有参加选举，投票率不是百分之百。其实，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一部分人拒绝参加选举也是自由和民主的体现，只要达到了法定投票率，民主国家的选举就是有效的。北朝鲜的投票率历来是百分之百，赞成票也是百分之百，这恰恰说明它是专制的。也许有人会说，某民主国家的总理是间接选举出来的，不算普选。这种说法也不对，比如德国的总理是几百人的议会选举出来的，照样有政治合法性，因为德国的议员都是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而且德国人民同意代议制度的政治安排。也许有人会说，民主国家的普选并没有尊重少数人的意见。是的，民主制度就是要在最大程度上寻找社会共识，它也会通过投票否决少数人的意见，但民主制度绝不会侵犯少数人的权利和自由，这才是关键。

十二，关于政党竞争的基本概念

在当代美国，在地方政府层次，很多地区并不分党派；在州一级，目前仅有内布拉斯加州议会仍保持不分党派性质。在全国层次，现在当然是驴象泾渭分明。但是如果我们溯美国历史之源，会发现原来美国建国之初并没有政党。华盛顿最著名的演讲之一是他卸任总统时的《告别演说》。这篇演讲稿的撰稿人是汉密尔顿。演说最重要的主旨之一就是警告美国人不要陷入党争。他说：“最郑重地反对政党精神所带来的有害效果”，“党派终将成为狡猾奸诈、野心勃勃、毫无原则的人颠覆人民权力的政治工具”。华盛顿曾宣称，我们不需要政党，因为我们都是共和主义者。

可是，在华盛顿的任期内，虽然没有政党政治之名，却开始有了党争之实。起因主要还是在于对国家前景的不同理念：究竟是要把美国建设成一个类似当时欧洲列强那样的、联邦权力集中、工商业发达的国家，还是一个充分保障州权民权，

以农场、种植园为主的农业经济？汉密尔顿是前一派的领导人，虽然并没有正式结党，但是人们把他们称为联邦党。当时在国会的麦迪逊非常担心这一趋势，于是暗中拉拢与他理念相近的人士，并让杰斐逊担任领导人，结成“民主共和党”。需要指出，这两党仍属于松散的政治联盟，并非现代政党。华盛顿虽然超脱于外，但是从政治理念上，他还是更接近于汉密尔顿的联邦党。这样，美国早期历史上的“两党制”在政治分歧中就悄然形成了。

1796年，华盛顿退休。在总统选举中，联邦党人亚当斯击败了民主共和党领导人杰斐逊。根据当时的选举制度，杰斐逊同意担任亚当斯的副总统。1800年，杰斐逊再度挑战亚当斯并且成功，民主共和党由此开始长期执政，联邦党从此式微，到1816年之后几乎不复存在。联邦党消失后，民主共和党内部分出现了不同派系，反映在总统选举上，1824年选举成为美国历史上一次有争议的选举。1828年，上一次选举中的受害者杰克逊卷土重来，

当选总统。他身边和他的支持者很快形成了民主党，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民主党，日后产生了威尔逊、罗斯福、肯尼迪、克林顿的政党。这是美国甚至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当然也是第一个民主政党。

1833 年，杰克逊的反对者们组织了辉格党，但仅仅十几年后，辉格党因奴隶制问题而发生分裂，影响逐渐缩小，到 1856 年选举时正式崩盘。此前的 1854 年，美国国内主张废除奴隶制的力量组成共和党，林肯代表共和党赢得 1856 年大选。共和党由此成为全国性政党，这是林肯的党，也是其后老罗斯福、里根和布什的政党。美国的两党政治由此进入第三阶段并持续至今。此后美国所有总统均出自民主、共和两党。

从现代政党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真正的民主政党是在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中派生出来的，自由公正的选举必然意味着竞争，而竞争就是要争取民意，那么不同的竞争者就会组团来制定、宣传

和实施他们的政策，这就自然而然产生了政党。政治学者布洛克斯在《政党与选举》一书中提出，“政党是个人基于自愿所组成的政治团体，为政府提供一般措施、建议，或制定政策，选举和支持领袖人物成为公职候选人，以此作为实现其主义和政策的最有效方式”。通过选举过程，政党政治成为了大众共同参与的 PARTY，是终结皇权时代的保障性力量。民主政党，是政治性 PARTY，这是一个恰当的形容，与中国大陆人所理解的政党是大不相同的。我们被洗脑太久，就不知道，甚至难以理解这个常识。

世界上第一个列宁主义政党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前身。布尔什维克原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派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的产物。1903 年 7 月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党纲、党章问题展开争论，最后在列宁等人的坚持下，党纲中写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此后，在列宁等人的努力下，布尔什维克逐渐成了一个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

有着严密组织纪律的机构，凡加入者必须向党宣誓，承认党纲，服从纪律。1912年列宁将不同意布尔什维克观点的人全部开除，由此，布尔什维克成了现代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型的“民主集中制”政党。1918年列宁将布尔什维克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出现，标志着新型共产主义政党在俄国的建立，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诞生。列宁主义严格来说就是两点：在党内不搞民主制，而要搞民主集中制；在俄国不搞社会改良，而要通过暴力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人们知道，民主集中制就是党中央专权制和领袖专权制，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党”是私党，是出于不便告人的目的，是在一时利益的权宜之下结成的，而社会提倡的却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这样一种操守。尤其是秦始皇统一中原后，结社行为被历代统治者始终视为谋逆大罪，惨绝人寰的“党人案”则使人谈党色变，千年持久的暴力之下，中国社会没有演化出现代民主政党的模型。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巨变中，复杂的历史早就了革命的土壤和革命的种子，出于不同革命目的的需要，革命型政党就在中国扎根了。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主义的标准下从俄共或苏共复制出来的革命型政党，而中国国民党在进行改组时也是借鉴了俄共的很多建党经验。列宁式政党无论革命目标多么崇高，它的组织形式就是独裁的，独裁政党与国家权力结合以后最容易走上“一党专政”的道路，这是历史经验。果然，党国体制就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了，花是红花，果是恶果。

民国学者胡适把英、美、西欧式的民主政党和苏俄、意、德等国的革命型政党做过比较。他认为民主政党有这几点特色（非原文）：

（一）民主政党的党员没有确定的人数，没有党籍可以查考。人人可以自由登记为某党党员，人人可以自由脱离本党。如英国邱吉尔从前是自由党，后来是保守党。如美国威尔逊本是民主党，后来竟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二）党员投票是无记名的、秘密的。党员言论是自由的，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党员的投票，也没有特务侦探可以干涉党员的言论行动。

（三）民主政党的原则是在两个或多个政党之中争取多数党的地位。每个政党总希望成为多数党，但每个政党总得容忍并且尊重少数党的权利，因为今年的少数党也许明年要成多数党，今年在朝的多数党也许明年下野成为少数党。最后的决定是人民的选举票。在选举之前，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确知全国人民的最后决定，也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操纵把持全国人民的投票。例如美国一九二八年的大选举，共和党胡佛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四年之后，民主党罗斯福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这都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

（四）选举结果确定之后，在法定的日期，胜利的党从失败的党手里依法接收政权。失败的党决不敢用警察军队的力量来霸占政权，或毁灭得胜的

反对党。因为他们知道几年之后他们又可以有竞选的机会，所以他们都努力培养“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雅量。试看英国邱吉尔在一九四五年负着何等威望，然而那年选举的结果，保守党惨败了，邱吉尔只能坦然交出政权，退居反对党领袖的地位。

而革命型政党则有以下几点来特色（非原文）：

（一）革命型政党是一种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党员入党必须经过审慎的调查察看。入党之后，党员可以受惩戒，被开除，但不能自由脱党。

（二）革命型政党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党员没有自由，也没有秘密。革命型政党必须有严密的特务侦察机关，他们的作用不但是侦查防范党外的人，还须监视党员的言论、思想、行动。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命令，思想言论必须依照党的路线。

（三）革命型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未取政权之时，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巩固政权，霸住政权。革命型政党本身是少数党，但因为组织的严密坚强，往往能利用政治的特殊权威，压服大多数人民，以少数党统治全国。

（四）革命型政党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澈底肃清铲除，才可以巩固一党永久专政的权力。

虽然胡适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始终抱有警惕之心，但他认为，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从民主政党变成革命型的政党，是不得已而为之，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所以在国共内战结束以后，胡适无视共产党的极力挽留，跟着蒋介石去台湾了。现在看来胡适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反观那

些留在中国大陆的民国知识份子，大多都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死于非命。

在我看来，专制社会的开创者通常都是走了一条从侠客到魔王的道路，怀疑他们的初衷是没有意义的，甚至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列宁和毛泽东的社会理想不可谓不崇高，切.格瓦拉不可谓不是一个圣徒，但是他们都走上了一条从侠客到魔王的道路。民主社会的开创者也有类似的经历，17世纪和18世纪的民主理论家阐述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民主，即订立契约、把权力转让，然后全民投票，选举政府。这种单一的一致的民主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民主一旦运行，会出现不同派别。美国的开创者华盛顿甚至非常厌恶党派的存在，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没有党派不行。自由意味着选择，民主就是选择的过程。民主社会就是在各种党派的相互竞争中实现的，各政党的相互斗争也是民主社会的一种制衡。民主社会的标准往往就是这样的，看它是不是多元的，看它是不是多党的。政治上的多种主体制在民主社会是必要

的，如果不存在政治上的反对派，就没有民主。民主社会就这么简单，反对派的存在是必要的，反对派的组织是必要的，在法治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派有权利在下次选举中争取成为多数，组成政府。所以，不仅仅反对派存在的问题，而且要组织成为政党，要有力量，要能够取而代之。秦末汉初，项羽看见秦始皇的威武之相，激动地说：“彼可取而代之”，现代民主社会就实现了“彼可取而代之”的理想，前提是选票，而非单靠枪杆子的力量。

是一党专制好？还是多党竞争好？在问这个问题前，我们不妨在这个问题前加一个前缀。对于垄断利益集团来说，是一党专制好，还是政党竞争好？而对于人民而言，是一党专制好，还是多党竞争好？如果这样一问，答案似乎简单了。对于垄断利益集团而言，一党专制自然是好得很，因为这本来就是利益集团获得垄断利益的源泉，又同时可以确保它们利用这一制度继续对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攫取他们永不满足的贪欲。而对于

人民而言，多党竞争显然是更好的选择，原因很简单：人民可以获得选择权。人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民主国家选举时，各政党的支持者和义工们或上门送帖子，或请声音甜美的女性电话拉票，而政党的领头人在公共场所见到老百姓，都是点头哈腰的套近乎。在这个时候，人民可以充分感受当家作主的快感，但绝不仅如此，因为选票在人民手里。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举个例子。在 1994 年前，中国大陆的电信业务由中国电信一家垄断经营，他们的服务态度在各行业中是出了名的恶劣，在涉及如初装费，长话费等方面的行为让人想到割肉的屠夫。然而中国电信的逻辑很强盗：你爱理不理，反正大陆就我一家！后来，中国联通公司出来竞争，用户有了选择权，中国电信的服务质量立竿见影的得到了提高。到了今天，网通，铁通也开始进入这个市场，用户开始享受多个公司竞争带来的好处。虽然他们几家都是官营企业，但相互竞争就给人们带来了实惠。市场有竞争，用户有实惠；政党有竞争，

人民有实惠，经济市场和政治领域的道理差不多。人们也许还依稀记得，联通公司进入电话市场的广告语：有选择真好！那，为什么不让我们选择政党呢？

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我们要不要选择权？又该不该有选择权？政府，从本质上来，不过是一个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当它由一个政党依靠暴力把持不放的时候，其服务必然如同只有中国电信，受害的不仅只有普通民众，甚至连警察和军人这些统治者用来维护秩序的成员也不例外。引进多党竞争，国家和人民才能选择谁来管理国家。在有选择权的情况下，人民的合法利益才能得到最大的保护。

那么，也许还有人会问：民主国家的议会多乱啊！有扔皮鞋的，有丢便当的，甚至还有挥拳互殴的，多党制度真的好吗？我来告诉大家，你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些，只是民主政党中个别成员文明程度的问题，而不是政党竞争机制的问题。不同的公

司竞争，也会有时互使阴招，但谁要说：“多个公司太乱，还是一家公司垄断比较好”，这是任何聪明人都不会相信的。何况，还有另一个现象值得大家注意，现代专制国家因为资讯不开放，所以严酷的党内斗争往往不为外界所知，绝远不是丢皮鞋和丢便当的问题。比如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政变中被捕，不屈，传说他遭受了酷刑。这个传说的真假并不重要，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制造了无数的传说，并被最终证实。

十三，关于言论自由的基本概念

人们对于生命、自由和幸福的权利是自然而来的权利，所谓自然权利和天赋人权就是这个意思。生命、自由和幸福三位一体，生命更象是前提，自由更象是核心，幸福更象是目标。关于自由，从来就是重要的，人生就是挣脱枷锁的过程，因为枷锁无往不在。就比如说，你以为自己的思想是自由的，但思想也要遭受视听的局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他的思想自

由。但是，总有人喜欢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要人家服从自己、接受自己，这叫思想上的压迫。而有些人，则喜欢在自己的想法上做美丽的伪装，表面上看，它不侵犯人家思想的自由，让人家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这叫诱骗，是思想上的诱骗。人们批判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是人们现在不是也在拼命地鼓吹“一个主义”吗？人们笑话古人被宗教和迷信所诱导，可是人们现在不是也被“以什么主义来指导”的口号迷惑吗？

引申一步说，一个人既有所思，就是说本性有这个需要，若是不能将这个想法宣告出来，那其实是说明了思想的不自由。思想，若不能变化成言论，若不能变化成行为，若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就不是自由的思想。人一旦有了想法，就想表达出来，这是理所当然的。思想若不能自由表达出来，人也经常是痛苦不堪的。有一种人，宁死也不愿隐藏自己的思想。在古代，如苏格拉底；在现在，也不乏其人。所以，思想自由，从它的任何价值意义看来，都是包含着言论自由的。从学

术界和大众角度来看，一般所谓思想自由，就是言论自由。因为，如果不发表言论的话，我们就无法知道一个人的思想自由不自由。思想自由即言论自由，无论对于学者、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大众来说，它都是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一种自由。

只允许一方面口诛笔伐，不允许另一方面秉笔直言，手里拿着棒子，嘴里还叫着：“你说，我叫你再讲，再讲就再给你一棒子”。这就是专制社会的思想专制和言论专制。统治者对思想和言论的统治，与一个泼妇对丈夫的统治没有两样。我们可以有一千种不同的理由来支持一千种不同的观点。正如佛家说的：“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现在，在最文明的国家中，对于言论自由，总是视为当然的事、平常的事。人们已惯于这种状态，因而当它是一种天赋的自由。这种自由，其实是经过了许多的血战，到最近才获得的。人们费了数百年之久，才能使那些最开化的人民信服：发表个人意见和讨论各种问题的自由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件坏事。

嗯，说到这里，任何人都应该明白，思想自由到最后就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到最后就是新闻自由。新闻自由作为民主制度重要的支柱，其实质是对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延伸。它用制度保障了人民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这些制度还可以涵盖包括出版自由，教育自由等方面。如果没有新闻自由，人们就不会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这是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没有新闻自由，不仅很多人会失去表达的机会，连很多思想家和政治家就失去了表达的机会，那么人们也就失去了选择政府和政治家的自由，然后人们就进入了一种彻底被奴役的状态。法西斯的出现，共产极权的出现，都证明了这个道理。

保护新闻自由的制度对于政府而言是一种所谓被动权利，即仅要求政府不对新闻加以限制；在民主国家，政府基本不介入新闻的文字或言论内容。新闻自由原则得到宪法的保护，防止政府的立法或行政部门施行审查。新闻媒体作为有独立“意

识”的法人，选择什么样的精神产品可以根据新闻市场的需要自我抉择，政府无权限制并操纵新闻媒体。在民主国家，有人说媒体是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此言不虚。

在生活中，人们遇到不公正的情况常常会说一句话：跟记者联系！这招有时候就很灵，比如遇到了如供水供电，交通衣食的问题，随着媒体的介入，事情便会引起大家的重视，相关职能部门慑于舆论的压力，也会尽快解决发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热心从事公共事务的人可以通过媒体发表政见，参与竞选，而公众也可以由此选择他们所喜欢的人。如果没有发表政见的普遍自由，自由公正的选举就不可能存在，存在的只是独裁者的骗局。有些专制国家的“选举”过程中，有独立竞选人如果对选民发表观点，争取选票，就有可能遭到围堵，甚至被逮捕。这就不应该是自由公正的选举中该出现的现象，而中国大陆就曾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谈新闻自由，就不得不谈美国。这个当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其新闻自由的程度也是最高的。人们所了解的关于美国的负面消息大多数往往就来自美国的新闻媒体，不管是涉及到美国军队的暴行，还是美国行政人员侵犯人权的恶行或者美国政要们的丑闻的新闻报道，其始作俑者都是美国独立的新闻媒体。某些国人对美国这种高度的新闻自由百思不解，他们似乎习惯于专制制度下对统治者“歌德”式的报道。然而美国并没在这种负面报道下被唱衰，反倒是显得愈发欣欣向上的气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对一个社会的持久繁荣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发展简单的比做一个人的发展的话：我们可以想想，一个人不犯错误可能吗？重要的是能把错误公开，接受监督从而改正错误。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在改正错误中成长并强大起来；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新闻自由制度体现的对公民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制度化保护，这种制度促使执政者面对舆论独立

的公开的监督，必须减少犯错误的机率，更谈不上戕民以自利。新闻自由的意义在于：一，谎言经不起独立公开调查而无法存在，了解真相权利是人民的天然权利。二，普通民众可以通过媒体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以维护自己的权利。三，大众的共同呼声集合在一起，就能形成强大的民意，决定政府，也制约政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有无新闻自由制度，是民主与专制的试金石！

古往今来的历史证明：在和平的环境下，对人民造成最大伤害的不是杀人的强盗，也非不可抵抗的自然灾害，而是没有受到制约的统治集团。在一个实行专制制度的国家，媒体没有独立的地位，只是统治者的喉舌，便只能发出统治者规定的声音。当对人民的伤害不是来自于街头某个身体强壮者，而是统治者本身，这时新闻部门不但没有自由，反而要做专制统治者撒谎的工具，成为其欺骗大众的帮凶。

新闻自由从根本对所有公民的利益都具备同样的保护作用，但在现实中，处于社会低层的人首先需要新闻自由。对于有钱有势的人来说，他们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拥有纵横的关系网，这些让他们在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相对就具有较多的选择手段。而穷人们不仅经济能力有限，其自我保护的手段也有限，这个时候，利用新闻媒体将自己遭遇曝光，使事情有更多人知晓，从而唤起广泛的关注，这能有利益问题的解决。在新闻媒体面前，侵害者的行为将面临公众的道义谴责，也可以让相关的政府机构面临“维持正义”的压力。比如有大陆官员欺负民众，面对指责的时候，他狂妄地说：“你们算个屁”。这事一曝光，那些喜欢胡作非为的官员们的压力就很大。

从中国历史上看，在政治开明的时候，真正有作为的统治者，往往鼓励臣民批评时政、针砭时弊，籍以作为施政的镜鉴。春秋乱世，郑国的执政子产，以“不毁乡校”而名垂青史；唐太宗以“导人使言”的雅量，创造了贞观盛世。与之形成对

比的，是“腹诽”之类罪名的存在，直接造成了群臣不敢直言进谏的思想压力，导致上下悬隔的局面。以禁锢思想、控制舆论，作为治国之道，表面上似乎是铁腕统治，实际上流露出统治者因缺乏自信而趋于自闭。汉初的思想家贾谊，把“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看成是秦朝快速灭亡的原因之一。历史的教训还在，值得现代人深思。

十四，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基本概念

1863年林肯在葛底斯堡阵亡将士墓前用六个字概括了主权在民，这两个字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我们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的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林肯用“民有、新治、民享”这三句话来说明“主权在民”的全部含义，这种解释，成为西方国家普遍流行的定义。这一定义，在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主权在民论宣告了君主、贵族对于国家所有权的破产。

主权在民就成了民主政治的第一原则。它始终站在政治伦理的最高点，对一切政治行为进行道德审视。主权在民就要求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而有限政府就是说政府不能侵犯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它只能为着保护人们的权利而成立，并且人们能够通过法律有效约束它。怎么才能有效约束呢？就是从技术上把政治权力分开，使之相互制衡，也就是三权分立。

但是，民主国家的权力分立显然不是三权分立这么简单，它包括各种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不承认任何绝对的权力，这是民主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思路。所以，民主国家不仅有三权分立，还有地方自治与中央权力的制衡，还有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相互制衡，还有宗教社会与世俗社会的制衡，还有媒体与社会的制衡，还有上议院和下议院的制衡，还有律师和检察官的抗衡，还有陪审团与检察官的抗衡，还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制衡，甚至还有人民武装与国家武装之间的制衡。这些制衡构成了民主制度更加健全的免疫系统，使民

主社会产生了强大的免疫力、活力和发展力。在所有这些制衡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制衡是极其重要的。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很多人都能看到当今世界发生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社会管理的方式在悄悄改变。在以往，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基本上就是政府，而现在，很多活跃的民间组织已经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了。发达国家暂且不说，就连中国大陆似乎也在搭车前行，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幸福工程、微笑列车、新长城计划等众多公益项目，里面都有国内外民间组织的活跃的身影。尤其是在社会倡导方面，民间环保组织走在前列，自然之友、地球村等民间组织在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节约型社会等领域，积极倡导新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作用显著。近年来，社区维权、集体建房运动、参与式公益等公民的集体行动越来越频繁，形式也越来越成熟，公民有序的治理参与受到社会各方积极关注。

人民主权，有限政府，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新闻自由，这些制度化的民主形式都越来越趋于成熟和完美。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公民把自己的权利出让给代表他们的人，由他们来施行统治，这样的统治是虽然最初是出自人民的同意，但是却又具有外在的意义。无论多么民主的社会，政府确实就象是一种外来物在管理自己一样。当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人们对民主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时人们发现，民主不仅意味着人民可以决定和选择公共权力，而且意味着人民自己也可以直接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就是说，原来人们以为权力必须来源于人民，现在人们发现人民也可以是权力本身。也就是说，原来是政府在管理社会，现在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可以共同管理社会，而且效果显然更好。于是，原来被称为“统治”的东西，现在流行叫做“治理”。公民的治理参与是体现公民权利和公民权力的更为核心的内容，也是社会管理由“统治”转化为“治理”的重要内容，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就是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的存在从客观上制约了政府，形成了一种新的制衡关系，公民权力和政府权力的制衡。但是，非政府组织的合理存在，更基于一个更深刻的理念：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这就决定了人们有充足的自治空间，只有当人们自治能力难以企及的时候，政府才有存在的必要。世界越来越精彩，在这样精彩的世界里，任何全能政府都是捉襟见肘的，这就需要把更多的事务还给社会，还给公民自己。问题在未来也许就是这么简单：公民个人能够做也乐意做的事情，任何公权机关都不要去做；非政府组织能够做也乐意做的事情，政府不要去做；基层的公权机关能够做也能做好的事情，更高的公权机关不要去做，这就叫做公民社会。

非政府组织是英文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的意译，英文缩写 NGO。一般认为，非政府组织一词最初是在 1945 年 6 月签订的联合国宪章第 71 款正式使用的。该条款授权联合国经

社理事会“为同那些与该理事会所管理的事务有关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作出适当安排”。1952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其决议中将非政府组织定义为“凡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都可被看作非政府组织”。在当时，这主要是指国际性的民间组织。后来，人们将这一概念的内涵加以扩充，非政府组织就具有了更广泛的含义了。世界银行则把任何民间组织，只要它的目的是援贫济困，维护穷人利益，保护环境，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或促进社区发展，都称为非政府组织。

萨拉蒙和安海尔在综合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非政府组织所具备的五个特征：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而中国的政治学者王绍光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第六个特征，即公益性。应该说王绍光先生加进来的这一特征属于画蛇添足，因为非政府组织只是意味着这种组织在体制上独立于政府，它们不属于政府建制的一部分，也不直接受制于政府权威，至于公益不公益则与非政府组织没有关系。非政府组织完全

可以追求小团体的利益，甚至个人利益，只要是合法的就行，不一定非要从事公益活动。给非政府组织强加一个公益属性，这是要求非政府组织伟大、光荣、正确，也许这种要求是崇高的，但确实是荒谬的。这就好比对律师的要求一样，中国官方总是要求律师做到公平公正，这种要求也许崇高，但比较荒谬，因为这不符合律师的属性，律师本质上就是为当事人服务的，就是和检察官做对的。当然，还有中国大陆学者认为非政府组织应该是非政治性的，这就更荒唐了。非政府组织独立于政府而组织性地存在，但并不意味着非政府组织与政府或政治不发生任何关系，它和政府的关系就是在法治精神下相互监督，相互制衡。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同利益集团一样介入政治，力图影响政府有关政策。非政府组织的本意只是指不是政府的组织，其实质意思在中文里面与之最相应的是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不仅是指联合国体系所认定和接纳的民间组织，还包括其他各种民间组织，只要不违背法律，它想有什么特性都可以。

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虽然经历了数百年来的迅速发展，以至全球化特征急遽显现，但是，财富积累依然是有限的，资讯渠道也依然是狭窄的，公民个人全面发展的水平也依然有限，那么，公民做为个人，其表达能力就必然是有限的，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也必然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公民权利即便在法理上非常充分，但是如果公民独自行使公民权利，社会发展状况尚不具备完全条件。在如此情况下，公民要想尽可能多地行使法理上的公民权利就必须相互联系，并组织起来，通过组织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以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争取更多的个人自由，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单个的公民只有组织起来，才具有社会的意义。如果没有权利自由地组织起来，那公民就必然成了草民，象草一样随时会被公权的利刃割掉。

据民政部的最新统计，截止 2007 年 6 月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为 35.7 万个，其中社会团体 19.4

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 16.2 万个；基金会 1193 个。据清华大学民间组织研究所的估计则在 200 万至 270 万之间。看起来似乎很多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相对于外部世界，我们太落后了。日本平均 400 人、美国平均不到 200 人、英国平均 100 人就拥有一个民间组织，而中国平均 4000 人才有一个民间组织，即使将未获得法律合法性的草根组织也纳入，也平均约 2000 人一个才拥有一个民间组织。2005 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达 2,600 亿美元，占 GDP 的 2.1%，人均捐款 833 美元；而中国同期慈善团体接受社会捐赠资金 28.9 亿元人民币，仅占 GDP 的 0.015%，人均捐款仅 2 元人民币。

横向比较来看，我们能看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的民间组织处在快速生长但仍相当不足的阶段，另一方面，这些民间组织几乎都不是自由自主的，而是遭受权力挟持的。表面上看，邓式改革 30 年来的民间组织蓬勃发展，各种协会、学会、笔会，等等，遍地开花，但其实都是当局

统治体系的“囊中之物”。中国大陆的民间组织并非是完全独立于当局之外而是在当局的掌控之内，这在很大程度上就不是非政府组织，但它们表面上却又是非政府组织，甚至经常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参加国际会议。对当局而言，既需要民间组织作为一种辅助力量来提供公共物品，又要努力削弱民间组织的对抗性以维护政局的稳定，这是当局的两难课题，也是民间组织的两难课题。尽管中国大陆的非政府组织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然而也必须承认，它们对于中国也是一支积极的力量，起码对公民权利的唤醒有暗示作用，并为非政府组织今后的继续发展积累有益的经验。

中国大陆的非政府组织之所以难以成为非政府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障碍。中国大陆法律要求民间组织必须有一个对应的政府机构做为自己的管理部门，得到管理部门的许可，然后才能成立。也就是说，你必须做个好媳妇，也必须找个厉害婆婆。另外一个障碍就是资金门槛，政府

规定必须有 10 万元以上的注册资金才能成立非政府组织。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号称是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也是人口多达 13 亿、企业多达数百万家的大国，但中国非营利性质的组织只有 22% 符合全额免税的条件，而非政府组织大多是不盈利的，只依靠捐助开展业务，这里面就有很大的不公正成分。公盟税务案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一不留神就成了犯罪嫌疑人。中国大陆的非政府组织在“天平”上的“砝码”实在是太轻了。

十五，关于联邦制的基本概念

对于民主，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可以说新闻自由是民主与专制的试金石，可以说多党竞争才是民主制度标志，可以说普选才是民主制度的重中之重，但是很显然，自治在民主制度中是一个不能忽略的方面。如果只有新闻自由、多党制和普选，而少了自治，那依然没有民主。大部分中国人谈起自治，想起的往往是少数民族自治，似

乎除此而外就没有别的自治了，或者说再多谈下去就会犯政治错误，但是在现代民主制度下，自治是无所不在的。1835 年法国青年去美国考察了后出版了名著《民主与美国》，在书中托克维尔以他敏锐的观察力审视了新大陆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对美国的自治，他着墨很多，却赞叹不已。

人们在历史故事中看到的联邦制是这样的，一些邦国，或者一些州，订立契约，就形成了联邦制国家。但是如果以这么简单的眼光去看待现代民主社会的联邦制就目光短浅了。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这就决定了人们有充足的自治空间，所谓自治，首先是个人的自治。只有当个人的自治能力难以企及的时候，人们才把权力赋予最基层的乡镇；只有当乡镇的自治能力难以企及的时候，人们才把权力赋予市县；只有当市县的自治能力难以企及的时候，人们才把权力赋予省州，只有当省州的自治能力难以企及的时候，人们才把权力赋予国家，这就是自治社会权利和权力出让的序列。依据这个序列

可以说，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各邦国，或者各州订立契约，建立联邦，只是自治的一个层次。如果没有自治，联邦制对于民主的意义就不是很大。就自治和现代联邦制的关系来说，自治是皮，现代联邦制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事实上，美国社会的联邦制也正是从下到上逐级自治的体现。各州订立契约，形成联邦，建立合众国，这是明面上的事情。在此之外，人们也应该看到另一个现象，在现代美国的各州之下，虽然没有明文的联合契约，但权利和权力出让的序列是符合民主原则的，州和各城市相互之间实际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联合契约，然后才能称其为州。再继续往下类推，就能推到个人自治的层面了。日本不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但它比美国只是少了一个各地方组成政府的明文契约，只是少了一个各地方退出日本国的机会，如此而已，换个角度看，日本的地方自治权一点也不比美国少。纵观其他各民主国家，有些是联邦制的，有些不是，但它们并没有离开自治，以及自治基础上的契约，

只是有些契约是非明文的。英国连明文宪法都没有，照样是宪政制度，照样有无所不在的自治。问题在未来也许就是这么简单：公民个人能够做也乐意做的事情，任何公权机关都不要去做；非政府组织能够做也乐意做的事情，政府不要去做；基层的公权机关能够做也能做好的事情，更高的公权机关不要去做，这就叫做自治社会，这就叫民主社会，这就叫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联邦制应该从最基层开始，市县组成联邦形成省州，省州组成联邦形成国家。

现今世界上的联邦国家，多数是在原来就存在的小型共和政治体基础上联合而成，也有的是通过政治改革将以前的单一制国家解构或者说重组成为联邦共和国。而联邦制就起源于过去的小共和国为增强军事力量和谋求共同发展的深切需要，它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同盟。历史上的邦联，首要目的是共同防御，其次才是共同发展。它们的组织形式一般都很简单，最重要的机构通常是一个由各成员邦代表组成的议会，没

有行政和司法部门。现代联邦制正是在吸取了过去邦联制的经验后，通过制度创新而形成的一种紧密的、现代的新型共同体。它的发明权属于美国。美国 1787 年宪法运用主权共和国组织政府的原则，来设计共同的政治组织，并明智地划分了共同体与构成单位的权力，赋予共同体足够的手段追求联合起来的好处，建立了一个直接对公民行使权力、三权鼎立的完备的共同政府，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将邦联改造成了联邦——联合而成的国家。联邦制作为多中心、自治、非集权的制度安排，是一种有着巨大包容性的政治体。自其诞生以后，人们不仅用它来将分散的政治体结合成统一的国家，还用它在统一的国家中实现不同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的人民和平相处。最早的现代联邦国家之一瑞士，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在瑞士的境内，生活着具有不同民族身份、宗教信仰，分别讲着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三种语言的人，但他们却结成了统一国家，构建了一个和谐社会。

缔造现代第一个联邦共和国的美国 1787 年宪法，在其简洁而庄严的序言中说道：“我们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为了组成一个 更完善的共同体，以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和平，安排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的福利，并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的后代永享自由的生活，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寻找适当的政制安排，将小国的优点与大国的优点结合起来，使小国得到安全，大国实现自由，这就是联邦主义者的一贯追求。多中心、自治、非集权，尊重多样性，保护少数，以及维护国家的统一，这就是联邦主义者的基本主张。“正义”、“自由的生活”、“国内和平”、“安全”、“全民的福利”等醒目字眼，就是联邦主义者的价值谱系。从 200 多年前现代第一个联邦制国家诞生到今天，联邦主义者在世界五大洲都留下了成功的足迹，发生了一场悄然的“联邦主义革命”，不是没有深刻而重大的原因的。

联邦制的概念大致是这样的：联邦制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治实体(共和国、州、邦)结合而成的

一种国家结构形式。联邦制国家由各个联邦成员组成，各成员单位先于联邦国家存在。联邦成员国在联邦国家成立之前，是单独的享有主权的政治实体；加入联邦之后，虽然不再有完全独立的主权，但在联邦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联邦成员的主权仍受到法律的保护，联邦成员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在组成联邦制国家时，联邦成员单位把各自的部分权力让渡给联邦政府，同时又保留了部分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力。概而言之，联邦制是关于自治、非集权、多样性的宪制安排，是一种多中心的复合共和制。它有两个基本的建构原则，第一，制定一部有严格修改程序的宪法，在全国政府与各构成单位（州、省、邦）之间分割国家权力。全国政府管理国防、外交、统一大市场等与全国人民密切相关、需要集中管理的特殊事项，其他与各构成单位人民密切相关、能够分别管理的一般性事项，都由各构成单位政府管理。第二，各构成单位人民有自治或自组织权。根据联邦制原则，全国政府与构成单位政府并不是核心与边缘、上级与下级的关系，而是具有不同权力、职

能范围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它们彼此独立，权力都有限制。各构成单位也是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与联邦在不同范围内分别行使统治权，且各组成部分的权利并非由联邦授予，这一点与中国大陆的单一制显然不同。

100 多年前，当孙中山等前人致力于推翻帝制、创立共和时，曾提出了建立联邦共和国的主张。而今天，时值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中华大地贫富分化加剧，官民矛盾突出，部分少数民族人士的分离倾向也逐渐显现，台海两岸在统一问题上也远没有达成共识，灯红酒绿之下的人权环境与当今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政治制度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当许多有血性的中国人渴望完成前贤未竟的自由大业时，联邦主义的呼声再度浮出了水面，这似乎并非偶然。但是，联邦制是一种与我们的传统迥然不同的国家结构形式，是一种我们不熟悉的建构政治社会的方式。无论是赞成还是拒绝，都必将是一个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命运的抉择。所以，不

能不深思熟虑。关于联邦制的问题，并不是没到讨论的时候，而是讨论得远远不够。

首先必须明确，公民权利，共同价值，国家统一，社会和谐，这些对于中华民族都是至关重要的，相辅相成的。没有公民权利就没有共同价值，没有共同价值就没有国家统一，没有国家统一也就没有社会和谐。当然，也有个别人漠视国家统一的重要性，认为国家统一不重要，只要人民幸福就可以了，甚至扬言边疆地区独立了也无所谓。但是，中国大一统的文化、历史和现实早已决定了未来，如果没有统一的国家，就会出现政局动荡，社会混乱，民不聊生。那么，中国究竟需要不需要联邦制呢？可以这样说，假如海峡两岸非联邦制不能统一的话，那就一定要实行联邦制，假如边疆地区非联邦制不能稳定的话，那就一定要实现联邦制。在现代文明下，我们不能愚昧到用发动战争这样的蠢事换来一个大一统的中国，也不能愚昧到在边疆地区实行镇压换来一个大一统的中国。

如果中国人民能够在未来的社会转型中找到政治革新的共识，那么中国不妨在逐级自治的基础上，依据契约论的原则重新构建，各乡镇根据经济、交通、地理、习俗和文化之便自由组合成县市；各县市根据经济、交通、地理、习俗和文化之便自由组合成自治省，各自治省再组成大一统的中国。公民社会的联邦制应该从最基层开始，市县组成联邦形成省州，省州组成联邦形成国家。至于大一统的中国是否需要一个联邦契约，其实并不重要，有一部总的宪法也许就够了。人们知道，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就是一个大一统的专政国家，行政区划之所以是今天这个样子，显然有历史的因素，而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也多次进行了人为的行政区划改造。1949年后，中国大陆就进行过多次针对行政区划的改造，有些省被合并了，有些省则新造出来了，省以下的县市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现在看来，以前的很多行政区划都不是合理的，不仅于经济发展有害，而且造成了很多矛盾，不少地方出现过大规模群体械斗。在这

样的情况下，重新来过，未尝不可。就中国来说，大部分地区的人民长期生活在专制制度之下，人们有强烈的国家主权意识，而缺少地方主权意识，这一现状也为行政区划的进一步优化改造提供了便利和可行性。从基层开始重新进行国家政区的划分，不仅有利于保护各地区的传统文明，促进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也可以遏制个别地区的分离倾向。无论那一个族群，对广大人民来说，他们所要的只是自由自主的生活，只有个别人士才有分离和独立的政治企图。当人民得到自由，而行政区划由人民自行决断的时候，个别人士的分离主义蛊惑将失去土壤。

另一个角度，只要能够保证统一，大一统的中国完全可以实现多种模式的组合，在中原地区实行逐级自治制度，在边疆地区实行联邦制度，甚至可以留下邦联制的空间，这样的话，当自由充分浸染中华大地的时候，以前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国家也有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回归中华，甚至日久之后，周边国家也有可能与中国建立就象欧盟一样

的政治共同体。美国的经验告诉人们，只要有自由和民主，只要有价值共识，国家不但不会分裂，而且会团结得更好。欧盟的经验告诉人们，只要有自由和民主，只要有价值共识，多个国家也可以联合起来。

在中国大陆，联邦制是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敏感问题，它甚至可以被上升到颠覆国家政权的高度。以上观点仅一家之言，望官方和民间的政治人士共同思考。

十六，关于军队国家化的基本概念

军队国家化是指一个国家的军队不属于、不听命于任何政党、任何社会团体及其领导人；军队不介入国内的政治生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服从不参与对异议人士镇压，军队只听命于由人民选举产生的、由法律所规定的武装部队总司令。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 1957 年所著的《军人与国家》

一书中，就明确主张军人要脱离政治，保持政治中立和政党中立。

军队是有所有权的，列宁一直都在坚持这个思想，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军队确实是有所有权的。现在回顾历史，人们可以看到，军队按其所有权可以分为私人军队、皇家军队、党卫军和国家军队。军阀的军队就属于私人军队，如三国演义中说的那些大小诸侯的军队，而在近代，如北洋的军阀们。皇家军队是属于皇族的，比如明朝和清朝的军队。党卫军是属于政党的，比如纳粹德国的军队、苏联红军，这些军队带着意识形态的颜色，被政党绝对控制。私人军队、皇家军队和党卫军的士兵经常也担任保卫国家的责任，但前提往往是私人、皇家和党既控制着军队也控制着国家，或者对控制国家有强烈的企图。在这样的情况下，军队就成了私人、皇家和党控制国家的工具。用列宁主义的理论术语来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与以上相反，国家军队则是这样一种军队，它不控制国家却属于国家，它只听命

于民选政府而不具备意识形态色彩，它不介入国内合法的政治争端也不接受任何私人和政党的控制。民主国家的军队就属于国家军队，比如美国，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上台与美国军队无关，谁被选为美国总统谁就是美军总司令，到了总统该下台的时候，军队也不会再表忠心去挽留他，一切按照宪法办事。

军队国家化在制度上通常有以下特征：

第一，是军队管理的文职化。在民主国家，军队属于国家，而国家主权最终应该在人民手里，为了使人民主权的原则在军队管理中得到确认，法律通常会规定军队的最高长官就是民选政府的领导人，军方领导人充当民选领导人的顾问并执行民选领导人的决定。文官统率军队不是因他是天才，而是因他是民选的代表，责无旁贷的承担指挥军队的义务。即使偶尔要由军人出身的人担任国防部长，也应由法律规定担任此职的军人必须

在退役多少年后才能担任此职。美国规定军人必须在退役 10 年后方可担任国防部长。

第二，是军队的职业化。在现代民主国家中，国家军队对服役的人员不再实行无报酬的义务兵役制，而是象各行各业一样实行有报酬的雇佣制；军队不去从事那些本职工作以外的社会活动，如修路、修桥等公共建设活动，只一心一意专注于本职业的训练和建设。军人以军事为职业，不得经商，不得从事除军事之外的其它活动。军队内部非战斗人员的文职化、实行军衔制等。

第三，是军队的中立化。在现代民主国家，由法律明文禁止任何政党和团体在军队中建立支部；军队必须与一切政党彻底脱钩，军人不得组成政党或加入任何政党。禁止军队干预政治，军队严格保持中立，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这是一个国家在废除专制后确保民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军队不支持任何政治观点和任何派别，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服从民选的国

家领导人，不服从任何政党的领导。军人必须退出立法机关，不得担任议员。军人作为选民有选举权，可参加投票，而军人只有在退役后才可参加政党、充当政治候选人参与竞选，才可在政府做官，这也是民主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

在一个国家，军队的政治化程度越低，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就越小。在军队高度中立化的英美等国，政变的可能性等于零，即使毫无军旅生涯的总统，也完全不必担心军人的反叛企图。军人不必为政见的分歧做无谓的牺牲，老百姓也免于战乱之苦，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可以说，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同军队国家化密切相关。

军队国家化对于军队本身具有诸多意义：

第一，军队国家化可以充分保证现役军人的待遇和退伍军人的福利。在现代民主国家中，国家军队对现役军人实行雇佣制，军人的报酬是有可靠保证的，同时也可以为退伍军人的福利提供法律

保障，以法律的形式将这种福利固定下来，形成完善而明确的制度。这种对退役军人的福利制度在民主国家屡见不鲜，比如，美国军人在退役后就可以获得到大学进修的机会，这成为许多军人退役后的一种优先选择。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私人军队、皇家军队和党卫军，当这类的军队失去战斗力，或者遇到政权更迭，或者军队长官在政治斗争中站错对，都会导致部分军人的处境发生变化，有些甚至很悲惨。

第二，有利于吸收先进人才加入军队，提高战斗力。人才是中国军队发展的关键，现代化战争属于高科技战争，而高科技的武器需要懂高科技武器的人员来操纵，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能否吸收大量先进的人才进入军队，参与武器的研制开发，先进武器的操纵和使用以及先进军事战略思想的研究，对军队的发展无益具有不需言喻的作用。当中国军队成了国防军，有了法律地位，其军队的尊严也提高了，并且，现役和退役军人的福利待遇具有法律保障，就比较容易吸收优秀人

才进入军队，对提高中国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是大为有利的。

第三，军队国家化可以使军人摆脱无穷无尽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汇报。对现代军人来说，重要的是服从命令，遵守纪律，掌握先进武器的应用，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现代军人和传统军人相比，责任更大，专业化要求也更高，当他们的精力和时间都被用来学习政治文件，执行政治任务，那就会耽搁了业务训练和正常休息，不仅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而且摧残了军人的人格。

民主国家普遍实行军队国家化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的产生不仅是由其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决定的，也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从军队产生的历史来看，民主国家的军队通常不是由政党组建，一般来说，军队产生在前，政党出现在后。比如，英国的职业军队创建于 1642 年，而其政党形成于 1679 年以后；美国军队建立在 1775 年独立战争中，其政党则产生于 1787 年前后。从政党产生

的历史来看，民主国家政党通常不是在革命的环境产生，而是在建国后由议会中不同派别逐步发展而来。从民主政党的使命来看，民主政党通常不领导颠覆性的革命、只参与竞选，进行合法的权力更迭，这也使其不直接与军队发生关系。

与以上不同，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落后的国家，政党往往是在民族危亡中应运而生，政党不是产生在公开的议会，而是产生在秘密、非法的环境中；不是产生在相对和平的年代，而是产生在战斗频仍的革命时期。政党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建立自己直接掌握的军队。革命型政党的首要任务是领导革命胜利，在革命胜利后要保卫胜利成果，因而必须直接领导指挥军队。比如共产党的中国就是这样，先是组织了共产党，然后共产党又组建了自己的军队，这样一来，共产党与军队往往是合成一体，天然地形成直接关系。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纪要中，规定过“支部建在连上”，中共也由此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长期以来，这支军队被称为“人民军队”，也被称为“共产党军队”。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将此总结为一句话：“人民军队忠于党，人民军队为人民”。这个总结比较形象，也比较符合事实。说这支军队是“人民军队”，这是因为人民养育了这支军队；说这支军队是“共产党军队”是因为这支军队只听从共产党的指令。事实上，中共建政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国家利益方面多次出力流血，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也确实多次听令于共产党内的实力人物，对党内的其他政治派别进行过支持或镇压。比如，“打倒四人帮”这件事，无论性质如何，其实质是一场有军事支持的政变；再比如，一九八九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军队国家化，这是迟早的事情，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也符合世界潮流，但是中国社会远没有军队体制改革方面找到共识，这里面充满了艰巨和凶险，也是必然的。

2009年1月19日,《求是》杂志刊登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文章,称:在当前敌对势力大肆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的形势下,铸造我军官兵忠诚于党的政治品格尤为重要。从徐才厚文中可见,连主张“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这些观点都是难以接受的,是敌对势力所为。可悲。

下篇 关于民主和民主化的种种中国式疑问

一,中国大陆的广大人民需要民主制度吗?

中国人自出生之日起,就应当具有生存权,接受教育的权利,身体健康的权利,免受歧视的权利,当一个人成年,他还应该具有选举权,他可以自由表达思想而不受迫害以及公正分配劳动成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享有的言论自由权,结社自

由权，示威和静坐权，游行的权利。而这些列举的权利其全部的内容其目的在于保障每个中国人一个基本的权利，就是做人的权利，做一个有尊严的人的权利！

人权不是来源于某个开明君主的恩赐品，也不是由自以为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极权组织的给予物，而是自我们诞生之日的就天然具有的，正如《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指出的“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这些属于天赋人权！

人权对于每个中国人的作用应该是不言而喻，能平等的接受教育使身处贫穷的人也有机会改变自身命运，公正的医疗保障我们的生命而不是面对病魔束手待毙，诸如等等。然而，这一切基本的权利，靠什么保障？靠那些专制制度下的道德高尚者吗？靠不住，绝对的权力是人权的敌人，它

本身就是无法无天的，它本身就来源于对公众人权的剥夺。绝对的权力即便对人们有所施舍，那也是为了它自己的需要，甚至可能是卑鄙的阴谋。毛泽东在 1946 年信誓旦旦地说：“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但是 1949 年以后却一门心思地做各族人民的导师，以暴力和欺骗的方式强迫数亿人每天背诵他的著作，接受他的思想；毛泽东曾一时心血来潮，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言论政策，但立即又发现这个政策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于是马上翻脸不认人，把放胆放言的几十万文化人关进“牛棚”，随后毛泽东居然无耻地宣称自己是搞“阳谋”，而非阴谋；毛泽东曾鼓励“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这只是鼓动群众内斗，借刀杀人，目的是为了打到中共党内其他领导人，如果谁胆敢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矛头对准他本人，则死无葬身之地。中共党员张志新批评毛泽东引来杀身之祸，而且临死前先被折磨致疯，被割喉致哑，这已是路人皆知。

绝对的权力导致的是绝对的腐败，而又有多少人可以在没有监督的前提下能拒绝权力这种强腐蚀剂的腐蚀。在毛泽东去世后，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虽然没有了，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方式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只是一群人的领导代替了一个人的领导，只是一群人代替毛泽东进行统治从而演化成了一个统治集团。没有了毛泽东，却有了众多的小毛泽东。人们现在可以看到，众多的省委书记都成了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众多的县委书记都成了独霸一方的割据诸侯。压制信仰自由，强取豪夺，野蛮拆迁，当官的欺负老百姓，把上访者关进劳教所，把异议者关进精神病院，这都成了司空见惯。各级官员习惯于滥用法律对付那些妨害他们攫取利益的人，但他们在必要的时候总是连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 1946 年 2 月 1 日曾这样批评国民党：“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

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看看中国人民基本权利常常被非法侵犯的现状，这些话在今天完全可以原封不动地还给那些胡作非为的共产党官员们。

面对剥夺基本人权的种种恶行，中国人民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建立民主制度，用制度来保障我们基本的人权!只有当人民把国家的政治权力真正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才能真正的保障自己的利益。民主制度有什么用?能让老百姓免于被掠夺，能让贪官污吏难以伸手，能让我们

的子孙后代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活着，有自由的思想 and 独立的人格，而不是作为一个奴才和工具困苦而浑噩的过一辈子！

建立民主制度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据联合国的相关统计（2005 年），当今世界的前二十位发达国家全部实行的是民主制度。如果说，在经济上，全球化不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的话，那么在政治上，民主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中山先生曾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民主思想成为了一种普世价值观，在多数国家实行的是民主制度的情况下，拒绝民主制度和世界潮流就是背道而驰，必将引起大多数国家排斥。关于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国家的异同比较，刘亚洲将军的言论可谓精辟，他说：“今天，日本有哪一个政府官员敢用公款赌博和公款嫖妓或腐败曝光后执政党敢不谢罪下台？而我们的贪官污吏则如雨后春笋，前仆后继。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在这个谁站在信息科技之巅就站在全球

之巅的时代，彼方是信息无障碍地交流、碰撞、激励和竞争，而我方则是绞尽脑汁地封网、过滤、钳制和内耗；彼方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而我方则是最大限度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这彼我双方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文社会体制，难道不最终都会反映到国民的综合素质上？难道不最终都会落脚到综合国力上？那种认为只要西方技术，只需引进硬件就行，那种将先进技术与产生这种技术的先进人文环境分离的思维，从当年的‘洋务运动’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一条将中华民族引向自甘落后、自取其辱之路，可今天却还是有人要硬着头皮继续走。”

如果说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是为了保障人民权利和促进国家长远发展，那么残酷的社会现实更让这一目标显得迫在眉睫。今天的中国，地火奔腾，暗流涌动，任何一个清醒的政治家都会意识到这个国家所处的危机，严重的贫富分化所造就的激烈的社会矛盾使中国如同一个压力越来越大的高

压锅。1992 年以来，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分化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多数群众的生活不仅没有在中发展中获得相应的改善，而且要背负高房价、高污染、高医疗费用、高教育费用和高丧葬费用等各种负担，这些负担显然都是经济高速发展所带给他们的。包括农民、城镇失业下岗职工和普通的平民阶层境况堪虞：大量的工人和农民生活困苦，他们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其社会及政治地位在逐步下降，声音越来越弱，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逐步被边缘化了。如果说工人和农民生活困苦的感受是直接的，那么城市平民阶层和学生阶层也大多觉得活得很累。所谓“改革”愈来愈成为“零和博弈”——少数暴富者所得，即社会其他群体所失。对一个正常的社会而言，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直接关系到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应当放在公共投入最为优先的位置。然而中国政府不仅在这些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小得可怜，而且强行把教育、医疗这些涉及公民基本保障的公

共产品给“市场化”了。而这种“市场化”的压力即使是身处城市平民阶层的人民也备感寒冷。

相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新的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文化垄断都形成了。特权盛行，腐败盛行，垄断盛行，权钱交易盛行，有权的就发财，有钱的也能当官，这已经众所周知。更为可恶的是，有权有势的又收买大批御用文人为统治者大唱赞歌，把各种不公正的现象都归纳为“中国特色”所致，而把各种见缝插针的掠夺行为归纳为“与国际接轨”。大多数观察者对中国大陆现状的判断是，为数不多的特权家族和世袭家族特权组成的利益集团已经使这个社会的公共管理失去了公共性，同时又使所谓的市场失掉了起码的公平性。政治决策为特权家族和世袭家族所左右，政府有关部门成了权贵的代言人，公共政策被利益集团操纵而成为其自肥的利器，普通民众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了任其鱼肉宰割的人质，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其自由的表达权被悄悄扼杀，不得不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很多为中国民主化呼吁

的社会良心多次锒铛入狱，却又不为公众所知。至于民营企业和个人投资者，他们也和资本市场一起被权贵所控制，往往成为权贵集团操纵经济的牺牲品，甚至在民营企业家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赚一百万是自己的，赚一千万是家族的，赚一个亿就是共产党的”，至于基层行政人员，普通士兵、普通警察等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成员，其家庭和自身同样不得不感受上面所描述的各种伤害，不能幸免。

民主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制度是万万不能的。从田间地头到街头巷尾，再到茶余饭后，人们都知道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体制问题，也就是制度问题。网络上有一位著名妓女，叫流氓燕，她也很清楚地说过，不民主不行。做自由的人，为自己做主，为社会做主，这是普世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不是中国大陆人民需要不需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还政于民，建立民

主制度。也惟有如此，我中华民族才能与世界人民一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为什么垄断利益集团要反对民主制度？

建立以宪法为框架，以人民主权和有限政府标尺，以三权分立，普选，政党竞争，言论自由和军队国家化等为内容的民主制度，对于中国人民的未来福利和国家的发展的无比重要性，任何一个对人民痛苦还抱有同情态度的人，都不会漠然视之。而令人惊讶的是，人们都能看到中共领导人的反复声明，他们喋喋不休地告诉公众，坚决不实行三权分立，坚决不实行多党制，坚决不实行新闻自由，坚决不实行军队国家化。那么，为什么垄断利益集团仍然对民主制度依然抱有强烈的仇视态度？事实上，理念的认知固然重要，而利益的取舍更决定垄断利益集团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在经历“苏东巨变”后，各国共产党侵犯人民权利和出卖国家主权的罪行都已昭示天下，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性也随之荡然无存。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财富迅速积累，但这些过程都是围绕权力体系进行的分赃过程，富者恒富，穷者恒穷，底层民众大多不相信所谓共产主义的鬼话，而高层的统治者则花样翻新，借机推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这些都有效吗？没有。因为只有“特色”，没有社会主义，只有垄断和掠夺，没有公平和正义。一个很显然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中的既得利益者已经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且转化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一个几无长远政治理想的政党，只知道“发展”，只知道“稳定”，这就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朝廷了。

以前，中共领导人常说“旧中国”有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现在我说，“新中国”也有三座大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平常人们说的上不起学、看

不起病、养不起老，还说生不起、活不起，也死不起，这些困境上面都有这新的三座大山。

首先，说说经济权贵这座大山。邓小平先生发起了一场改革，鼓励一部分中国人率先致富，然后带动全体中国人共同富裕，还说，如果不能共同富裕，改革就算失败。30 多年来，中国在走出贫困的同时，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超级富豪。从万元户——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中国式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2003 年，中国共计有三千位身价超过一亿元的亿万富豪。现在是 2008 年，估计更多了，亿万富翁以超越社会发展的速度被制造出来，无数暴发户一夜间积累的财富连世界上最富裕的美日等国的超级富豪们也瞠目结舌。多少年可以成就一个贵族，多少年可以让亿万富豪的人数从 3 千到 5 万，在当今中国通常只需要两年多一点的时间，甚至更短。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买回 20 辆悍马。中国人刚刚越过 1000 美元的温饱线，可却是世界上

的奢侈品消费大国。100 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 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 万元的钻石……林林总总的国外奢侈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进入中国。中国富豪喜欢奢侈品，且气魄之大、出手之阔绰，连世界首富洛克菲勒也自叹弗如。法国产的“人头马”主要消费市场是中国；泰国的色情服务业是该国旅游业的支柱，光顾色情场所的中国富豪是出手最大方的客人；缅甸赌场为该国提供大宗财政收入，但这个国家的赌场主要设在中缅边境，在里面一掷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国富豪。

当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们一掷千金时，他们有意意识带动中国人共同富裕吗？没有。当美国的超级富豪洛克菲勒一边啃着三明治面包一边匆匆赶往学校和慈善机构捐款时，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正在五星级酒店里喝人头马吃保护动物泡小情人。当亨利·福特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超级富豪时，他想到的不是如何拿赚来的巨款挥霍享受或是买个大官作；而是想到要让他的工人能买得起他们公司生产的小轿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还创

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成本大幅降低，于是他的工人都能乘福特车上下班。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特权社会，富豪集团的财富绝大多数是靠不公正手段取得的，真正有远见的富人不多。富人的健忘表现在那些从底层社会起来的部分人忘记了早期的艰难岁月；短视表现在不愿用多余的财富回报社会，以为自己压榨下去，就可以永远地富下去。当然，也有不少人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富下去，于是压榨到一定时期，就很聪明地携款出国，到西方文明世界去了。

正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富豪，所以中国人有更多的仇富心理，所以茅于軾先生提倡保护富人的时候被众怒所抨击，所以中国历史上才有那么多杀富济贫式的平民起义，所以，中国富人的寿命也很少能够超过一百年的，所以才有“富不过三代”一说。英美等文明国家即使有穷人杀富人的现象也是个别的，通常不会酿成全社会性的贫民暴动。大部分英美式富豪有远见，也不乏善心，他们把赚来的大部分财富用来回报社会，比如比尔·盖茨

先生就是这样。这样的富豪，谁还会想到要杀他们呢？如果说中国的平民起义源于国民的仇富心理，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理，富人难道不是始作俑者吗？

其后，说说文化权贵这座大山。自董仲舒尊孔以来，中国历史大部分时间是崇文息武，文人之多，形成一祸，至今尤烈。文人身上寄托着社会的文明理想，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都是走在社会最前端的先进群体，怎么能成为祸害呢？因为中国文人喜欢自诩知识分子，但其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依靠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它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这叫做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这个公认的概念可见，中国有很多文人，他们可谓文化权贵，但绝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何谓“良知”？“良知”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捍卫真理、正义的勇气，以及不为眼前的“功利”所引诱而被世俗势力所“收买”。可是，中国的文化权贵都做了些什么呢？以前，他们长袖善舞，喜欢做帝王师，现在更加无畏无耻，他们为了一点小钱给贪官炮制涂脂抹粉的“假新闻”，在给国家蛀虫写传记，以“知名人士”的身份为了那顶在眼前晃动的官帽子放弃原则，也有更多的三流写手在编写“名人录”、“专家录”、“艺术家录”……；同时，有好多“医学专家”在堂而皇之地拿“药品回扣”，有好多“高级教师”在巧立名目地从学生口袋里掏钱，有好多“经济学家”为了财阀的“红包”在权威职位上说混话，有好多文痞把黑社会头目吹捧为大企业家……

当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遭到暴政权力迫害的时候，当异议人士遭到丑恶当局打压的时候，当民主人士者倡导普世价值而遭到精神身体上双重围剿的时候，到处都有所谓的“文化权贵”活跃的身影，但是，当权力应该遭到质疑的时候，他们

一概哑口无言，似乎是一群吐信的蛇把狰狞的面孔收敛起来突然变成了温顺的乌龟，好象突然间患了“集体失语症”！几十年前，有着名大科学家钱学森为亩产 10 万斤论证，有郭沫若这样的大诗人为刽子手高唱颂歌，现在又有余秋雨、司马南之流忙于为专制体制涂脂抹粉，但偏偏这些人被“年轻一代”称做中国的良心，这恰好是中国主流文化权贵深度堕落的真实写照。即使放在今天，鲁迅先生的思想也一点不落后，因为鲁迅所抨击的一切丑恶在今天都变本加厉地更加丑恶了。今天的文化权贵比谭嗣同、鲁迅那个时代要多出百倍，可有几个文化权贵拥有鲁迅那样的民族责任心和道德勇气？有几个不在“利诱”面前抛弃人生的准则？有几个拥有真正的“良知”？

然后，再说说政治权贵这座大山。中国是一党制国家，政治权贵主要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小撮”，广大党员算不上什么，只是政治符号和一堆数字而已。在这之外还有次要的，就是中共的八个民主党支部，他们与仲共党内的政治权贵遥

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政治权贵。中国的政治权贵来源于革命，是革命的成果，又固守革命的成果。前 30 年，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掠夺，掠夺公民的权利，掠夺国民的财富，掠夺人民的精神；后 30 年，他们以改革的名义瓜分，瓜分公民的权利，瓜分国民的财富，瓜分人民的精神。公民、国民和人民，他们成了什么？他们成了“草民”和永远的老百姓，成了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没有自己的权利，没有自己的财富，没有自己的精神。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权利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和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权贵。反过来，这些政治权贵是既定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又会死命地维护这个制度，于是就会营造相应的文化氛围，培养相应的国民性格，扭曲正常的人性。

中共元老陈云说，权力只能交给革命者的后代，革命者才是安全的。没错。目前中国的各级政权都在各级太子党的手里，他们盘根错节，利害攸

关，确实是少有政治权贵出来挑战政治权力和政治格局。看着各级大员都和前朝大员有血缘关系，又和本朝大员有姻亲关系，于是，有人说，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只是少量的代表中国人民的人站起来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前，陈胜和吴广问过这话，现在似乎又有人问了。有官员去农村调查，问农民：你们缺什么？农民回答：我们缺陈胜和吴广。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就是因为草民没有权利，导致官僚为所欲为，然后掀起革命，毛泽东曾经说民主可以走出这样的治乱循环，但是很明显，中国还在这样的循环中难以自拔。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之子李勃的一句名言：“高干子弟哪个不做生意，没个千儿八百万就干脆别在‘太子党’里混，别的高干子弟也瞧不起你”。省长之子如是说，市长之子也如是说，县长乡长局长的孩子们都在如是说。有哪个省长市长县长乡长局长的孩子们在社会底层呢？没有。革命者的后代继承了革命的成果。龙生龙，凤生凤，

革命的后代玩权玩钱如玩命。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人，我们都知道他们做多大的官，也知道他们发多大的财；新一代的改革领袖，那些“核心”的儿孙亲属也不甘示弱，后来居上，一个个都在权力场和金钱场赚了个盆满盂溢，又在文化场混了个趾高气扬。

吃人的，究竟还是人。三座大山的“山”，不是白山黑水的“山”，是少量的人。中共建政 60 年来，权贵们通过前 30 年的继续革命巩固了对权力操控、对财富掠夺和人格的蹂躏也践踏，通过后 30 年的摸石头改革进一步彻底瓜分了社会财富、国家权力和人的人格。政治权贵、经济权贵和文化权贵，他们三位一体，相互连带，相互重叠，相互捧场，绑架了中国的国家公民价值观、公民利益和国家道德。如此一些权贵用权力、金钱和文化把自己相互捆绑在一起，然后有用亲情使大家血浓于水，厉害攸关，共进共退，这就形成了一个权贵集团。这个权贵集团凌驾在 90% 的国人之上，垄断了权力、金钱和国运。更可悲的是，

在权贵一脉相承和血脉相传的同时，下层百姓的贫穷也在世袭。穷者恒穷，富者恒富；弱者恒弱，强者恒强，这是最大的腐败，这是最恶的腐败，比皇上复辟还要腐败。

今天中国的矛盾绝非中共所标榜的“社会生产和人民需求”，这一简单的物化标准显然是欲盖弥彰。今天中国最大的社会矛盾实是和特权家族和世袭家族和广大的人民的对立，也就是官民矛盾。这一矛盾的焦点就是对利益分配权的争夺。由是，我们似乎对特权集团为什么要反对民主制度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没有别的，特权集团就是出于贪婪而不愿意放弃专制制度，因为专制制度的存在可以让他们轻易的获取源源不断的利益，那么让他们建立民主制度便有了挥刀自宫般痛苦。

三，中国人民有享受民主制度的前景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各国相继发生民主变革，在经历种种阵痛之后，先后从专制国家转变为民主国家。这一系列变革被国际社会称为全球“民主第三波”。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渐渐退去的同时，第四波全球民主化浪潮又在酝酿，至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北非中东各国又出现此起彼伏的抗议运动，人们普遍地反对专制，要求民主。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南部地区西迪布吉德一名26岁的街头小贩遭到城市警察的粗暴对待（该青年大学研究生毕业，只因经济不景气无法找到工作，在家庭经济负担的重压下，无奈做起小贩）。在遭到粗暴对待后，该青年自焚抗议，因伤势太重，不治身亡。这名青年的过世，在激起突尼斯人同情心的同时，也激起了突尼斯人长期以来潜藏的对政府、社会生活的严重不满，当地居民开始了要求总统本-阿里下台的持续抗议活动，并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社会骚乱。总统本·阿里被迫选择离开突尼斯，前往沙特避难，总理加努希出任临时总统。在阿拉伯国家，这是第一次政权因为民众抗议而倒台。由于突尼

斯的国花是茉莉花，这场政变也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紧接着，这股红色革命开始蔓延到埃及。2011年1月25日起，埃及大批民众在全国多个城市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一些地区的抗议活动甚至演变成了血腥冲突。继而，“茉莉花革命”的骨牌效应开始传导至北非和中东的诸多国家，包括也门、利比亚、巴林、阿尔及利亚、伊朗等伊斯兰国家。也门主要城市爆发大规模的游行，巴林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伊朗举行反政府示威等等表。从这些国家可以看出一个共性，内乱有着深厚的社会、政治原因。

表面上看，这些国家经济形势严峻，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和通胀率都比较高表。就突尼斯国家而言，2010年突尼斯的经济增长率为3.4%，失业率达14%，其中有30%是年轻人，另有资料指青年失业率可能高达52%；除此之外，通货膨胀率达到4.5%左右，超过历史上3%的均值水平，侵蚀了居民的购买力，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和未就业群体。再说埃及，据统计资料数据显示，埃及目

前有 8000 万人口，埃及的失业率 9.7%，而失业者中，90%是青年。此外，该国通货膨胀率高达 12.8%，40%的人生活费每天不足 2 美元。中东很多国家都存在这种类似社会问题。

更为主要也更为根本的是，北非和中东发生“茉莉花革命”的这些国家的政治普遍缺乏民主，统治者独裁，政府腐败。在经过长期与政治自由和民主无缘之后，民众普遍希望政治上的改革。例如在突尼斯，本阿里担任总统长达 23 年，因高度集权、拒绝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而遭受批评。长期以来体制僵化、改革滞后严重引发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本阿里的家族和朋党获得了垄断利益，民怨越来越大，最终令其彻底丧失了执政的基础。又比如巴林的示威者声称，他们希望获得更广泛的政治自由与彻底改革。他们还要求政府向议会移交更多的决定权，并结束王室对政府高层职位的垄断。至于卡扎菲就更不用说了，他执掌利比亚政权 40 年左右，并且在执政期间进行过恐怖活动，乃是一个疯子。更为恶劣的是，卡扎菲居然

对利比亚起义的人们进行武装空袭，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从社会分化的角度看，北非和中东发生“茉莉花革命”的这些国家民众普遍比较贫穷，而特权家族和世袭家族则富可敌国，比如利比亚只是一个 800 万人口的小国，但仅仅卡扎菲家族存在别国的财产就达到 800 亿美元以上。

人们都还记得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以后，这些国家经历了短暂的转型困难期，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曾经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分析，认为都是革命惹的祸，都是民主惹的祸，似乎非“中国模式”不能解决发展与稳定的问题。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最后几年，中国官方媒体关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报道少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社会已经矛盾重重，而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发展起来了，人民幸福指数提高了。

世界银行提供的报告中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从 1999 年至 2006 年，年均增长速度约 6%，经济总量增加了

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币3200至3360元)之间。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可以这样说，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可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美元。我们再看看剧变后的东欧，到了2006年已经有二个国家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0美元，其余国家人均GDP全部超过5000美元，据世界银行预测，在2020年左右，东欧国家将全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北非和中东发生“茉莉花革命”的这些国家，其革命还在进行中，革命的后果还有待继续观察，但是可以断言，革命对北非和中东人民来说，只会更好，不会更糟。这世界没有比专制更糟糕的东西，也没有比“富者恒富，穷者恒穷”更糟糕的东西。人们也许能一时忍受贫穷和奴役，但不

会永久地忍受贫穷和奴役，这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经验。所以人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只要人民拥有了主宰自己的权利，只要人民拥有了管理国家的权力，北非和中东各国的前景一定是美好的。既然前苏联和前东欧地区的人民可以在民主转型以后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那么北非和中东地区的人民在民主转型以后也一定可以过上自由民主的生活。

好，我们把话题回到中国。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国家，它有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历史，也有数十年类似苏联东欧的共产极权历史，也有数十年类似北非中东特权集团祸国的历史。数千年专制统治的经验，它有；红色极权统治的经验，它有，特权集团统治的经验，它也有。任何专制统治者都在极力地防范别人取代它的统治，任何专制统治者都在极力地防范人民争取自由，中国的专制统治者也不例外，它防范苏联东欧的转型模式在中国出现，它防范北非中东的转型模式在中国出现，它防范一切可能的民主转型

方式在中国出现。但是人们能看到，中国具有前苏联和东欧曾出现的重重矛盾，也有北非中东正在出现的重重矛盾，这是要命的地方。过去的一些年，很多研究民主化的学者认为北非和中东的民主化道路最难开辟，其理由或者归咎于宗教因素，或者归咎于文化因素，但现在北非和中东发生“茉莉花革命”的这些国家已经证明没有什么东西能挡住自由的吸引力。结论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永久遮挡住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的目光，我们放眼望去，中国的台湾部分已经民主了，大陆部分没道理不行。

有点政治常识的人一般知道关于“永远的利益”这句话，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利益！普罗大众需要建立民主制度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尤其要保障对自身所创造利益的公正分配权。而专制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则通过专制制度来攫取非法利益，他们需要保障并强化专制制度的存在，因为这比一切关于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更来得实在。通过专制制度确立的分配权对垄断利益集团的意

义比建设一个人民政党更更为重大，基于这一利益的本能驱使让“中共组织”这一庞然大物不成其为一个信仰主义政党，也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政党，其实质成为一个超越于政府，人大和法院之上的超级组织。垄断利益集团通过这一超级组织维持了专制制度的存在，从而保证了自身利益的源源不断。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如果说这句话还只是表现出朴素的民本思想的话。那么，现时但凡有一点民主常识的人来看，政府不过是民众推选出来管理公共事物的服务机构，那么执政权的更替就是一件极为正常的话。打个比方，这就仿佛业主和物业公司的关系，业主对物业公司的服务不满意，当然要剥夺其管理资格，换另一个物业公司。如果一个被业主认为不合格的物业公司说，那把我们公司的经理换个人，还得我们来做。那业主完全有权选择否定。特权集团并不这么看，他们把政权当成私人财产决不肯放手，他们身处

现代，而思想却是极为陈旧。在他们看来，天下是父辈拿鲜血换来的，就要世世代代的坐下去。这一点，看看父传子的金家王朝和兄传弟的古巴则尤为印象深刻。另一方面，如果说贪婪、短视和自私还不足让特权集团底气十足的话，那么对掌握在手的暴力机器的迷信则可让他们如打了一枝强心针，这一点可以从统治者对人民越来越习惯使用暴力可以看出。而科技的发展让“革命”表面上似乎变得困难许多，事实上真是这样吗？不是的。别忘记前苏联曾经是第二军事强国。

人们也许能一时忍受贫穷和奴役，但不会永久地忍受贫穷和奴役，这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经验。中国人民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中国式的社会转型，这或许还不确定，但民主的浪潮一定会波及中国的海岸，这是确定的。毛泽东曾说过一句话：高贵者最卑贱，卑微者最高贵！这句话某种意义上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不必因人废言。垄断利益集团获得利益是如此轻易，这让他们内心很容易膨胀，自以为能力超人，而他们时时处于

自己缔造的封闭的独立王国中，也让他们目光短浅，不以开眼看世界的心态了解社会现实和世界潮流。内心膨胀和目光短浅的结合使特权集团无法认识到一个简单道理：放弃一部分利益固然使他们失去这部分的利益，却可以使他们保有自身的大部分利益，而要独占所有利益必将使他们失去一切利益，这一道理已经被历史证明过无数次。特权使他们短视，而短视使他们看不清历史发展的潮流，那么最终他们会被历史潮流所淹没，这也没办法。

四，中国大陆有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吗？

反对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人有一种不太新鲜的说法：中国的国情不适合实行民主！这种说法不新鲜，是因为满脑子专制思想的袁世凯也曾以此作为他当皇帝的理由。抗战时期，中共新华社也唱高调反驳这种论点，说：“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

认为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的人并没直接说中国的国情是不是就适合专制，但从他们列举的理由中我们不难看出持此论点的人是赞成专制制度。比如说：“中国人太愚昧落后，不适合实行民主”，又比如说“中国人口太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现阶段实行民主不现实”，又或“中国人长期受专制文化传统的熏陶，不适合实行民主”，如此理由，不一而足。总而言之，在反对建立民主制度的人眼里，中国的教育落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可以成为中国必须继续实行专制制度的理由。

“中国人太愚昧落后，不适合实行民主”这显然是荒谬的说法，民主是一种基本权利，这种权利既是高“素质”的人应该拥有的，也应该是“低素质”的人同样拥有的。那种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体现的是权贵集团内心的等级观念。在专制制度下，懂得民主、用言行追求民主的人都被称为民主人士，他们大多都在当局的监狱里，所以中国

不可能等到把每个人都教育成了民主人士了以后才去实行民主。自由和民主是人的天性需要，它与人的素质没有什么关系，相反，人的高素质是由民主和法治熏陶出来的。如果谈到“愚昧”，当欧美国家在两三百年前实行民主的时候，它们的人民对于民主的认知在各方面比今天的中国人不知要落后多少倍！然而它们都成功地实行了民主。今天，连蒙古、南非，以及很多比中国更落后的非洲国家都在进行民主实践，怎么能以中国人的愚昧落后为由拒绝实行民主呢？恰恰相反，正因为人们愚昧落后才需要立即实行民主，因为民主实践过程本身是最快地使人们摆脱愚昧落后、迈进文明生活的方法；民主实践过程本身也是最好的教育人们尽快懂得民主的唯一途径。电视剧《走向共和》中，一个乡下人对中山先生说，村里人没什么知识，而且不懂什么叫选举。中山先生反问：“老人家，您的小孩现在不认识字，但如果有人说，你的小孩不认识字，所以不要把他送到学校去，您觉得行吗？”这个乡下老人说：“那当然不行，就是因为不认识字，才有去学习。”

其次，“中国人口太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现阶段实行民主不现实”的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论人口，总量大的国家不少，人口密度大于中国和平平均资源少于中国的民主国家也比比皆是；至于说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颇为荒谬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由于地理，资源，人文诸多因素的不同必然导致经济发展不相同。关于人口和经济发展，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印度的人口同中国差不多，建国之初和中国情况相同，其国土面积只是中国的三分之一，印度实行民主 50 多年，也没有出现全国混乱。相反，没有实行民主的中国在 50 年的时间里，出现了无数惨绝人寰的政治动乱。这说明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解决人口多所产生的问题，只有实行民主才能消弭因人口多而导致的混乱。因此，实行民主与人口多少无关。

至于说“中国人长期受专制文化传统的熏陶，不适合实行民主”的说法更是不通。的确，中国有漫长的专制制度统治时期，然而，过去是专制制

度，并不表示中国现在和将来还必须在专制制度统治下度过，不管是它是以君权神授或自任代表的理由。请问世界上，又有哪一个民主国家建立前不是实行的专制制度呢？法国，英国等等，这些国家在民主制度建立前都实行的专制制度；而受中国专制文化传统熏陶的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人（台湾人、香港人、蒙古人和海外华人）、韩国人和日本人都能实行民主，为什么大陆就不适合实行民主呢？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已经证明：民主制度适合在任何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实行，实行民主与否同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没有关系。如果“中国人长期受专制文化传统的熏陶，不适合实行民主”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么继续专制的结果就是今后的中国更不能实行民主制度，这岂不荒谬？

那么，中国大陆现在的国情是否具备建立民主制度的条件呢？答案是肯定的！

第一：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中国建立民主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今天全球的民主国家已达到一百多个，这些国家中既有数百年民主史的“古老”的民主国家，也有刚刚开始民主进程的新国家；既有经济实力超强的大国，也有经济实力弱小的国家；既有东方传统文化习惯的国家，也有没有历史包袱的新兴独立国家；既有人口密度极大的国家，也有低广人稀少的国家。这一百多个民主国家的国情所具有的多样性，使中国在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时候可以获得宝贵的经验，正如古人说的“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全球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将为中国建立民主制度提供宝贵的借鉴。

第二：中国台湾地区人民可以为大陆建立民主制度提供诸多的参考和帮助；中国大陆建立民主制度还具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可以获得台湾同胞的帮助。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国民党领导人蒋经国先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毅然开放党禁，还政于民，为启动台湾的民主进程铺平了道路。

台湾的民主制度，不足固然不少，但其成果也是可圈可点，台湾人民比大陆人民幸福在于他们不但取得了令人艳羡的经济成就，更拥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在“民主制度统一中国”后，台湾人民在中国的民主宪政建设中将发挥极大作用。

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如民主选举等具体操作有了更多依靠；随着科技的发展，新技术和先进工具的运用，民主选举的操作性和透明化程度不断增强，从而显得更倾向于公平；资讯的发展让政党和候选人可以充分展示自己；先进的传播工具（例如互联网）也为人民的言论自由的表达提供广阔的空间。今天的时代不再是“豆选”时代或“马车竞选”时代，科技的发展必然为人民运用自己的权利提供更多便利。

中国社会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路线上蹒跚三十多年，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本性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本质上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时代和时代符号。贫富分化严重，官民矛盾激

化，吏治更加腐败。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一个企图解决市场问题的垄断体制，这个体制注定是一个不能解决问题但又在不断制造问题的体制。一个冲突重重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但其问题并不是永久不可解决，而是在等待解决的时机，关键是人们用什么方式去解决它。随着中国民间力量的壮大和民间政治的成熟，民间的活跃力量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他们活跃在学术研讨会、互联网、民间教会和各种艺术展示活动中，不断提出改变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合理要求，并且是不断用新的方式表达出来。在民间社会的努力下，特权集团的合法性危机正在积累，如果发展成政治危机，那么现在的统治方式是不可能延续的。中国的未来在技术层面上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但是在总的方向上必然是走向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公民社会。现代世界没有为我们提供别的可行选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只有尊重人的制度才能被人护佑。

时代在进步，人民在觉悟，大陆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意识到民主权利对于自己的重要性。从中国大陆一些农村基层选举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对公正选举的极大热情和参与感，而城乡之间的流动使得国人不在处于闭塞状态，他们可以共享和交流信息。一旦建立民主制度，这些将成为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内部因素。同时，民主化的世界潮流让我国建立民主制度没有外部阻力，而可期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更多帮助。

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早期实现民主制度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周边国家的抵制，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国家都是专制国家，一旦有民主化的尝试，就必将遭受专制力量的联合围剿。这样的事例在现代也有，人们也许还记得二十世纪中期的国际局势，当“社会主义阵营”兴盛的时候，捷克和匈牙利等国进行了民主化尝试，确遭到苏联中国的联合打压，直至把主张民主改革的力量关进监狱才肯罢休。但是在今天，民主化已经成为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近几十年来，只有顽固

坚持独裁的专制国家遭受国际社会制裁，而从没有见那个国家因为要建立民主制度而遭到“围追堵截”，当苏联东欧人民追求自由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支持，当北非中东人民追求自由的时候，全人类都在喝彩。因此，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也将是国际社会乐见其成的事情，中国民主化基本不存在外部的阻力，一旦开始民主化进程，世界各国给予物质和人员的帮助也是可预见的。这是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外部有利因素。

综合以上对“国情”的分析，我们便不难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民主制度的现实条件。今后，最关键的就是时机把握和力量积累，最关键的就是进行持久的政治反对。只要中国人民继续努力，前景就是光明的，除了枷锁，什么也不会失去。

北非和中东的民主化浪潮已经表明，不管你经济发展得多好，也不管你有多少稳定的方案，人们

对专制腐败的政府依然是不愿意接受的。“中国模式论”是与普世价值和世界文明对立，这种模式其实就是专制统治者普遍的模式，德国、日本和前苏联就这么一路过来，走向了民主。只要敢于与命运抗争，就能改变命运。要相信中国人民也行。

五， 为什么政治反对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

一种片面的政治观曾经长久地占据着人们的心灵，即认为政治的本质乃是权力斗争，与普通人无关。在一个少数人掌握权力、而大多数人处于政治上的被动地位的时代，这种说法貌似是正确的。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宫廷中一颦一笑一震怒，宫廷外可能有千百万人就开始忙碌起来了，甚至可能无数人要为此流泪流血。但这是与普通人无关吗？显然不是。在专制社会里很多人似乎远离政治，貌似与政治无关，但这仅仅意味

着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没有主动权而已，事实上，政治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所有人的生活，也包括对生活的想法。

文化大革命时代，毛泽东一句话就是最高指示，必须在 24 小时内传达到全国的工厂和乡村，数亿人要顶礼倾听，然后高呼“毛主席万岁”，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对普通人的影响。但是大饥荒时代，中国大陆因激进政策而饿死了几千万人，毛泽东却总结说，错误只是一个小指头，成绩依然是九个指头，这就是亿万人的政治对毛泽东的影响。正是因为小人物的政治微不足道，所以他们往往会认为自己的生活中没有政治。另一方面，在专制独裁的社会中，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政治权利，在对政治的主动决策中就缺少了人民的身影，这时候，政治被缩减为统治者的个人欲望、宫廷贵族的冷血阴谋。丑陋肮脏的专制政治会促使大部分人努力远离它，以免遭它的伤害，所以人们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只有油盐酱醋，只有衣食住行，只有生老病死，没有政治。这也印证了一个

道理：如果你有意无意地讳谈政治，那么你自己就可以断定自己生活在一个专制极权时代。

把政治视为“权术”、“统治术”。认为政治是为争夺权力和施展谋略和玩弄权术的活动，这就是传统的专制政治的主要特点。重要的政治学家比如马基雅维里和韩非都在宣泄这样的政治观点，直至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它对政治的认定依然是：政治是为了获得、保持、夺取权力的各种活动的总称。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的政治，大多是权力的存在，而很难看到权利的影子。但是自从法国大革命开始，这个世界经历了一波又一波民主化浪潮，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这些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制度化，至今公民社会已经渐渐成为现实，以平等公民权利为基础，以自治和开放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已经初见端倪。在公民社会中，不仅权力是政治，权利也是政治。当公民们就公共事务自由发表看法的时候，他就是在从事政治；当公民们就谁当国家总统进行投票的时候，他就是在从事政治；

当公民们因不满意某种社会现象而上街抗议的时候，他就是在从事政治。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他的这一说法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即使至今也看起来非常正确。既然所有的社会共同体都是为了实现某种共同利益而建立的，那么国家做为一个最大的、包含了所有共同体的政治共同体必然要实现最大的共同利益，这才是政治最初的使命，而权力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今天民主社会的政治文明才最接近政治的本质——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一种“至善”的事业。

中国知名学者于建嵘先生最近在不同场合多次公开宣称出现政治反对派会撕裂中国，对一个现代学者来说，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政治既可以是拥护某种权力或权利的主张，也可以是反对某种权力或权利的主张。政治垄断就是只允许拥护某

种政治主张，不允许反对某种政治主张，但是自己又不得不永无休止地反对别人的政治主张，也就是所谓专政。反对派的存在从来就是一个事实，没有反对派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问题，只有反对派以什么方式存在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政治反对从来就是一个常态。政治本就是双方和多方的事情，并不存在反对派独臂擎天就能撕裂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如果国家和社会真的被撕裂了，那也是政治各方的事情，而且主要是当权者的事情。缺少了反对派参与的政治，不得利益者只能依靠权力的施舍，如果权力施舍不够，就会发生动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把撕裂社会的责任归咎于政治反对是荒唐的结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撕裂了中国，这是政治反对派所为吗？六四事件撕裂了中国，这是政治反对派所为吗？法轮功事件撕裂了中国，这是政治反对派所为吗？跑马圈地和野蛮拆迁撕裂了中国，这是政治反对派所为吗？美国的政治反对派存在了 200 多年怎么就没有撕裂美国？欧洲的政治反对派存在了这么长时间，怎

么还促成了欧盟的统一？这是于建嵘先生必须思考的一些问题。

年纪大些的人都还记得，毛泽东曾经鼓励人们积极参与政治，所有的事情都要政治挂帅，但是毛泽东并不允许人们自由地参与政治，进行政治表态，他要求人们跟着他的思路走，他要打倒谁全国都要跟着喊口号，谁不喊就是政治不正确，就要接受批斗。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路线后，放弃了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刻意淡化政治生活，渐渐地，国人也由“政治挂帅”转为“不问政治”。但是中国大陆沿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走了几十年后，巨大的社会问题出来了，贫富分化，吏治腐败，官民矛盾，所有这一切问题依靠现行体制已经无法解决，必须进行政治解决。但是特权集团不这样想，他们要在现行体制下求得稳定，求得发展，以利自己。他们不鼓励甚至不允许人们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不允许人们有任何多余的权力和权利诉求，《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

和抗议自由，但这些自由在现实中被完全剥夺了。在高压之下，人们的表达权利空间很小，各种诉求难得放大的机会，这就使人们的基本利益无从保障。但也正是在利益无从保障的情况下，人们也逐渐懂得了政治就是所有人的利益，首先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想得到长久地得到这些利益就要进行政治反对。在一个专制社会里，政治反对就是油盐酱醋，就是衣食住行，就是生老病死。

对那些不自由的人来说，政治反对就意味着挣扎，这会给特权集团带来统治的难度；对特权集团来说，政治反对意味着被揭露，这会消解特权集团的统治合法性。如果政治反对的声音足够强大，民间就会更有信心，更有智慧，也更有力量；如果当局的统治合法性逐渐消解，它的信心、智慧和力量都会降低，此消彼长，总有迎来走向自由的那一刻。没有哪个专制政权能在普遍的反对中永远屹立不倒，世界上这么多民主国家都不是天生的，它们原来也是专制的，但是，人民在挣扎，在反抗，在进行政治反对，它们就民主了。苏联

东欧曾经象专制统治的黑幕一样，但毕竟黑幕揭开了，人民自由了，这都有赖于勇敢智慧的敢于进行政治反对的人民。中国人民前面的道路虽然坎坷，但还是要走这么一条政治反对的路线。毛泽东说：“扫帚不到灰尘照列不会自己跑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特权集团，你不反对它，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全球化时代的互联网和其他新兴媒体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个新的平台，人们利用这个平台积极地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比如“我有问题问总理”这样一类栏目，比如发帖和跟帖，比如私人网站和博客，比如微博和推特，这些新媒体的应用让国人直接参与到了公共事务的讨论中。从中可以观察到，国人对政治的关注度其实很高，他们甚至会切入一些看似很敏感的话题，结果导致“喝茶”，甚至被拘捕。在国人顶着压力通过互联网参政议政的同时，新媒体的发展也给官员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比如，官员腐败被网络曝光，代表委员出言不慎引来“拍砖”，等等。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中国式的监督在过去主要是组织监督，而现在则是组织监督和社会监督。而这些是，只有在新媒体时代才面临的课题。

中国几千年的皇朝都在更替轮回，至今不变，但是具体到每一个皇朝更替轮回的方式，人们会发现，交替之际颠覆方式都不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每一个皇朝的更替都不会完全重复上一个王朝的轨迹。皇朝虽会覆灭，但前朝的教训依然是最重要的教训，每一个当朝的统治者都会对前朝的教训有所警觉。现在的中国是共产党执掌政权，它会吸取国民党在大陆败亡的教训，这就可以肯定地说，不到万不得已，共产党不会给反对派办报纸的机会；不会给反对派建立民主党派的机会；因为他们是靠卢布起家的，所以也轻易不会给你一个接受外援的轻松机会。中国社会的转型时必然的，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也必然是中国未来的方向，这个世界没有别的选项供我们选择。那么，我们中国怎么办呢？现在可以说，有了互联网和新媒体，也就有了更多的进行

反对的新机会，那么中国人民就有了更大的可能去改变现行的权力和权利结构。

缺少了反对派参与的政治，只能是更加极端的政治，只能是更加独裁的政治，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政治才是撕裂社会的权力根源。缺少了反对派参与的政治，是一种缺少了约束的政治。权力在不受约束的时候就如魔鬼舞动的长鞭，每一次甩动都是撕裂社会的一击。中国当今的权贵之所以能形成利益集团，就是因为他们相互产生联系，但这些联系也会发生变化。利益既然会使他们凝聚在一起，也就会使他们分化，并产生争夺。而这时候，他们谁也无从在中国政治舞台独自表演，于是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依靠民间的反对派存在，就要从民间的反对派里汲取新的血液，虽然现在还不是适当的时候。独裁在坚持，反对也应该坚持，反对派也应该承担起社会的责任，不能叫专制统治者撕裂这个社会。

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不能指望统治者良心发现，也不能指望“稳定”前行，必须依靠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其中反对派的振作是最重要的和最关键的。未来中国的制度变革还要从反对开始，那么，反对就应该从每一个想做公民的人开始，反对就应该从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开始。人们应该相信，没有哪个专制政权能在普遍的反对中永远屹立不倒。权贵能把钞票存到外国去，也能把孩子送到自由世界去，但我们更多的国人不能，我们必须为实现民主这个事情负起责任，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子孙。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我们已经被奴役，生活在一个处处透着邪气的世界，但我们的子孙应该生活在一个正气的世界，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促使我们觉醒，履行公民义务，争取公民权益，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以言轻而不呐喊，不以位卑而不争取，当争取民主的呼声响彻云霄时，当争取民主的呼声震撼大地时，“民有、民享、民治”的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六，为什么说实现民主转型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上台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似乎否定到“没一点对”。但是，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彻底，他没有否定毛泽东思想，只是用政治实用主义的手法重新解释了毛泽东思想。

在邓小平之后，江泽民的御用班子搞出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胡锦涛的御用班子又搞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官方称它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延续和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这样的定位也是比较准确的。表面上来说，“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都没有相应哲学基础和庞大理论体系，只是一些现实政策的组合，经过御用文人的加工就写进了中共宪法和中共党章。从其实质效用上来说，“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也只能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因为它们都是跟随在毛泽东思想之后为专制制度的新发展做理论背书而已。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所采取的都是武断强推之方法，以至动用武装警察维持所谓“理论”的落实。行之实曰“拆迁”，美其名曰“维稳”，寻租归宗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什么是列宁主义？答案其实很清晰，列宁主义就是用民主集中制建党，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政权。毛泽东看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成了导师，能指导世界革命，他也想当个导师，于是刘少奇和林彪等人就大肆鼓吹毛泽东思想。一开始，斯大林还活着，毛泽东不敢胡闹，所以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理论”，很简单，对马列和斯大林都没有僭越。后来斯大林去世了，毛泽东觊觎斯大林成为世界革命总导师的地位，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人想为文化大革命做一件美丽的理论衣

裳，所以毛泽东思想又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就似乎发展了马列理论，超越了马恩列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白了，就是和平时期继续内斗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显然不适合任何社会的发展，包括专制社会。专制社会也需要专制之下的稳定。于是，邓小平上台后，又把毛泽东思想解释为：“实事求是”，这就成了一种谁都可以拿来用的东西了。谁能说自己不是“实事求是”呢？不相信毛泽东的人也会说自己是“实事求是”，追求民主的人也可以说“实事求是”。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嘴巴里的“实事求是”和众人的“实事求是”又不太一样。

回顾中共建党的九十年和统治中国大陆的六十年，人们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内部斗争的历史，也是一部鼓动中国人民相互斗争的历史。中共对斗争的热衷和熟练，一部分经验学自苏共和苏联，另一部分经验学自中国历朝历代的权斗史，所以中共搞起斗争来就得更残酷，也

更黑暗。1949 年中共建政之后的中国社会其实可以划分为两个时代，前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有些人说后毛泽东时代是邓小平时代或者改革时代，这也可以，但这个时代确定无疑是后毛泽东时代。毛泽东虽然去世了，但阴魂未散。邓小平只是以他的方式重新解释了毛泽东思想，并没有放弃毛泽东思想，而且中共也认可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对当今的中国社会而言，权利已然觉醒而权力依然作祟，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了纠命稻草而不是救命稻草。可以说，如果不能顺利越过毛泽东思想这一道精神之坎，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将困难重重。

关于毛泽东思想，有些人可以诋毁它，曲解它，但是谁也不能无视它，因为它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切断了中国历史和文化遗产，也在一定意义上隔离了主流文明对中国社会。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应该思考的人们就不能不认真思考一下。要重新思考毛泽东思想是什么东西，必须摆脱中共官方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重新思考的必要，这是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假如只有一个独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是一味地弃如敝履这也未必够，因为你说服不了那些视毛泽东思想为主臬的人们。因此，从自己独立的“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深刻剖析中共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和解释，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含义，并重新解释和定义毛泽东思想，这才是可行的路子。

在毛泽东之后，能够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真谛和真相的人是邓小平，除他之外的中共领袖无第二人能对毛泽东思想做深度理解，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和胡锦涛都不行。邓小平曾指出：实事求是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如果从邓小平简单的解释上看，毛泽东思想不算个什么思想，如果说实事求是就是一种思想体系，那么我说“做个好人”也一样是个思想体系。毛泽东和邓小平所讲“实事求是”乃是一种应用，是按照实事求是的方法系统应用马克思和列宁思想的实用主

义，这是关键所在。“实事”就是中国的专制实际，“求”就是寻找，“是”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中所体现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中国的专制制度和传统文化中寻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的专制问题，而是用中国的专制解决马列主义的问题，这是毛泽东思想研究者必须掌握的关键点，不掌握这个关键点，所谓的研究都是无力的批驳和无聊的吹捧。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式的理论空想结合中国社会传统的宫廷政治经验利用社会混乱以武装斗争来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延续了中国社会的新型专制，延续了传统的宫廷政治、宦官文化和官僚经济，并使之加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包装。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注意：非马克思主义），把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一系列思

想。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回顾历史，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体制改革的第一次尝试，不幸以悲剧收场。

一个民主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不可能有一种思想可以指导别的思想，不可能有一种思想通过强制凌驾于其他思想之上。美英等国的共产党都是合法的，可以参加政治竞争，只是因为人们没有给它足够的选票，所以它们才处于政治的边缘。民主社会之所以民主，并不是因为“民主的思想”扼杀了共产主义思想，恰恰相反，是因为民主允许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国社会历经坎坷，有个马列主义来指导已经够糟糕了，又横空出来个毛泽东思想，在和平时期鼓吹内斗，这就无比糟糕了。现在不说内斗，而说“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这其实也没什么好，只要有特权存在，“实事求是”就是予取予夺的理论工具。随意罢了。

今天的中国似乎又回到了始点，但面对的困难则远比一百年前复杂而深刻。面对这样复杂而深刻的困难，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必须重新审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因为这是中国红色专制的核心思想，并且已经通过权力浸染了全社会的思想空气。对当今的中国社会而言，权利已然觉醒而权力依然作祟，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了纠命稻草而不是救命稻草。可以说，如果不能顺利越过毛泽东思想这一道精神之坎，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将困难重重。面临着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革，如何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仅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任务，也成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一大任务。

有致力于中国民主转型的个别学者也在到处鼓吹毛泽东思想中所包含的政治技巧之精妙，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的公民运动。我个人认为，此大谬也。如果揭开马列主义的外皮，毛泽东思想就剩下了宫廷政治中的权谋了，它能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什么营养呢？我认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必须与两千多年来的宫廷政治做一个果断的切

割，未来的政治不能只是在宫殿和高墙内。我们的目标是公民社会，是要建立以平等公民权利为基础的，以自治和开放为特征的多元化民主社会。未来的政治应该是光明磊落的政治，是基于公民政治之上的政党政治，而不是继续分赃的宫廷政治。

七，为什么说公民运动是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主要力量？

马列主义既为人们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社会远景，也为人们描绘了社会主义的社会近景，同时提出了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方式方法，使用这些方式方法，马列主义者曾经获得过辉煌的胜利。自由主义理论主要是关于“民主”的理论，通过自由主义我们的眼界中里确会得到一个“民主”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但是这个“民主”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很少告诉我们应

该如何去建立它。有很多人都在喋喋不休地证明“自由”和“民主”，怎么达到“自由”和“民主”，反倒成了弱项。民主化的理论是形形色色，但是那些民主化的理论被反复琢磨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并不能复制，也不能移植。看到俄罗斯民主了，我们想学，但是找不到叶利钦；看到波兰民主了，我们想学，但是找不到瓦文萨；看到台湾民主了，我们想学，但是找不到蒋经国；看到不丹这个弹丸小国也民主了，我们想学，但是我们很后悔自己的国家没有开明的君王。怎么办呢？于是，更多的自由主义者陷入了空谈，并满足于空谈，他们时常发明一些新的词汇图谋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高明。在专制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空谈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因为总是有人在听。中国太大了，中国人也太多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总有显示自己高明的时间和空间，但是他们总是享受不到“自由”。但是历史反复证明，自由从来不是空谈而来的，自由是从争取自由的运动中得来的。

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一场为了保持中共统治权力为首要目标而不得不为的工作，其目的绝不是要放松中共对中国社会的控制，但是，改革在客观上已经违背了中共的初衷----独立于权力的民间社会在三十年间悄然成长。目前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后极权时代：稳定在暴力下稳定，和谐在谎言中和谐，发展在破坏中发展。中国社会显然已经分化成两个相互隔膜、相互冲突而又相互依赖的两个阶层：既得利益者阶层和不得利益者阶层。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成了官民矛盾。在邓式改革的后期，改革开放不断降温甚至停顿，因为改革已经难以支付继续改革的成本，开放也难以支付继续开放的成本。在权力结构拒绝改革的情况下，每一项新的改革开放举措都会成为权贵阶层进一步掠夺的契机，但是，不推出新的改革开放举措又会促使中国的社会矛盾在高压锅中进一步积累。胡温等政治家为了防范社会突变带来的风险，只能在僵持中无力地挣扎，他们难以打破改革的僵局，中国社会似乎在僵局中僵化。这样一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已

经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体制，而是一个不断制造问题的体制。

我们用三十年时间造就了一个不能解决问题的体制，这个体制顽固地僵持到现在，不但难以解决不得利益者阶层的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连既得利益者阶层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也就是说，既得利益者阶层和不得利益者阶层都不太认可这样僵化的体制了，只是人们身处中国权力社会的分赃系统中还有利可图，所以说，利益使这个社会还勉强可以维持自身的运转，但是已经在等待最后一根稻草了。从利益的角度上讲，破解这个体制僵局的也终将是利益的问题，因为既得利益者阶层在现有体制下已经难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不得利益者阶层更是走向举步维艰，盼望改变。权贵集团一方面利用权力独霸进行寻租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利用手中的权力败坏这个体制以非法的手段攫取更多的利益。就拿圈地这一简单的事例来说，按照最高当局的规矩进行的圈地本身就是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可是权贵集团

并不以此满足，他们还要破坏最高当局的规矩进行圈地。最高当局规定不能圈大块的土地，他们就把大块的土地分批次圈掉。最高当局规定不能圈占良田，他们就可以把良田划定为盐碱地。广大的中国人民一方面利用现有体制维持自己看似正常实则艰难的生存，另一方面又对败坏这个体制并深度伤害他们利益的权贵集团进行顽强的抗争，并且是以维护这个体制的面目来追求体制本身的变革。就拿上访者的事例来说，上访者群体所张扬出来的诉求并不是体制改革，他们只是要求最高当局按照体制的规则归还他们在利益链条中应得的份额，但是最高当局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最终促使上访者群体进行体制的反思，并产生了变革体制的积极意愿。

中国社会这个大的分赃体系是制度化的结果，由此衍生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制度的问题。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已经走向了反社会的方向，已经逐渐被既得利益者阶层和不得利益者阶层同时抛弃，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但

是对于那些致力于中国民主的人们来说，这恰恰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维权运动以维护法律体系的面目在肢解这个社会，并促进整个社会走向公正，所以维权运动成了中国式的民主运动。维权运动以维护权利和争取权利为主要运动内容，这就为中国民主展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道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经历了启蒙与反对为主要特色的民主运动之后，迅速发现维权运动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于是在他们的推进下，维权运动从点到面的展开，已经成为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走向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动力。中国的民主运动经历了启蒙的阶段，反对的阶段，现在实质上进入了一个参与的阶段，维权运动就是这个参与的阶段。但是维权运动显然吸纳了启蒙运动和反对运动的一些有益的经验，所以，维权运动具有继续启蒙的性质，也有继续反对的性质。大量的维权积极分子在维权的过程中具备了现代公民的意识和现代公民的做派，他们将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有益的力量；还有一部分维权积极

分子走到了政治反对派的行列，成了推动中国民主的战士。

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是以政治诉求为主要特征、以组党和参选为主要运动方式、以权力更替为主要目标、但最终也是要解决中国社会平等公民权利这样一个社会问题的运动，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是一种自觉的运动。民主运动在起初就有着显著的政治要求，它不认可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或者是在认可的基础上明确地要求逐渐改变。民主运动一开始就是通过集体的政治表达来展示自己的，它的运作方式主要是政治声明、结党和通过现行体制参与竞选。但是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人们处于一种相对封闭和相对隔膜的状态，反对者的任何声明、组织和活动都没有足够的放大渠道，这就决定了传统的民主运动影响必然有限。从另一方面说，组织政党发出集体声音和进行集体行动在中国社会里有两大困境，第一，类似列宁主义的传统型政党是为了进行战斗动员而组织起来的，这样的政党只适合颠覆性的革命而

不适合现代社会中的民主转型；第二，类似西方社会的现代政党是围绕选举制度产生的，这样的政党只是为了组织选举和拉拢选票而存在，在中国社会的背景里没有这样的制度基础。传统民运没有走出这两个困境，也不可能走出这两个困境，于是它们的影响只好日渐式微了。

但是从新的世纪开始，中国的维权运动为民主运动找到了新的出路。维权运动在在 2003 年逐渐成形，民众透过游行、法律控诉及媒体曝光等，挑战政府或官营企业的权限，以维护自身权益。运动由最初维护消费者权益、业主权益，后来已触及公民政治权利等政治禁区，近年成为中国社会研究一个重要课题。在 2005 年后，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参加维权运动的公民与日俱增，虽受到强力压制但仍茁壮成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民主运动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战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以往的民运分子一转脸，几乎都成了维权人士或者维权人士的同盟军。事实上，中国民主运动与维权运动也是殊途同归的，它们都在联

联合国文献所代表的普世价值中寻找到了共同点和共通点，零八宪章就是中国民主运动与维权运动高度结合起来产生的，它已经成为中国式的普世价值，成为中国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的神经。

中国民主运动与维权运动高度结合起来以后，中国民主运动“向后退”了一些，中国维权运动“向前进”了一些，其二者的汇流就是中国的公民运动。在2008年前后，随着《零八宪章》的发布，“中国公民运动”这样一个概念正式走向了中国社会的前台。到了2010年，王荔蕪、屠夫（吴淦）和老虎庙（张世和）等人发起公民关注团对福州三网友因言获罪案进行干预，这个一事件有显著的集体行动的意义，有显著的政治权利诉求，而且是街头运动的成功尝试，参与者自发地喊出了“自由万岁，言论无罪”这一具有显著色彩口号。在这一事件中，“公民运动”一词被参与者和评论者广泛采用，由此开始：中国大陆的公民运动，尽管表面上看无法与强大的国家政权抗衡，但它

已经开始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力量了，也已经开始扮演一个当局无法忽视的政治力量了。

维权运动就是中国公民运动的一部分；民主运动也是中国公民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将中国的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统一于中国的公民运动，这不仅在理论上有充分的必要，而且在实践上也应该有十足的意义。首先，传统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大陆虽然仍在发展着，但是它近年来的发展无疑是借了维权运动之力，如果没有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则传统的民主运动依然在牺牲中牺牲，在徘徊中徘徊。其次，传统的维权运动虽然风起云涌并势头渐进，但是它近年来的提升无疑是借了民主运动之力，如果没有毅力坚韧的民主运动，则传统的维权运动依然在乞求中乞求，在上访中上访。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都是社会运动，而社会运动有社会运动的规律，社会运动的推动者必须认清社会和社会运动的本质和规律，运动有其可能性和可行性，有其目标，这个目标可能是潜在的，也可能是明确的。中国公民运动的目标就

是实现联合国文献所体现的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所载明的目标，就是要在中國建立一个以公民权利平等为基础、以自治的和开放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就是公民社会。

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跳跃，通常是一个突变的过程，当然，在实现突变之前必须有一个力量积累的过程。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有一个跳跃。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专制社会中，力量的积累将怎么实现？答案已经出来了，公民运动就是一个有效的方式。鲍比·甘迺迪曾说过：“一个人每次为一个理念而挺身而出，或为改进他人生活而努力，或向不公出击，他传递出的希望仅产生很小的波纹，而千百万不同能量产生的波纹互相交叉，就能汇聚成洪流，并可冲垮阻挡我们的最坚实的墙。”今天我们可以说，公民运动中的每一个案例都是一个很小的波纹，而千万个波纹就能形成洪流，冲垮中国的专制之墙。公民运动为中国民主展示了一条自下而上的道路，以公民运

动为战场，建立中国民主的动员系统，这已经成为运动中人的广泛共识，并不是什么机密问题。

民主不是空洞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民主就是公民权利的总和。如果通过公民运动能够多实现诸方面的权利，那么民主的因素就多一些，如果通过公民运动，我们的权利一点点积累得多起来，多到最后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必然的，只要多到足够多，就足够我们用了。德国的柏林墙推倒二十年了，中国民主派妒忌的同时，也应该努力，我们的柏林墙不是那样倒塌的，必须用中国的方式推倒，中国的方式就是公民运动运动。权利就是政治，维权就是政治活动，政治运动必须要有更多人参与，更多的人进行集体参与就是公民运动，那么，中国民主算是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道路。中国的民间力量只要通过公民运动建立自己的动员能力，那么它变革社会的能量将是非常可观的。只有民间力量壮大起来了，我们才能谈得上怎么与特权集团去做有效的对抗，才能谈得上有效的妥协，才能谈得上有效的和解。

八，为什么一定要反对现行的户籍制度？

中国的户籍制度始于周朝，至秦代初具规模。此后，经过三国至南北朝的整顿，到隋唐时期日趋完备和周密。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历代政府对户口管理的重视程度是最高，它通过体系完备的社区组织、行政网络克服了人口分散居住的特点，建立起了自下而上的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我国历代政府之所以重视户籍管理，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借此筹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料。深受传统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影响的我国历史上的户籍制度，表现出以下特征：

一，户籍地域性

由于人口与赋役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政府千方百计将人口控制在特定的地域范围中，限制其流动，甚至把任意离开户口所在地视为一种犯罪而

加以惩处。如金朝规定：“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所者，元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15]明朝规定：“其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16]在农业社会，以土地为主的生产经营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本来就具有制约人口流动的客观条件，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从外部加强了这种安土重迁的特征，人身的束缚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封闭，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户籍等级性

中国传统社会曾出现过特权户种、民籍户种和贱籍户种等类别，其户籍地位逐级降低，界线分明。其中，特权户籍以宋代的官户最为典型。它可享受以下特权：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罚等。作为特权户种的官户在宋代以后消失了。民籍户种是平民百姓拥有的户籍，是主体户种，包括民户、匠户、灶户和铺户等。这些人是国家赋役的重要承担者，其社

会地位基本相同。而贱籍户种的社会地位低于平民，包括军户、录户、杂户、乐户和丐户等。

三，户籍世袭性

严格的户籍管理不仅体现在对人口生存地域的控制上，而且体现在对人口等级、职业的控制上，即同人口的地域流动一样，人口的等级、职业也被户籍标识得清清楚楚；不同等级、职业间的流动受到制约，户籍是世袭的。如军户、匠户和杂户就具有非常突出的世袭性。军户自东汉末和三国时出现历朝各代均实行世袭制，以达到“兵之子恒为兵”的目的。三国时期，军户的儿子世袭为士兵，女儿也只能在军户内嫁人，形成了户籍对婚姻的制度性限制。杂户主要是指拥有各种技能、技巧的专业户。北朝时就规定他们的子弟要世袭父业，不得进学受教育。匠户主要是指各种手工业者。唐朝政府对官府掌握的手工匠户的世袭性作出了明确规定，《大唐六典》卷7载：“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

宋元以后控制更严，《元史·刑法志》载：“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黼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

户籍的社会治安职能

1949年以后，政府废止了旧的户口制度，制发了新的户口簿册，建立了新的户口登记制度。但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观念和计划经济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政权制定的户籍制度仍保留有大量传统户籍制度的内核，部分条款对人民权利的限制甚至超越了历代皇朝。如户籍带有深深的身份烙印，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异性，享受的待遇明显不同；户籍被打上世袭的烙印，农村居民的子弟除考学等少数途径外，绝大部分都承袭父母的农村户籍；户籍管理带有很强的社会治安功能等。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 年至 1961 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

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1960年—1961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吃的。此后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将有关饥荒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列为绝密，同时不断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人饿死。直到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国内有媒体披露三年大饥荒死亡人数4060万！甚至有人推测死亡人数达到8000万。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被饿死？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局用严酷的户籍制度和各种政策限制人口流动，在极端饥饿的情况下，人们连乞讨要饭的自由都失去了。同样，也因为严酷的户籍制度和各种政策限制，饿死这么多人却消息流传不多，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外界的情况，就误以为全国形势大好，只是一地饿死了人。

如果说大饥荒时代饿死数千万人是一时的政治灾难，那么中国农民长期受到剥削和压迫则是长期的政治灾难。由于城乡户籍制度，城乡两部分居民有不同的社会身份，这两种身份在地位上截然不同，配置的社会资源也完全不一样。拥有城镇户籍的城镇居民获得较好的资源，在享有教育、补贴、劳保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医疗、教育和失业保障等各方面的优厚权利和待遇，而农村户籍的农民无法获得这些好的资源。这就直接或间接地拉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公造成了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均。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社会资源并不是由市场来配置的，而是政府根据城乡分割的原则进行配置资源。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对居住地点和工作的选择权利，使农民被迫在低收入岗位和低收入地区工作，造成了城乡居民在就业和创业方面初始条件方面的不公平。城镇居民有机会进入国有企业获得稳定的工作，而农民却很难进入国有企业工作，更不用说进入垄断行业。农民即使能够进入

这些行业工作，也只能是临时工，不能享受与正式工一样的收入和待遇。

户籍制度的危害极大，它破坏了平等，限制了自由，给人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位与人格，招聘条件，社会保障等方面，最可恨的是孩子的上学和考学，它让亲人分离，骨肉不能团圆，甚至会害了人的一生。讨论户籍歧视制度之前先来了解种族歧视概念，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定义，基于种族、肤色、血统或人种来源，对人们加以任何区别、排斥、限制，其目的或效果是取消或损害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享受或行使人权或基本自由者，即为种族歧视。由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方便的引出户籍歧视的概念，既：基于人们的户籍，对人们加以任何区别、排斥、限制，其目的或效果是取消或损害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享受或行使人权或基本自由者，即为种

族歧视。比较两个概念已可以看出户籍歧视可以归纳到种族歧视范畴中。

在中国大陆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户口簿中看到自己的户口，从一个的出生就已经定了。确切地说，还没有出生，有关的歧视就已经定了。从基本的政治权利来说，非户籍地人口不能参与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与被选举。只能参与户籍所在地的选举，对于长期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人来说户籍地的选举毫无意义。而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系的工作所在地的选举有没有权利。这样等同剥夺了非户籍地人政治权利。从社会权利来说，非户籍人口不享有或不完全当地的社会福利，举例如北京的外来人口（包括有正当工作，并纳税的人）不享有一老一少医疗保险，不享有晚婚晚育津贴。儿童不享有九年制义务教育（有条件享有，如本地学生已经先入学后还有余额），不享有保障住房，等等！同时，非户籍人口不能是有多种后付费业务，包括网通公司和移动通讯公司都有这样的规定。非户籍人不能从事某些工作如当地是各

种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和政府机关。等等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举不胜举！

人，生而平等。宪法已经明确承认了人人平等。不同户籍区别对待违反公平公正的原则。努力劳动，诚信纳税却得不到平等的对待。幸苦工作了多年的农民工还不如当地的无业人员福利多。纳税多年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却必须回原籍上学，导致中国成千上万的留守儿童。而本来儿童都应享有母爱家庭的温暖。如果一个得不到社会的公平对待，必然导致其心理和行为上的问题。流动人口高犯罪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户籍歧视。户籍歧视制度的危害不仅在人权保护方面，对于社会各个方面来说，户籍制度都是极具破坏性的，它甚至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之一。但是，无能的政府控制社会，为了维稳，就恰恰需要这样的制度。

一些人主张保留户籍制度，打出的旗号是“城市需要论”和“稳定压倒一切论”。孰不知城市的

繁荣稳定需要的不是户籍、隔离和仇恨，而是劳动力流动、平等竞争、和谐共生；孰不知当社会稳定压倒社会正义时，社会道德沦丧，政府威信丧失，弱势群体遭殃，社会仇恨滋生，这样的社会与稳定的目标南辕北辙。只有让正义压倒一切，正义得到伸张，良知得到唤醒，平等得以实现，人民的权利得以保障，那么社会稳定就在其中了。

现实中国的不和谐特权、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市差距、身份歧视、省籍歧视、就业歧视、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血汗工厂、农村贫困、城市犯罪、同命不同价、打工子弟学校、高考分数线差异，大多都与户籍制度有关。户籍制度造成了人民事实上的严重不平等，如在求职方面，许多城市规定：某些行业和工种必须持有所在城市的户口才能被录用，报考公务员也只能是城市户口者；在求学方面，许多农业户口的子女在城市入学不得不交纳额外的费用，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而丧失；现在农民子弟进入国家重点高校的机会仅为工人子弟的 4 分之一、党

政干部子弟的 31.7 分之一；某校录取分数线，农民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子弟 24 分（电气工程）、29 分（会计）、31 分（计算机）、32 分（电子）（见“我国教育公平的理论与现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据研究，建国 50 多年来，农民对城市的无偿贡献折算成现值在 20 万亿元以上。另据《农民日报》报道，目前全国政协委员中仅 1 人是真正的农民。各级人大代表中仅 9% 是农民。目前，农村人的选举权只有城市人的四分之一，而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黑人的选举权也达白人的五分之三。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实现了迁徙自由，农家子弟毛泽东得以走南闯北，在北大作图书管理员，不需办暂住证，也不用担心被收容；到了计划经济时期，户籍制度重新被捡起，并且不断被强化，那时人民外出要凭介绍信，国家严格掌握户口迁移指标，夫妻即使长期分离，也难以“调动”到一起。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劳动力市场化、国民自由迁徙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

流，但落后的户籍制度形成了对市场经济的极大阻力劳动力流动，被当作“盲流”；招聘人才，但不给落户口；在异地居住3天以上，要办暂住证。

2003年之前实行的收容遣送制度每年让数百万人失去了自由，它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异曲同工。仅1958年，南非就逮捕了60万没有携带“居住证”、“迁移证”、“寻职证”、“身份证”的黑人。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暂住证制度本质上是“防民”思想在作祟，是把国民或者部分国民当作了“刁民”来对待。如果中国不能够从防范控制型管理转变为民本服务型管理，那么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不可能废除。

户籍制度是“三农”问题的祸根之一，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户籍的制度安排，使得城市可以无限度地榨取农村的财富、富裕地区可以无限度地掠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而无须负责外地人的社会负担，不用考虑外地人的医疗、工

伤、养老、子女教育问题，地方政府的人均 GDP、人均财政支出也不包括外地人在内。有专家统计，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是 1.9 万元，全国有 1~2 亿农民工，每年创造的财富至少为数万亿人民币。可以说，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放任农村越来越贫困为代价的。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像西欧，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可能解决。

户籍制度制造了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十分有利于城市的发展，但严重妨碍了中国城市化的顺利进行，导致我国城市化速度的极其缓慢。国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均高于工业化率，但中国正好相反，1978 年时，中国的工业化率为 50%，城市化率只有 19%；目前，中国的工业化率在 80% 左右，而城市化率只有 40%。据新华社 2006 年 2 月 18 日电，南京有百万农民工，但五年只落户了 4~5 人，每年不到 1

人，获得南京市户口的农民工不到百万分之一。1994年美国有城市 1050 座，日本有城市 667 座，均比当时中国的建制市要多，但他们的人口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通过对居民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人口登记，过去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人口的正常流动，如今在教育、医疗、劳动、就业等领域严重歧视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直接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城乡隔离及地区隔离制度的形成。它不仅违背国际法，而且违背了国内的宪法和法律：

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由此衍生的城乡二元隔离的种种规定、法律和制度安排。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等不仅违背“54 宪法”关于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条款，而且也涉嫌违背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他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层

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

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道路上，对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进行冲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法的。

九，为什么一定要关注农民工权益？

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我国农民工的数量为2亿人左右。主要分布于建筑业、采矿业、第三产业和其他产业链低端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农民工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同义词，城市发展经济的主力军。人们普遍认为指的就是农民工人，这当然是中国人的说法。在美国没有农民这个称谓，统称为农场工人。从字面上分析，

农民工人和农场工人好像差别不大，但是深究起来却是两个千差万别的词语。首先在身份上，农民工人的身份是农民而农场工人的身份是工人；其次在工作上，农民工人做的是城市里的工作而农场工人干的是农场里的活计。社会学家、三农问题评论家艾君认为，在我国实施多年的实行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下，我们所说的“农民工”，实际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

农民工问题是指中国大陆由于农民进入城市参与经济活动后涉及的一系列权益保障的总称。当致富成为人们第一需求和追求目标时，城市人占有各种政策的抉择领导地位、占有意识领先的统治地位、占有生产资料转化成货币的掌控权等等，当处在两眼墨黑最封闭的乡村的农民进城务工时，自然会对他们制造出许多政策的限制，强加给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赋予一些带有歧视性的概念、名词。在农民工在就业方面，城市制定外来劳动力分类目录，把脏乱差工作留给民工。农民工从事行业的基本特点是：体力要求较高的房地

建筑工、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绿化养护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钟点工或保姆、厨师、服务员等脏、累、险、差工种。出现这些限制和歧视的主要原因是意识问题。因为意识的误区，导致制定政策的错位。城里人在政策的引导下对农民工的歧视一方面源自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等由于出身形成的尊卑贵贱观念；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城里人认为农民工抢他们的饭碗而产生的反感和仇视。根子在政策，根子在执政阶层。

其一，在决策者眼里，因为存在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利益之争，即农民工进城就业，加剧城市居民的就业矛盾，因此城市政府的政策趋向与城市居民的利益趋向一致。

其二，政府害怕“城市病”，从而试图将农民圈在农村。

其三，我国各大城市存在“隐性超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入必然使城市的“超城市化”进一步加剧，城市治理成本大幅加大。

其四，城市劳动力失业给城市政府带来的成本十分巨大，而农村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最多也只是回家种田，政府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

农民工权益受保障的程度明显偏低。农民工所在单位提供工作待遇较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没有享受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近八成的农民工不能带薪休假，还有八成的女职工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制度。另有五成左右的农民工得不到工伤补偿或者加班补贴，近四成农民工未与单位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或协议。农民工生活质量普遍不高。首先是农民工生活、卫生条件差。受工资水平低限制，大部分农民工的月消费几乎全部用于住宿和食品消费，而在生病时，只有少数人会选择去正规医院，其他人大都选择自己买药治疗或去个体诊所。其次是居住环境质量差。近四成的农民工居住在工棚或集体宿舍里，地方狭窄拥挤，室内肮脏零乱，除了被褥衣物，几无他物。子女受教育难、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不到位、

农民工从事的职业技术含量低且工资水平低也是农民工面临的问题。

根据相关调查，被克扣和拖欠过报酬的农民工分别占两成。其中半数以上的农民工被克扣或被拖欠的报酬属于工资收入。农民工被拖欠报酬时间最短的有一个月，最长的达到八年，平均被拖欠了四个月。被拖欠过半年以下的农民工有五千一百九十五名，占被拖欠农民工数的百分之九十四点四九。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主要原因如下：

1、雇主有意拖欠。多见于餐饮、制衣、制鞋等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计算机类企业也出现此类情形，雇主有意拖欠，有钱也不发给农民工。

2、一些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使农民工的工资不时能按时领取。如北京美洲视线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明明已经账面亏空，却一边向员工吹嘘自己有多么雄厚的资金实力，一边又暗地变卖公司资产以图不支付员工应得工资，致使40多名员工3个多月工资付之东流，损失共达50多万之巨。

3、将拖欠工资做为留住人的一种手段。建筑行业普遍存在用尾欠作为留人的手段。包工头普遍担心春节后人手缺乏，或者跑到其他包工头那里，往往拖欠农民工一部分工资，一般在 600 元左右，强迫农民工来年继续在其手下干活。

4、垫资施工是欠薪的根本原因之一。据调查，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潜在规则”：多数开发单位都将“施工企业先行垫付工程款”作为招标的一个必要条件，等工程进展到一定程度，开发商再将工程款分期分批拨付给施工单位，这就给拖欠工资问题埋下伏笔。

5、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导致欠薪。农民工运用法律自我保护的能力较低，认为老板给不给钱，或者什么时候给钱，是老板的事，自己拿他没办法。

6、政府工程资金缺口大，造成拖欠。众所周知，中国的工程主要是政府的工程，或者与政府有关联的工程，而农民工进城就业，大多是在这一类工程中，所以政府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上负有重要责任。

长期以来，国民待遇平等的问题在中国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所有的人都不是具有平等权利并享受基本自由的公民，他们被政治家分成了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分成了干部和群众，分成了固定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分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分成了城市人和农村人，分成了工人、农民和农民工。对阶级、民族、干部和群众、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体制内和体制外、执政阶层有各种巧妙的划分方法，有些是靠法制，有些是靠政策，有些是靠意识形态的强化宣传，而对工人和农民的划分则是依靠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可以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户籍划分的不合理性、农民身份的界定和其不变性，是我国出现三农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导致出现农民工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人说，《农民权益法》能解决农民权益保护的问题，错。如果把农民再次进行身份界定，等于给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工问题的解决雪上加霜，不仅保护不了所界定的农民，而且又会伤害亿万农村劳动力（即人们所说的农民）的自尊心。

户籍制度是引发城乡差别的原因之一。即使在城市里工作，身为农民户籍身份的农民工也无法享有城市人的“补贴”。城市化的实质是转化农民为居民，转化小生产的主体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三农问题的产生的一大原因，是农民受到歧视、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主要因素，是其他诸如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一切公平制度之所以存在并得以执行的前提！正是由于户籍制度造成的就业、福利歧视等原因，农民工是中国大陆城市最底层的阶层，许多人处于非常艰难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逐步采取措施，以统一城乡户籍制度，这将从根本上达成农民工的公平就业和待遇。农民工子女没有城市户口，其教育成为一大问题。农村打工者没有参保意识，在发生工伤或疾病时，不能享受医疗保险。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群体学者将其划为边缘人、弱势群体，绝大多数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没有养老保险、也没有医疗保险，因工致伤、致残和致

死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甚至诸多黑心的企业、雇主恶意克扣、拖欠和拒付农民工的工资，并已酿成社会问题。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实施，伴随农村医疗、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等福利的实施，农民工必成历史。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认为应该有步骤、有规划、分阶段、有深度地进行城乡改革，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其一，首先要从户口制度入手，彻底取消其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打破多元体制向一元体制转化。消除城乡户籍差别是第一步。其二，在消除城乡户籍差别之后，新的制度安排必须要迅速跟进，迅速建立起城乡社会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制度。其三，从户口入手，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制跟进，然后就要着手解决好农村人土地归属问题。农村解决好了以上三点，接下来就是在城市、农村，实行“以房定户”制度。即，人出生后，就注册永久性公民出

生地户口，户口的迁移实行像婚姻登记一样注册登记制，登记注册的基础是有住房作为唯一的条件。

农民工其个人身份是农民，其工作性质是工人。因为政府和企业都不愿意对其负责任，故而成了特殊的现象，把其称为农民工，成了呼之即来，挥之而去廉价劳动力。使得农民工不得不忍辱负重，从而也成就了改革开放大业。奴隶社会早已灭亡，奴役人们的现象却屡见不鲜。但象当今社会如此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古今中外，实属罕见。作家伯里斯·瓦西列夫对人们说：“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关注农民工，都应该关注农民，努力通过制度化改变，使他们成为一个骄傲的公民。

十，为什么一定要维护上访者的权益？

上访制度的根源，可追溯至封建时代的“清官情节”。宋时的包拯，被颂扬了千年，就是明证。历朝历代都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但通常不针对皇权和官僚，或者在法律制定上就已经对皇权和官僚网开一面了。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种情况偶尔也会出现，但比所谓的“圣人”出现的机会还少，至于“皇帝犯法与庶民同罪”，则根本不会出现，曹操做为宰相，犯了杀头大罪也不过割发代斩。因为没有法治，权利不平等，而权力高高在上，所以遇到问题就不得不上访。现代社会大规模上访现象的存在，是因为没有法治，而司法部门也不独立，而媒体不对民间开放，而人大代表也不能代表人民，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对民众的侵犯成为理所当然，人们没有办法，就找更高级别的政府。

从当前中国大陆的统治方式看，中共政权也不鼓励人们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更不鼓励人们通过

媒体炒作，至于人大代表人们也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他们通常也不会为具体的人民服务。从制度设计来看，中共政权不喜欢人们去上访，但也只能开辟上访渠道来解决社会问题，为此专门设置了中国的信访部门。政府部门有信访口，人大部门有信访口，司法部门有信访口，凡是权力集中的地带都设置了信访口。民主社会也有诸多社会问题，但这些社会问题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合法的渠道予以解决，比如政府要拆公民的房子，公民如果不同意，就可以诉讼，也可以诉诸媒体，也可以找自己选举的议员，这样一来，大凡都能解决。但是一党专政的专制社会不一样，司法不独立，媒体不独立，人大不独立，各种社会问题都需要上访，而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尤其众多。中国大陆每年都有大量人奔波在上访的路上，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通过上访这样一个渠道，大部分的事情都得不到解决，只好来年再访。于是中国大陆就有了一个庞大的上访群体，有些访民自称为“中国的第五十七个民族”。

信访部门不是一个独立的部门，各个部委下都设有信访部，用于接待涉及本部门的案件。这说明它不是一个有权力的机构，只是“通风报信”的窗口。“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了；什么都不能不管，什么也都可以不管”，这是对该部门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信访实行“归口管理，分级负责”，群众反映一级国家机关的问题，最终还必须回到这一级国家机关去处理。上访反映的问题，最终由领导批复给案件的被告一级自己解决，并非履行正常的法律受理、审判程序，带有明显的人治痕迹。

《铡美案》毕竟只是一出民间戏剧，但清末时代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常常被当作中国告御状的经典案例，事实上与其说它是上访的成功，不如说是现代媒体在中国的第一次胜利。在此案复审期间，新创刊的《申报》对该案进行了详细地全程追踪报道，3年间发表了70多篇相关文章，使得该案广为人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同情。正是在全社会广泛的舆论压力之下，此案才最后

获得公正的审判。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里，人们的利益诉求逐渐多样化，人们遇到的问题也逐渐多样化，但明君不可能遍地都是，甚至可能一个都找不见。任何专制政权，它到了统治的后期就成了制造社会问题的机器，但又不能解决大部分社会问题，于是，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上访群体也越来越多，中国的“第五十七个民族”也越来越壮大。

可以说，上访制度是一种丑恶的中国传统，它只是存在于民间传说中的一线光明，在现实中，上访制度却是吸引被蹂躏和被欺辱的民众像飞蛾一般投向一堆烈火。在张艺谋的电影中，秋菊被村长羞辱，秋菊开始倾家荡产地上访，背井离乡战战兢兢游走于各个森严的衙门口，这其实是政府对公民更大的羞辱。当秋菊终于用市长的权力压制了村长的权力时，秋菊胜利了么？不，这只是市长的胜利。这里与法律和正义没有任何关联。

中国大陆是一个权力社会，中南海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核心，油盐酱醋、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没有什么是你所能完全自主的，都和中共中央驻地中南海有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是以中南海为总司令部，以各级省委和权力部门为分区司令部。在这样一种统治体制下，任何社会问题的根源都在上面，任何可能的解决方案也都在上面，那么人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上访，希望通过上访和不断上访来解决下级政权解决不了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虽然冠冕堂皇地为民间开辟了上访制度，但上访制度的设计在中国这个畸形的现实中形成了引蛇出洞和自投罗网的局面。上访者之所以上访，大多是因为有下层的权力侵犯了他们，但上访之后问题还要回到原地解决，这就会使上访者陷入尴尬的境地，他们会面临权力更毒辣的复仇眼光。上访者和上访信往往落入另一当事人之手，而这一当事人基本都是官僚集团或权力部门，他可以人赃俱获地对上访者进行更严重的迫

害。有些不屈的上访者最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还有些被劳教，还有些进了地方上的监狱，它们叫学习班。河南漯河公民徐林东因为帮助同村残疾人张桂芝写申诉材料，2003年10月被当地政府强行关进精神病院。被关6年多时间，他“被捆绑50次，被电击55次，两度逃跑，几度自杀”。今年4月25日，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徐林东被精神病院释放。

中国以忠孝治天下，在中国历史的帝国语境中，告御状本身就是以小犯上的大逆不道之罪，因此很难获得帝国实质的同情和支持。告御状一般都被当作“刁民”的典型特征。清顺治时代。朝廷“文件”就明确规定：凡告御状者一律先打40大板再说。到了康乾雍盛世，任何到北京告御状者一律收入刑部监狱，进行统一折磨。乾隆皇帝在一次讲话（圣旨）中说：“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而讦其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乾隆对待上访者的办法是，你告的是谁，就把你交给谁来处理。因此乾隆时期，上访者一个比一个死得

惨。当前中国大陆的上访制度挂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招牌，但是处理问题方式和满清皇帝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根据中国大陆政权的信访条例，你可以信访，但不能集体信访，也不能越级信访。中央政权把信访数量当做考察下级的硬性指标，哪里的信访者少，哪里的领导就会受到奖励，哪里的信访多，就说明哪里问题重重，就会有下级领导受到批评和制裁。现在一些基层政府，为了减少上访尤其是越级、进京上访的发生，对班子的考核指标中，将群众上访列为重要内容：如发生越级、进京上访，影响较大的，评优时实行一票否决制。专制政权的本性也在这里体现，任何下级都怕给上级送去麻烦，而访民就是一个麻烦。于是，各个地方都要限制访民上访，很多地方的官员甚至在民间埋了眼线，有时候还像打仗一样要埋伏到路边去拦截上访者。

在一些县城大街上、农村公路旁、甚至农家墙壁上，到处是白底红字新刷写的关于上访的标语，比如“坚决打击违法上访”，“越级上访就是犯罪”，“集体上访四人以下”，“聚众闹事法律不容”等。县里的官员说：“这是上级的要求，各村都要集中宣传一下”；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说得更具体：“每个村这样的标语最少要刷写5条”。

人们说上访制度是挂羊头卖狗肉，从这些标语也可见一斑。上访制度建立的目的就是让人上访的，不是截访的，否则可以称为截访制度。但上访制度在中国恰恰就变成了截访制度。没有民主才有大量的上访，因为其它的渲泄渠道大都被堵死，上访几乎就成了少有的几个渠道之一。稳定也是这个理，如果本来就稳定，谁还会提稳定？但是上访不能太多，太多了领导没面子，升官就受到影响，前途可能因此丢掉。所以上访得有，否则就证明上访没用，但不能太多，太多了就证明领导无能。最后领导的选择是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地区上访都得数字标准化，都必须有上访名额，默

许的上访人员要听话。如果上访的名额不是领导默许的上访者名单上的人，就要截访、堵访。

人们也许不会忘记，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简称安元鼎)在京设立多处“黑监狱”，以关押、押送到京上访者为主业，与地方政府签协议并收取佣金，截访，俨然成了这家保安公司最为重要的一项收入来源。不论是关押还是遣送访民，安元鼎都要向地方政府收费。《财经》记者的调查发现，安元鼎近几年业务发展迅速，2007 年全年营业收入仅为 861.93 万元，2008 年这一数字变为 2100.42 万元。其主要业务之一即是帮助各地政府拦截上访者，业务范围甚至已进入上海、成都等地。但吊诡的是，截至 2009 年 5 月，安元鼎的许可经营项目仍然为“无”。(南都周刊，2010 年第 37—38 期)

可以说，截访制度是中国社会管理的缩影，而上访人群是这个社会全体受害者的缩影。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铭文值得我们深思：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十一，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劳动教养制度？

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前苏联引进，但形成世界上中国独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

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 1957 年 8 月 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78 次会议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建立的，依照法律规定，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为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劳教人员没有触犯刑事法律，受到的是行政处罚，可是在实际对待上，同判了刑的罪犯，没有任何区别。

在中共建政的初期，社会矛盾比较复杂，政治斗争异常残酷。中共针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之情况，除了军事镇压之外，也采用法律手段进行解决，但是在法律手段之外又实行了劳动教养制度。按照中共现在的说法，劳动教养不是判刑，所以也不用经过法定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但是它

能根据各级领导者的需要，直接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关押起来强迫劳动。在当今世界，这是一大奇迹，但中国人已经见怪不怪了。

1979 年之前，对国民的劳教期限由领导人随意来定，很多人最长劳教长达 20 多年。没有犯法的人坐牢时间比犯法的人还长，这也算是世界奇观。1979 年 11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劳动教养制度可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 1—3 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但以后在实践中，常出现重复劳教问题。至今有新闻爆料，维权人士和上访人士经常因为得罪地方领导人被劳教三次、四次。有学者指出，劳教制度之所以被之所以被中国大陆政府执意保留，就在于劳教制度可以不通过严格的程序和证据随意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这可以“方便”的“处理”政治异见人士、民间信仰者以及上访人员等特殊公民。

一般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始于 1957 年。1957 年 8 月 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了经过 1957 年 8 月 1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的初衷是为了管理“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不够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人员。从起源看，劳动教养制度建立的目的就是惩治和管制那些政治上不可靠的国民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出台的，因此大批右派分子被送往劳改、劳教场所，进行劳动改造。理由大概就是“决定”中所说的他们是“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全国 55 万右派分子中，大约有 48 万人多人送劳动教养，4 万多人被判刑。

据有关人士统计，中国大陆现在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大规模对国民实施劳教，劳教期限也大部分限制在一年左右，但依然有 300 个劳动教养管理所，经常性收容 26 万名劳教人员。假设每位劳教人员

被劳教一年，按照这个数字推算，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也劳教了将近 1000 万国民，可谓恶劣。2007 年底，包括经济学家茅于軾，维权律师李方平，学者胡星斗等 69 位中国学者和法律界人士联署发表了公开信，呼吁取消劳动教养制度。2010 年又有维权律师王成和学者张辉等一千余人联署呼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但是不为当局所动。

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了《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并与中国政府签署的人权公约相背。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立法法》第 8 条和第 9 条之规定，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并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得授权国务院就这类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

制措施和处罚在没有正式法律的情况下先行制定行政法规。《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同时规定的处罚种类中不包括劳动教养，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过 15 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9 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解释，这里的“法律”，是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里的“程序”，是指经过合格的法庭审理。

2010 年，有网民提议在世博会期间去日本馆举办抗议活动，河南维权人士王译女士通过推特发布五个字：“愤青们，冲啊”，因此被劳教一年。2011 年，重庆网友方竹笋在微博上说：“勃起来窝了一驼屎，叫王立军吃，王立军把这驼屎端给检察院吃，检察院端给法院吃，法院端给李庄律师吃，李庄说，这驼屎太臭了，谁窝的，谁自己吃。”为这句话，方竹笋被劳教一年。世界已经

步入二十一时机，中国大陆还有这等荒唐的事情，极端令人愤怒。劳教制度不废除，还有天理吗？我们不反对劳教制度，还能算是有良知的人吗？